

5061/  
5600.1  
267-78 (1958)

# Zhōngguó Yǔwén 中國語文

总第67期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101 • 30 HALL  
CAMBRIDGE, MASS., U. S. A.

MAR 19 1958

1

1958

C 210

# 1958年1月号(总第67期)目录

四十年来苏联的汉语研究 .....И. М. 鄂山蔭 Б. Г. 穆德洛夫 (1)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目前的两大任务 .....黎 錦 熙 (5)

用拼音字母推广普通话,从推广普通话普及拼音字母 .....郭 林 曦 (7)

文化下乡和汉语拼音字母 .....伯 韓 (9)

坚持字母的匯通原則 .....袁 家 驊 (11)

学习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一点体会 .....林 燾 (13)

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几个問題 .....拓 牧 (15)

我国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胡 明 揚 (18)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給汉语速記带来的好处 .....張 朝 炳 (19)

衷心拥护,認真学习 .....袁世海,李和會 (20)

閩南方言虛字眼的“阿”和“仔” .....黃 丁 华 (21)

揚州方言里的程度副詞“蛮”和“稀” .....刘 培 倫 (25)

海南島海口方言中的吸气音 .....梁 猷 剛 (27)

太原方言中的“文白异讀”現象 .....王 立 达 (29)

語詞复用例釋 .....黃 岳 洲 (31)

《水滸傳》里的助詞“地” .....胡 竹 安 (33)

現代汉语中的后置詞(下) .....Н. И. 賈布基娜 (35)

## 問題解答

拼音字母为什么要有名称 .....余志道問,周明答 (40)

語文短評 ..... (41)

“語文短評”討論 .....海寬,偉森,河水 (12)

## 書刊評介

陈家康:《四声究竟是什么东西》 .....楊 道 經 (43)

林燾:《現代汉语补足語里的輕音現象所反映出来的語法和語义

問題》(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7年第2期) .....林 伯 初 (44)

楊欣安等:《現代汉语》第三冊 .....方 芸 (44)

饒秉才:《客家人怎样学习普通话》 .....許 令 芳 (45)

中国語文叢書出版簡報 ..... (封4)

## 信箱

对黎語新詞术语处理的几点意見 .....陈 瑾 (46)

Дополнение 的譯名問題 .....定 国 (47)

## 动态

貴州省汉语方言普查工作基本完成 .....貴州省教育厅普通話推广科 (4)

語文工作者座談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秋 甫 (20)

上海市汉语方言普查工作近况 .....刘 征 (30)

河北省方言調查指導組第二次會議概况 .....吳 郁 文 (48)

关于写作体例的話 .....本刊編輯部 (49)

# 四十年来苏联的汉语研究

И.М.鄂山蔭教授

В.Г.穆德洛夫副博士

(本刊特約稿)

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从资本主义枷鎖下解放全体劳动者和受压迫者的基础，并在它的旗帜上写下了为人类絕大多數——工人階級，劳动农民，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受压迫的各族人民——的利益而改造旧世界的口号。苏維埃国家新的东方学應該保証苏維埃俄国和东方各国之間兄弟般的联系，應該保証新生的苏維埃国家和东方各族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相互合作。苏联东方学家革命后必須立即把旧的俄罗斯东方学重新建筑在完全嶄新的基础上。正因为如此，十月革命也标志着俄罗斯东方学历史的新紀元。这也正是汉学、尤其是汉语教学和研究的新紀元的到来。

誠然，19世紀末叶，俄罗斯汉学已經能够以畢秋林(Иакинф Бичурин)的名字，以瓦西里耶夫(В.П. Васильев)院士和他的学生組成的彼得堡学派的成就(其中包括汉语研究上的成就)而自豪。这里應該提到的有：畢秋林的汉语語法研究，瓦西里耶夫院士对汉字理論問題的探索，盖奥尔吉也夫斯基(С.М.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对比較語言学問題的探索，由卡法洛夫(П.Кафаров)、波波夫(П.С. Попов)編纂的当时較好的《华俄辞典》的出版。然而，在沙皇俄国时代，缺乏幹部和科学工作的綱要乃是十月革命前俄罗斯汉学的主要特点。

革命前，專門性的高等学校里只有極少几个人研究汉语。因此，年青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汉学面临着下列这些情况：

第一，必須吸收大量的青年从事汉语研究，以促进中苏兩大民族在斗争和工作中的友誼。20年代初，苏联許多青年抱着这样的心情进入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各学院。

第二，旧的汉学是一門非常广泛的綜合科学。旧的汉学家不是按这个詞的真正含义來說的語言学家，正如旧的汉学家不是历史学家，不是古文字学家，不是哲学專家或中国宗教史專家一样，因为他需要同时研究所有这些不同門类的科学。十月革命之后，隨着專業幹部的增長，應該把許多專門学科(其中包括汉语学)从綜合的汉学中分立出来。

第三，着重研究古典文学是旧俄汉学的特点。由

于已往汉学幹部只能有机会和中国的官僚代表打交道，而从来也沒有机会和中国的人民群众或民主派的活动家發生关系，因此，在旧汉学领域中，認為博覽古代文学要比掌握活語言的實踐和理論重要。这样一个例子是很有意味的：一位教授在講課时需要一个中国籍教員的协助，为的是能在黑板上写上必要的句子。十月革命之后，應該着重研究活的語言，而“五四”以后，則應該着重对白話的理論的探討。

第四，旧的汉学大体上是沿着單憑經驗来掌握中国古典文学的这一種或那一種典籍的路綫进行的，死背硬記代替了理論，只有間或談論一下古汉语和文言的虛詞，才使大学生死讀古書的那种令人厭倦的工作有所变化。如果有个别学者成功地写定和出版了某种教程(如瓦西里耶夫的《汉字分析教程》)，这样的教程也不会得到推广，而在作者去世之后，它們就被人們遺忘了。

最后，旧汉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傾向于把印欧系語言的語法範疇死板地硬套在汉语上(例如史密特 П. Шмидт 的《官話語法》)，論述汉语的“名詞变格”(比如說“的”或“之”是屬格助詞，“給”是与格助詞，“把”是对格助詞，“用”或“以”是造格助詞等)，論述汉语動詞的时、式、人称的“变位”等等。甚至有一位1921年才开始研究汉语的作者，在口头講課时一开头不得不按下列型式把汉语動詞进行“变位”：現在时——我說，你說，他說；过去时——我說了，你說了，他說了；將來时——我要說，你要說，他要說，等等。現在必須建立一种从汉语固有的特点中归納出来的語法系統。應該說，在当时这是一項特別困难的課題，因为中国科学家很少研究這個問題，而个别原著(如金兆梓的《国文法之研究》，1922年)又很迟才遞送到苏維埃俄国。基本上，苏联汉学家不得不依靠自己初期那种异常薄弱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是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領導的，因此，已提出的这些課題應該得到順利的解决。早在1918年，党和政府就提出了关于培养新型东方学幹部的問題，而在1920年9月7日，列宁簽署了关于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兩地組織現代东方語学院的指令。学院的使命是培养新型的东方学家，他們为了对东方的現代生活进行科学上的研究，必須很好地武裝起来：精練地通曉东方語言，善于在东方各个国家中以自己所从事



的工作貫徹我國的和平、各民族友好、平等、互相尊重的政策，一句話，貫徹四十年来我國所一貫奉行的、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的始終不渝的外交政策。在這兩個已組織起來的學院中，都設立了漢學部門。從此開始了蘇維埃漢學的紀元。

## 二

年青的蘇維埃國家從沙皇俄國那里作為遺產接受下來總共只有一個設有漢語教學的東方學中心：這就是彼得格勒（現在的列寧格勒），當時，第一，設有俄羅斯規模最大的亞細亞博物館東方學圖書館，第二，彼得格勒大學的東方系里有漢學部門。誠然，海參崴當時也有一個東方學院，在這裡教授遠東諸語言，特別是教授漢語，然而，在蘇維埃政權的最初年代里，在國內戰爭和外國武裝干涉的歲月里，遠東與蘇維埃俄國的聯絡截斷了。直到1922年以後，海參崴東方學院才進入了我國總的東方學生活之中。

在彼得格勒，到十月革命時期，卓越的俄羅斯漢學家瓦西里耶夫院士的及門弟子波波夫教授、依萬諾夫斯基（А. О. Ивановский）教授、蓋奧爾吉也夫斯基教授、別舒洛夫（Д. И. Пещуров）教授都已逝世，瓦西里耶夫院士所擬訂的漢語教學法（以漢字分析為閱讀中國文學史料的並行課程）已被遺忘。領導培養新的漢學幹部的責任交托給從革命初期就站在勝利了的人民一邊的阿列克謝耶夫（В. М. Алексеев）教授（後來是院士）和斯梅卡洛夫（Г. Ф. Смыкалов）教授，以及他們最親近的学生王希理（Б. А. Васильев）、舒茨基（Ю. К. Шуцкий）和較晚一些的龍果夫（А. А. Драгунов）。

作為一個漢學家，阿列克謝耶夫首先是一位中國古典文學，特別是古詩的專家。但是他的科學興趣遠遠地越出了純文學的領域。作為一個卓越的教師，他培養出了一大群出色的各種專業的学生：文學史專家（王希理、費多連科 Н. Т. Федоренко、艾德林 Л. З. Эйдлин、波茲德涅耶娃 Л. Д. Позднеева），哲學史專家（彼得洛夫 А. А. Петров），語言史專家（舒茨基、龍果夫）。阿列克謝耶夫為列寧格勒的大學生擬定了最初的教学大綱，為他們編寫了最初的教本。他最初把《聊齋志異》譯成俄文，這使研究者有可能對照着漢文本和俄譯本鑽研漢語句法的種種特點。具有更重大的意義的是他的注音文選，這是我國大學生建立正確發音所用的第一本教科書，正確發音的重要性是阿列克謝耶夫一直注意的。在阿列克謝耶夫的語言學著作中，還有通俗性的著作《漢字及其拉丁化》（1932年）。

漢語教學方面作為阿列克謝耶夫的最親密的助手的是斯梅卡洛夫和他們的第一代學生：王希理（研究現

代語言、新文學、佛教）和舒茨基（研究比較語言學和越南語、《易經》和道教著作）。

阿列克謝耶夫曾經和他的學生——多才的語言學家龍果夫（龍氏同時是杰出的蘇聯語言學理論家謝爾巴院士的學生）一起研究過漢字拉丁化的各種問題。龍果夫稱得他是蘇聯專門研究漢語的第一個語言學理論家。

龍果夫研究的基本上是漢語語法問題（著有《現代漢語語法研究》一書，1952年，譯文已為中國讀者所共知，登載在1955年的《中國語文》雜誌上），他在他的研究上利用了漢語方言學材料（著有《湖南湘鄉和湘潭方言》，1931年，《東干語語法研究》），還研究了西藏語和西夏文字。後來，龍果夫又從波里瓦諾夫（Е. Д. Поливанов，關於波氏，參閱下文）教授手裡繼承了創制東干語字母的工作，這項工作到龍氏去世後才結束。

龍果夫的著作所提出的漢語詞類問題和漢語動詞的體和時的範疇問題在蘇聯漢學史上具有特殊的意義。他又曾校訂了王力教授的著作的俄譯本，並附以評注，這工作在中國已為大家所共知。蘇聯科學院正在籌備重印龍果夫的兩卷選集。現在，龍果夫的教學和研究事業由他的學生雅洪托夫（С. Е. Яхонтов）在列寧格勒繼續着，雅洪托夫正在進一步研究漢語的形態問題。

1941年到1943年德國法西斯軍隊對列寧格勒的封鎖給蘇聯漢學以重大的打擊。阿列克謝耶夫所有晚一輩的學生，總共七名科學工作者（其中包括語言學專家、漢字理論研究者布納柯夫 Ю. В. Бунаков），為了從法西斯的炸彈和炮彈下挽救那些俄羅斯和蘇聯科學家的手稿、蘇聯科學院圖書館的珍本圖書，以及列寧格勒許多漢學家在阿列克謝耶夫領導下所完成的華俄大辭典草稿，全體由於飢餓和疲憊而死亡。

1949年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遷到莫斯科，1951年阿列克謝耶夫院士逝世，龍果夫身患重病遷移到莫斯科（他比他的老師只多活了四年），列寧格勒漢語學發展的這一時期就此告終。現在列寧格勒大學的漢語教學事業掌握在已故院士的第三代——富有才華的青年人的可靠的手裡。

## 三

根據1920年9月7日列寧的指令，莫斯科才開始組織漢語教學的機構，當時在舊的拉扎列夫斯基東方學院（建於1814年）的基礎上建立了現代東方語學院，該院後來（1921年）改為莫斯科東方學院。為了在學院中組織必要的學科，當時從彼得格勒調派了兩位教授：漢學家伊萬諾夫（А. И. Иванов）和日本學家波里瓦諾夫。前者精通實用語言，但不久就派到中國從事實



际工作,后者是語言学理論大家,主要研究日本語和普通語言学理論。关于汉语理論,波氏探討过汉语的語音学基础(音节構造)和詞匯学基础,尤其是提出了汉语詞匯及音节性質的論点,并对現代汉语的構詞类型进行了研究。他的东方学高等学校用《語言学概論》一書至今尚未失去它的意义。波里瓦諾夫在莫斯科东方学院工作到1920年底,以后他到了中亞細亞,从事东干語研究。

这样一来,莫斯科东方学院为了能正常地組織教学,需要有一位强有力的实践汉学家;终于在郭質生(В.С.Колоколов)教授的身上找到了这样的汉学家,他成了所有莫斯科汉学家的老师。郭質生教授早年在中国受教育,用古老的方法即背誦法学习过儒家的經典,从童年时代起就犹如本国語言那样精通了汉语。他認為对于苏联学生,汉语的文字系統是最困难的东西,因此他开始研究瓦西里耶夫院士的著作,并且在莫斯科恢复了汉字分析課程。汉字的教學是在語言研究基础上开始的,郭質生教授修訂了瓦西里耶夫、罗津別尔格的汉字檢字法,用来代替部首分类法,他并且根据这个檢字法編纂和出版了作为苏維埃时代第一部汉俄辞典的《汉俄簡略辞典》。以后在郭質生的主編下出版了第一本苏联汉语白話教科書(1935年)。

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乃是郭質生教学的基本特点。他非常敬佩中国汉学家的著作,因此他第一个校訂了中国出版的汉语語法(章士釗所著)的俄文譯本,把它用作教科書。郭質生善于用自己的热情去感染他的学生,他最早的学生中有:以后研究成語問題的罗加切夫(А. П. Рогачев),研究历史句法学的、卓越的教学法專家和汉语教員、海參崴东方学院的学生郭路特(Н. Н. Коротков),研究詞匯学和文字史的鄂山蔭(И. М. Ошанин)。莫斯科东方学院汉语教研室在郭質生和后来的郭路特的领导下,开始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培养汉学家——每年几十名。

在偉大的衛国战争年代里,莫斯科的汉学家沒有遭受到列宁格勒的汉学家們所遭受的那样巨大的損失,但是他們撤退了,离散在苏联各城市。当然,这种情况阻碍了組織一个統一的科学中心。汉学中的新生力量暂时停止涌現,严酷的战争条件要求把所有未成熟的汉学幹部立刻利用于实际工作。

然而,当撤退了的汉学家剛剛有可能返回莫斯科时(1943年),苏联第二代汉学家代表即在莫斯科組織成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莫斯科工作組。这个工作組形式上从属于当时还在列宁格勒的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后来成为汉语学方面一切科学工作的中心。在这里阿列克謝耶夫院士繼續他的研究工作,在这里鄂山蔭和郭路特初次以業已成熟的科学家的身分出現;前者

研究汉语史中某些問題(主要在詞彙学、語音学文字、学方面),后者研究历史語法(主要是古汉语語法和文言語法)。工作組的領導者康拉德(Н. И. Конрад)教授在这里对苏联汉学有很大貢獻,康氏基本上是一位日本学專家,他是革命前的一代东方学家的代表,他的淵博的學問和科学研究上那种精細縝密的方法,大大地影响了战后苏联汉学的飞躍的进步。康拉德教授兩种有关汉语理論問題的著作为中国語言学家所共知,因为已譯成中文,登載在中国的杂志上。在一些汉语專家(如郭質生教授和伊三克教授)的帮助下,开始了培养苏联新的第三代汉学家的工作,这一代汉学家的特点是研究現代汉语(特別对汉语語法感兴趣)。从1950年起在苏联答辯过十五篇有关汉语語法問題的副博士論文,这些論文是苏联在这个时期中培养年青汉语学家的正式总结。这一代的某些代表(穆德洛夫 Б. Г. Мудров、宋采娃 Н. В. Солнцева、宋采夫 В. М. Солнцев、賈布基娜 Н. И. Тяпкина、魯勉柴夫 М. К. Румянцев)的个别論著,在中国已有譯文發表,为大家所共知。近几年来,第三代汉学家所完成的著作,涉及汉语語法上許多十分重要的問題(如虛詞“把”和“被”,“的”字的功能,后置詞,后綴“了”的作用等),涉及詞匯学和構詞法上的許多問題(如詞根和詞的相互关系、語气动詞、結果動詞等),也涉及句法学上的一些問題(句子作主語句,句子作次要成分等)。已經完成的还有关于副詞的著作,关于《水滸傳》的語言中動詞形态的著作,等等。到1950年莫斯科各高等学校已設有將近十个汉语教研室。1954年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組織了一个規模較大的汉语教研室,1955年国立莫斯科大学以东方系、历史系、語文系的几个專門教研室为基础建立了东方語言学院,其中也設立了汉语教研室。与此同时,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研究組繼續地工作,并且在1957年初扩展为苏联科学院的一个独立的研究所——中国研究所。目前,該所的中国各民族語言研究組正在对汉语理論上許多問題进行研究。

#### 四

标志着中国人民历史的新紀元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也必然是苏联汉学史上一座意义重大的里程碑。从此,苏联汉学的各部門代表:历史学家、經濟学家、文学研究工作者、語言学家都以更大的劲头来进行他們的工作。可以这样說,正是在这个时期苏联汉学領域中新的学派才完全形成,这个学派有下列几个特点:

(1) 假如說革命前汉学部門总共只有三、四名学生,而每届只有一、二名畢業生(某些年代根本沒有汉学的畢業生),那末革命之后每届都有数十名畢業生,

个别年分的畢業生总数甚至达到八十到一百名。

(2) 假如說革命前的一个大学畢業生只能簡單地称为“汉学專家”，还需要相当長時間的訓練才能使他在某个領域中成为專家，那末，現在在大学畢業之前已經有專業分科，到研究生阶段再进一步提高。

(3) 假如說革命前基本上是偏重于古代中国和古典文学的研究，那末，十月革命之后，尤其是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已急剧地轉向現代汉语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可由我們在上面第三节里提到的那些科学論文的題目来証实。

(4) 假如說革命前大体上是采用中国旧派那种死背硬記的教学法，缺少理論上的闡述，几乎沒有任何严整的系統，那末現在的教學則是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原則上，这些原則以以下各点为依据：汉语的語法系統；循序漸进的教材；理論教程与語言實踐的联系；研究汉语的各个方面：語法、文字、口語、文言、語言史、書法、汉譯俄、俄譯汉。老一輩科学家和實踐家(如郭路特、伊三克、索維托夫)所編写的那些合乎教學法要求的教科書，給予學生們很大的帮助。

(5) 密切联系实际，把它的力量和知識貢獻給研究中国的苏联人民，这是苏联汉学的特点。这里我們要提到：苏联科学院中国研究所的《华俄辞典》(1951年，鄂山蔭教授主編)，中国已有若干版本的《俄华辞典》(伊三克和陈昌浩主編)，苏联汉语学者翻譯毛澤东同志論著的工作，以及編纂新的《华俄大辞典》(四卷本)的工作。为篇幅所限，这里不能詳細叙述我国汉学家在文学方面的翻譯活动。我們只提一下由于汉学家的劳动而使苏联广大讀者已經熟悉了中国文学的杰作，如《水滸傳》、《詩經》、《史記》，并且不久即將讀到俄文版的《紅樓夢》、《儒林外史》，等等。

(6) 批評与自我批評的精神是苏联汉学家的特点。凡有关中国的各种科学討論会，通常总有二、三百

名汉学家出席；論文答辯时，課室往往滿座，并展开劇烈的科学論战；無論是对于老科学家，或者对于剛加入汉学家队伍不久的青年，都普遍地运用批評。

(7) 最后，我們認為，苏联汉学家同中国語言学家之間的那种經常性和富有成效的联系，对于我們是非常重要的。假使說革命前俄罗斯科学家只是和西方汉学家有联系，那末蘇維埃科学家則是和中国的科学家建立了联系，并至今積極地維持着这种联系。在此以前，中国語言学家的許多著作長年地被放置在圖書館里無人翻閱，或只是为寥寥几位科学家的研究对象，現在，苏联第三代汉学家已成为这些著作的广大讀者。馬建忠的和楊樹達的，罗常培的和呂叔湘的，高名凱的和王力的，陈望道的和方光蕪的，傅子东的和黎錦熙的，还有好些別位科学家的著作和論文，都已經成为每个汉语学者的常用参考書。目前，苏联語言学界已經不再依据西方学者的著作来認識汉语，而是依据中国学者們的原著了。我們的任务是逐漸把所有中国語言学家的重論著都譯成俄文，使得不仅苏联的汉语学者，并且其他語言学專家都能閱讀这些作品。中国同志也正在把苏联汉学家和語言学家的許多著作和个别論文譯成中文。

近几年来，在合作上又采取了一种互相交換經驗的形式。自从呂叔湘教授訪問苏联之后，中国的教授們开始到我国高等学校來講授理論教程。目前，我国專家也定期到中国訪問，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同苏联科学院中国研究所語言組的联系一年比一年巩固，这种联系在这塊園地內保證了兩國科学院的合作。

在結束这篇論文的时候，我們要向中国語言学界亲爱的同志和同行們致敬，感謝他們的帮助，并且表示我們的信念：我們的友誼和合作將进一步巩固，給兩大兄弟国家的科学帶來裨益。(高祖舜譯，呂叔湘校)

## 貴州省汉语方言普查工作基本完成

根据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关于汉语方言普查”的联合指示，貴州省的方言普查工作在省普通話推广工作委员会和省教育厅与貴陽师范学院联合組成的“貴州省方言調查指导站”的领导下，經過一年来的努力，現已基本完成。

按計劃全省81县(市)除少数民族人口較多的20县外，应在61县(市)进行調查工作。由于時間短、任务重，又因貴陽师范学院忙着整風，更感到缺乏人力；但是，为了爭取年內完成这一任务，我們采取了在師院学生中調查与派人下乡調查相配合的方式，由省教育厅組織了在北京普通話語音研究班畢業的同学参加，配合貴陽師院共同进行工作。貴陽師院調查小組負責晴隆、普安等9县，省教育厅的兩個調查小組分別到遵义、安順、畢節、銅仁等地进行52县(市)的調查。自1957年7月正式普遍开展調查工作以来，至目前止，除貴陽師院尚有7县待明春完成外，已完成54县(市)。目前正根据材料，分片进行整理对应規律，預計1958年元月中旬完成整理工作，1958年上半年內完成編写學習普通話手册的工作。(貴州省教育厅普通話推广科)



#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目前的两大任务

黎锦熙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公布，是在社会生活和文教工作方面采定了一种适合新时代的大众传达工具，可以使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加强加快前进的力量和速度。

目前还谈不到就把这种新工具整个地迅速地来代替旧工具，就是说，还不能就把它直拼汉语来代替汉字，因为现阶段社会上还在使用汉字。汉语拼音方案第一个任务倒在于帮助汉字，克服汉字难认难记的困难，在每个汉字上注出音来，让学习汉字的可以利用 26 个简单符号来控制并规范汉字的读音，缩短学习期限，迅速扫除文盲。它这第一个任务不是代替汉字而是代替注音字母，代替注音字母来拼注汉字的音，帮助学习汉字，克服学习汉字的困难。

那么，既是用来帮助汉字，为什么不因利乘便就沿用那具有社会基础的民族形式的注音字母，而要拿这国际形式的拉丁字母来代替呢？我说，最主要的理由就正因为拉丁字母是一种“国际形式”。大家知道，我们得提高到原则上来看问题：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爱国主义必须与国际主义结合。这在文字工具的字母问题上又该怎样结合呢？首先就该让民族的字母形式国际化，同时就是把国际的字母功用民族化。四十年来注音字母的社会基础还没有扩展到全国的六万万；在全世界范围内，用拉丁字母的人数已超过六万万。我们采用了拉丁字母，就有可能使熟悉这种文字面貌的人达到全世界人口的过半数。这对于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是非常有利的，是符合于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同时它也跟注音字母一样，对于克服汉字的困难以提高本国人民的文化，加快教育的普及，也是非常有利的，也是符合于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的。注音字母只有一利，而拉丁字母兼有两利。古人也说过，“两利相权取其重”，所以干脆把拉丁字母来代替注音字母。

汉语拼音方案第一个任务是注音，是克服汉字学习上的困难，是帮助汉字，这是目前要求于它的“急功近效”。它的这个任务就是注音字母的任务；把注音字母的这个任务转移给它，并不是因为注音字母负担不起来：就字母本身的评价说，拉丁字母和注音字母在汉语拼音上是互有短长的，在初步学习上也是各有难易的，用不着在琐细问题的比较上来斤斤计较。只有一个要点：中国文字改革是有远景计划的，汉语拼音方案采定了国际形式的字母来代替民族形式的字母，正是早作安排，把目前给汉字注音的字母就趁早国际化起来，使汉语民族今天就能认熟将来自己的拼音文字的面貌，而将来新生的几代就可以精简一次字母的学习。所以它在“急功近效”之外，还有它的“远略宏规”。

汉语拼音方案的第二个任务是推广普通话。但它的这个任务和注音的任务并不是并立的两回事，因为注音就是在每个汉字上注出普通话的音，注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标准音。汉字的读音标准化了，普通话的坚实的基础就打好了。普通话不是强迫人人在任何场合都必须说，可是要求人人在任何地区都能够说；不是希望人人都能够说得很漂亮，可是要求人人都能够说得出口、听得懂。只要能够照标准音朗诵或宣读一般白话的书刊文件，这个人的普通话就获得了达到这种水平的保证。因此，汉语拼音方案目前的第一任务注音和它的第二任务推广普通话是互相结合的：注音的目标是帮助识字，克服困难，缩短学习期限，加快扫除文盲；实践的方式就是在一般书刊文件上摆设一条注音。推广普通话的目标是加强民族语言以及有关各方面的统一和发展；实践的方式也就是在一般书刊文件上注上一条标准音。

那么，为什么不把这两个任务合而为一，而要分开来说呢？因为这两者的主要目标有些不同：“汉字注音”的目标主要在加快扫盲，尽管注的是标准音，但在全国广大的农村中还必须拿当地的方音和它来对应，<sup>①</sup>所以注音的任务是在帮助识字之中同时斟酌地方情况来推广普通话，并不是单纯地为了推广普通话。至于推广普通话的目标，主要在加强统一。这个目标，第一步要贯彻在全国正规的初等教育上，儿童初入学用的汉语课本第一册或者第一册的上半册，从汉语拼音方案公布的下学年开始，就应该用拼音字母依照普通话和标准音编印若干课的课文。

<sup>①</sup> 农村注音识字，怎样处理当地的方音？跟北京标准音如何对应？这是六十年来一直存在的问题，过去也具体设计，企图解决过。请参看《汉语规范化的基本工具》（江苏人民出版社，18页，又26页）。新的计划，略见《文字改革论丛》（文字改革出版社，61页，又64—70页）。



出来,讓有了師資条件的小學,重点試用。<sup>①</sup>還有,一般學習普通話口語的人們,也不會一定需要漢字來表示。所以推廣普通話工作,也不是絕對依靠“漢字注音”的。這就是漢語拼音方案為什麼要把漢字注音和推廣普通話分做兩個任務來說的理由。

漢語拼音方案在目前的這兩大任務完成之後,才算給中國文字走上全世界共同的拼音路綫創造了必要的條件。毛主席早就說過:“中國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漢語拼音方案的第二個任務推廣普通話就是創設漢字改革的“一定條件”之一。我也曾談過:“文字改革是要走拼音路綫的,漢語的方言是很紛歧的,而被改革的漢字又是向來統一的,這就必須有五萬萬多人民口頭的民族共同語,根據着它來建立拼音文字,這種拼音文字才也是統一的,才能戰勝傳統的漢字而通行無阻。”<sup>②</sup>但這並不是說要期待條件完成之後才動手,語文工作者應當同時進行研究和準備的工作,如漢語拼音的聲調標示問題,詞兒連寫即定型化問題,等等;尤其是定型化的“現代漢語詞典”要正確精當地編印出來。另一方面把這漢語標準音的拼音方案作基礎,加以擴大,統一地系統地增添方音字母,除供應漢語各種方言拼音以便跟北京標準音對應之用外,並作為幫助各少數兄弟民族改進和創造文字的备选字母。還有,在科學技術方面,如符號、電碼、印刷、打字以及索引、編目種種需要,曾經利用注音字母而未能普遍化更不是國際化的,今後都可利用這個方案。這些都是應與推廣普通話工作同時並舉的。

漢語拼音方案公布之後,我們如果要迅速、確實而有效地完成它的頭兩大任務,就不是簡單的、孤立的和散漫的宣傳推廣工作所能辦得到的,必須結合到各方面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和中心工作,這就是說,要能夠應目前的急需,聯繫國家經濟文教等方針政策,具體地定出一種重点工作來。我的意見是,首先要刻鑄新型的“注音漢字”印刷銅模,廣泛地大量地印行一般書刊文件(不限于語文課本和通俗讀物,因為這個設計並不是專供教學或練習閱讀拼音之用的,它是普通書刊文件的一種印刷體裁,尤其是正在廣泛地展開學習的重要文件,必須具備這種印刷體裁)。這並不要考慮有了師資傳習等條件才印行,只讓它滿天飛,到處是;人們或者只看漢字像看沒有注音的普通書刊文件一樣,或者偶爾瞟一瞟注音,或者不睬漢字只當拼音的新文字讀,悉聽其便。這就可使一般忙于工作的工农大眾以及知識分子不會感覺學習拼音字母和普通話是另一種負擔,不會沒有機會常常接觸拼音字母的面貌,而必須在學習時才能見到。這樣先把漢語拼音字母和普通話的環境樹立起來(單靠公共場所名牌等等的注音是不夠的,幾十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必須普用這種書刊文件,才能創造環境),必然大有影響于漢語拼音方案的傳習和推動,大有利於掃盲識字、推廣普通話以及一切提高知識文化等等工作。

依照漢語拼音方案刻鑄新型的“注音漢字”,大量印行一般書刊文件,把拼音字母和普通話的環境盡先樹立起來,我認為這是目前的重点工作。這並不是本文新創的設計,“注音漢字”字模的鑄造也是有歷史的,現在可分為四種。頭兩種是舊型的,就是每個漢字都給注上標準音,合成一個字模:用舊字母(注音字母)的,已于1936年鑄成,直行,注音字母注在漢字之右(今後重印直行的古書還可以用),這是第一種;用新字母(拉丁字母)的,橫行,拼音字母注在漢字之上(或其下),現在只有現拼的樣品,但也要把注音和漢字合鑄為一,以利排印,這是第二種。還有兩種是新型的,橫行,詞兒連排(不再是逐字注音),詞間離開一點兒,獨立成文,照加標點,下與漢字逐詞配合:用舊字母的是第三種,用新字母的是第四種,都只有樣品。第四種簡稱“新注音漢字”(必須是詞兒對詞兒,不是指那段分欄對照的)。今後應採用的就是這第四種“新注音漢字”。為了目前急需也可以先刻鑄第二種“舊型的(即分字注音的)新注音漢字”。<sup>③</sup>

總的說來,漢語拼音方案公布了,適合新時代的大眾傳達工具從此采定了國際形式的拉丁字母,總結了六十多年來這種方案研究、討論、試用、提倡的經驗和解放後八年間各方面的意見作出決定。(六十年前已有搞拉丁羅馬

① 初小一年級用的《語文》課本第一冊,必須首先教學拼音字母,必須學好拼音字母才能教學漢字,字母與漢字不可同時兼教,這是幾十年來教學法上的可靠經驗。進一步,對初入學的兒童教學拼音字母,必須編成詞句,用“先綜合、後分析”的教學法,不可跟成人一樣地用“先分析(一個一個的字母發音、一組一組的拼音和聲調,系統地先教下去)後綜合”的教學法,這更是近年來從經驗和研究上獲得的正確結論,請參看《論注音字母》的第五節(文改出版社《字母與注音論叢》本);新的計劃,也略見《文字改革論叢》62—63頁。本文所指的正是這種課本,不是指那以漢字為主、兼教拼音字母的課本和一般短期專學字母和拼音的課本。如果這種課本編印出來,重點試用時,須注意向學生家長作一番宣傳解釋工作,讓他們不要誤會這就是教學新文字,這是新的語文教學法;經過半學期(大方言區可能要一學期)後,課本就突變為“新注音漢字”,就可以暢讀兒童文學作品。請觀後效!

② 見《文字改革》月刊1957年8月號,20頁“文字改革筆談”。

③ 關於“注音漢字”印刷字模的略歷功用和新的計劃,請參看《文字改革論叢》32—40頁;“新注音漢字”(拼音化)的設計,略見《漢語規範化的基本工具》29—34頁;近几年討論經過和各種樣品,都見《字母與注音論叢》一書中。

# 用拼音字母推广普通話,从推广普通話普及拼音字母

郑林曦

推广普通話必須要有一套字母作为正音、拼写的工具,而国务院1957年12月11日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中的拼音字母,是最好的拼写普通話、纠正方音的工具。

对于推广普通話来说,这套拼音字母好在哪里呢?

第一,汉语拼音字母簡單而完备,合理而实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只利用了25个国际通行的拉丁字母,四个声調符号,就能拼写出全部北京語音。这已經够完备的了,但是还不止如此。在这套草案的基础上再增加若干符号,它还有可能拼写出各地主要方音,在各地編写学习普通話小冊子的时候,用来講明方音和普通話語音的对照关系,帮助方言区群众学习普通話。汉语拼音字母是音素分析的字母,基本上作到了一音一符(两个字母的固定結合,也可以看作一个符号),只有省略(像ê在i,ü后省略为e,ü在j,q,x后省略去头上兩点),几乎没有变讀。这就比較科学合理。并且它基本上还能在26个拉丁字母范围之內解决问题,在印刷、打字、电报上用起来都很方便,所以又可以說是十分实用的。

第二,汉语拼音字母的拼法比較符合北京語音的实际,这就有利于方言地区的人們学会正确北京語音。比如in,ing不像注音字母杂有e母音,weng和ong有分別,ü改作iong等,都是比較合乎北京語音的。这对于教方言地区的人了解北京語音的發音方法,跟自己的方音进行对比,都是有好处的。

第三,拼音字母便于連写成詞,以詞为基本單位,成段成篇的記写普通話,編印普通話書刊。这就使我們能够广泛傳播普通話,并且用拼音的普通話讀物帮助人們把普通話說得比較正确。用拼音字母編詞典、索引等,也要比用汉字容易檢查。

第四,拼音字母的种种实际用途,可以帮助推广普通話。比如,如果把拼音字母应用在打电报上,全国

很多邮电职工就要来学习拼音字母和普通話。如果用于打旗語、灯語,全国部队和少年先鋒队员也都要来学习拼音字母和普通話。用于編目、索引,科学技术工作者为了便于索查,也将乐意学习拼音字母和普通話。

拼音字母对于推广普通話既然有这么好处,我們全国各省市的普通話推广工作者(包括七十万学过普通話的教师在内),就要来努力提倡学习拼音字母,充分發揮大家对学习拼音字母的热情,利用拼音字母的种种便利,来推广普通話。

推广普通話的工作,在1956年上半年一度成为高潮,那是和文改会公布汉语拼音方案原草案分不开的。现在国务院已經正式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不久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討論、批准后,它就將成为全国一致使用的拼音工具。在历史上任何拼音方案都沒經過这么慎重的手續来通过和公布。这也就是說汉语拼音方案有超越过去一切方案的法定地位和群众基础。我們要好好利用这套拼音字母来宣傳,教学,从各方面推广普通話。我們要重新鼓起群众学习普通話的热情,讓他們从掌握拼音字母中学会北京語音的基本成分,然后从熟悉运用字母拼写中,逐步更加熟練、准确地使用普通話。我們要用拼音字母大量編印普通話讀物和工具書,使願意学习普通話的人随时可以找到門徑,得到帮助。我們希望在中小学和师范学校,成人补习学校的課本上早日采用拼音字母来拼注生字、生詞,以便按照国务院的決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討論批准之后,能立即在上述各种学校中逐步推行。

像注音字母在“国語”統一运动中曾經起过巨大作用一样,我們相信汉语拼音字母在推广普通話,促成汉民族語言完全統一的运动中,必定会起大过注音字母千百倍的作用。

汉语拼音方案目前主要用于給汉字注音,統一讀音和推广普通話,它不是拼音文字,因而不能作为拼音

字母拼汉文的,但不成为“文化革命运动”,所以应从1894年甲午中日战役后爱国人士的提倡算起,包括閩南盧鰲章以后各家、1926年的国語羅馬字和1931年的拉丁化新文字說的。)我們应当具体設計,重点設計,尽先完成它在目前急需完成的兩大任务,切实有效地發揮它在社会生活和文教工作方面应起的有利的作用,使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設的道路上加强加快前进的力量和速度。<sup>①</sup>

① 本文所提出的具体設計、重点設計:1)“新注音汉字”的字模和書刊文件;2)用“先綜合”的教学法編印的初小《語文》第1册(或第1册的前半册);3)“定型化”的“現代汉语詞典”等等,大都是属于出版方面的,这在吳玉章同志和我共同發表的《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創造汉语拼音字母的总结》(見1957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第7版)文中所提“逐步推行和使用”的八个方面里,这些設計和实践工作,只是第三方面的一部分。其它具体工作还很多,盼望大家共同提出、討論。



文字来推广。这种推广拼音方案的方针，絕大多数群众和語文学界人士是完全拥护的。可是也还有一些特別迫切希望立即实行拼音文字的人士，感到有些怀疑和失望，誤以为文字改革运动是走了回头路。对这个問題，不能不加以具体分析，說个明白。

当前的文字改革任务之一是“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用来为汉字注音，帮助教学汉字，統一讀音和推广普通話”（草案的說明）。这样作不仅不是走回头路，而且是向前跨了一大步。請热心于立即实现拼音文字的同志們想一想，那些当作拼音文字拿出来的方案（比如國語羅馬字和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三十年来到底有多少人学过、認得和使用？当然我們可以責怪过去的政府沒有支持拼音文字的工作。可是政权的支持，并不是实行拼音文字唯一的条件。比如陝甘宁边区政府曾經規定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可以和汉字同样具有法律地位，然而由于其他种种条件不具备，北拉並沒有作为一种文字在解放区用开。要实现把汉字改为拼音文字的長远理想，个人認为起碼要有两个必备的条件：（一）必須有一套能适应各种需要的拼音文字方案，解决了許多作为文字必須解决的問題（例如按詞連写規則，同音詞区分办法，外来語拼写規則，汉字对写办法等）。很显然，这些問題都还没有在这次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中提及。因此这个方案草案只是一个拼音方案，不是一个拼音文字方案，我們不能也不应当企望把它当作拼音文字来推广。（二）必須使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改革汉字为拼音文字的必要性有充分理解，对于拼音的道理和方法有一定的習慣，对于改用拼音文字有相当的精神准备。至于普通話語音普及的程度，却并不是絕對的前提条件；但是，当然我們也必須承認，会使用普通話比不会普通話的人更容易学会拼音文字。上述这些条件具备了沒有呢？文字改革运动虽然提倡了有六十多年，可是过去还多半局限在知識分子中，可以說广大群众对于这个问题还很不了解。就是在知識分子中，有一部分人对于要不要立即改用拼音文字也还有相当多的疑虑；少数知識分子甚至坚决反对。方音的严重紛歧只是剛剛着手在設法消除。在这种情况下，希望人民政府下一道命令在短期內实行这么一个历史性的变革，显然是不现实的。

正由于上面說的主觀的和客觀的条件还没有完全具备，所以我們文字改革工作者今天把汉语拼音方案的作用規定为給汉字注音，帮助教学汉字，統一讀音和教学普通話，是老老实实的切合实际的做法，一点也沒有玩弄手腕的意思。拼音方案既然不是拼音文字，不能立即代替汉字起社会交际工具的功用；那么在日常生活必然还要使用汉字，在学校和業余學習中必然还要教学汉字。在这种情况下，人們为什么要学

習拼音字母呢？它必定得有用处。給汉字注音和拼写普通話，就是它的最大的用处。人們要讀准汉字的音得學習它；人們要学好普通話更得學習它。这样就使得拼音字母能走进小学、中学、师范学校、成人補習学校和扫除文盲的教室里，讓成亿万的人學習它、使用它。請特別热心于立即实行拼音方案的同志們想一想，是先讓拼音方案在实际运用中逐步为广大群众所熟悉好呢，还是先把它造成一种只有少数热心人士才肯学能用的“文字”，讓它孤零零地去冲破層層障碍好呢？很显然，在帮助教学汉字和推广普通話中实际运用拼音字母，是促成它扎穩根基，广布枝条的唯一正确道路。我們要全心全意地拥护这条正确的道路；我們更要着重从推广普通話的运动中来普及拼音字母，傳播拼音知識。我国長期使用非拼音的汉字，广大群众甚至知識分子，对于什么是拼音，都是不大了解的。如果真能使成千上万的人学会拼音字母，懂得拼音是怎么一会事兒，并逐步能运用拼音字母来讀准汉字的統一讀音，糾正一些自己的方音，学会一点說普通話的本領，这对于文字改革运动來說，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这就不用空話而是用实际行动使文字拼音化的理想更加接近实践一步。推广普通話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是全国人民共同的需要。讓拼音字母来帮助完成这个任务，滿足人民的需要，就会使拼音字母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聞樂見，願意學習。当广大人民群众花費不多的時間就学会了拼音字母，掌握了拼音規則，看得懂注音或拼音的普通話讀物，拼写得出自己的姓名和自己要說的話，拿給另一个懂得拼音字母，会說普通話的人一看就懂的时候，任何陈夢家之流的反对和誹謗，任何知識分子从長期使用汉字習慣中提出的种种疑虑，都將會不攻自破，一扫而空，吸引不住一个群众。如果不預先經過这么一个必要的准备阶段，使群众逐渐熟悉拼音字母，精神上有所准备，光想依靠行政命令来硬推行拼音文字，那反而有可能帶來严重的失敗。

何况，有了一套广泛应用的、統一的拼音方案，語言、文字工作者們用来研究和实验中国文字的进一步根本改革，豈不是更加容易取得成果了嗎？經過适当时期的研究討論、实验，真正提出一种拼音文字的方案来，那时候如果拼音字母和拼音知識已經普及到全国，那么，拼音文字为群众接受的可能，也必然会比今天大得多。

从推广普通話，帮助教学汉字中普及拼音字母，是一条光明大道。一切热心于文字改革和語文研究的同志們，讓我們毫不迟疑地走上这条道路，到处教学普通話，到处傳布拼音字母，使普通話和拼音字母变成亿万中国人民群众的一种隨身本領和普通常識吧！



# 文化下乡和汉语拼音字母

伯 韓

我們要實現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主要目標是使農業機械化，農村現代化，在農村里出現經濟的高潮，同時也就不能不強調文化下鄉，使許多在農業戰線上勞動的人們成為有文化的農民。因為只有有文化的農民才能夠擔當起社會主義農業建設的複雜的任務。

在黨和政府的號召之下，文化的确是逐漸下鄉了，比如藝術團體的巡迴演出，有錢廣播與收音站的設置，各種通俗書刊的發行，科學的普及教育等等。特別是下放幹部到農村去，很自然地使農村里增加了大批的文化生力軍，這些人不但能夠直接地幫助農民搞一些腦力勞動，如合作社里的會計工作、醫務工作、文娛活動，研究生產技術、水利灌溉、肥料、土壤，以及講解四十條綱要，幫助整社、整黨、整團，編寫整風簡報，作調查研究和整理材料等等的事，而且他們還能通過掃盲工作、推廣普通話工作等，迅速提高當地農民的文化知識，培養廣大的有文化的農民隊伍。我們深切地希望下放幹部們除勞動生產外，還在鄉村文化戰線上起應有的作用，尤其要多多注意使文化在鄉村中扎下根子。這就是說，不要忘了掃盲和推廣普通話的這個環節。因為不識字談政治就不容易談清楚，① 不識字也不能談科學技術，而不懂普通話就不能和全國各地的勞動者溝通起來進行集体的工作。

農民生產勞動忙，其他活動也多，因此掃盲工作不容易找到充分的時間。可是通常應用的漢字有好幾千個，不掌握這麼多字，連最淺近的書刊都念不上。讀一屆冬學，能學幾百個字，不管用。唯一的辦法是給所有通俗書刊的漢字都注上拼音字母；而在掃盲的第一階段以學習拼音為重點，索性不著重識字；學習的目標要達到按照字旁的拼音很流利地念出來。別要求脫離“拐棍”。過去祁建華速成識字法的長處在於利用了拼音的方法來識字，在初步學習上不要求“四會”，但是它的缺點在於要求丟拐棍。祁建華同志生怕學員離不開拐棍，往往在拼音還沒有練得純熟，拼起來還很慢的時候就勉強學員們去硬記過多的生字，因而造成學員們精神上過重的負擔和過分的緊張；而這樣硬記起來的方塊字是不容易鞏固的，好多人在過了一個時期之后就忘掉了一大部分，閱讀就不行了。這是由於他只知道漢字是文化工具，不知道字母也是一種文化工具；他不知道只要好好利用字母，同樣也能使人們得到知識，而且在較長的時期內，靠着字母做“拐棍”還可以認識

許多的漢字。

現在漢語拼音方案草案公布了，這一套字母要繼承過去注音字母的任務。在識字教育上我們必須好好地運用它，充分發揮它的作用。我們要吸取祁建華速成識字法的經驗和教訓，全面地來運用這套字母；這就是說，不只是應用在教學上，而且用在通俗讀物、兒童讀物上，用在車站、街道、機關商店等等牌子上，到處注音；就是說造成一切漢字帶拐棍的環境。祁建華同志因為不了解字母是文化工具之一，他就不會提出過廣泛應用字母的建議，而只是用“填鴨”方式叫人家突击生字丟拐棍；我們要繼承他那種分散學習“難點”，不要求“四會”的精神，繼承他那個依靠字母拼音識字的方法，可是另一方面，又必須拋棄他那種突击生字和丟拐棍的辦法。我們要讓初學的人充分掌握拼音知識，一看拼注的字母就能迅速地讀出音來，這樣我們就可以應用篇幅稍為長些的注音漢字文章（比方在一年級就可用三五百字一篇，包括生詞不太多的）來作教材，在教學要求上不要求認識全部的漢字，而只要求能念出那些話來並了解意思。在課堂里學會了幾千個常用的新詞以後，閱讀一定很順利；但是即使沒有學到較多的新詞，光憑日常生活中已經知道的詞來閱讀，也不會有太大的困難，因為現代農民在集体生活中已經掌握了不少的詞，只是不一定認得代表這些詞的方塊字，現在有了注音，就可以入門了。

在掃盲工作上應用漢語拼音字母要有靈活性。在開始學習的階段，似乎是拼本地音比較好。方案是為北京音擬制的，本地音如果沒有恰當的字母表示，我認為可以附加符號。到了字母認熟了，拼音拼熟了以後，就可以介紹北京音，並且說明書上、字典上全是北京音，咱們說話雖然可以用本地音，可是念書還是照北京音念好些。不過對發音不能要求嚴格，有些音發不出，只要“心知其意”，用一個類似的音來代替也就可以了。要農民學北京音，也許會引起一種抗拒的心理，因為不常出門的人特別看重本地語音，所謂“鄉音無改”是過去對出外謀生的人的期望，現在叫他們自己學另一

① 列寧在《新經濟政策與政治教育部的任務》那篇報告里說：“一個不識字的人是站在政治以外的；必須首先教他學習識字。沒有這一點，就不能有政治，沒有這一點，那就只有流言、空談、謊言與偏見，而不是政治。”見人民出版社《列寧文集》第7冊，247頁。

種語音，可能不願意，尤其是老年人是這樣的。但是我想，如果對他們說明北京音不一定用在對話，而只用在讀書方面，這在鄉下還是可以通過的。至少在青年農民中可以通過。我們還可以宣傳學習北京音的許多好處，如聽北京的廣播，看北京來的話劇、電影等，都容易了解；又如到城市開會，勞動模範上北京見毛主席，都有懂得北京話的必要，即使不會說，會聽也沾便宜。

在識字的時候同時學普通話，是不是雙重負擔？是不是會減低教學的效果？我想，只要我們在鄉下不要求人們“說”普通話而只要求照普通話語音讀書，只要我們在第一階段不要求多識漢字而只要求練好拼音，那麼這種學習負擔實際上就不是雙重的，也就不會減低教學的效果。這樣我們雖然暫時不能使學員們認得較多的漢字，但是一定能夠使得他們閱讀某些注音的書報。注音的書報最好能夠按詞分排，另外還要有一種按拼音字母次序排列的小詞典，學員們遇到不了解意思的新詞，可以按照旁邊的拼音字母去查詞典。這樣，閱讀上的困難就容易克服。我們在教學的時候，雖然提倡用北京音念書，但是解釋還是可以用本地話，而且對於老年人或其他不願學普通話語音的人也不必要求念北京音，就讓他們念本地音也行。總之給漢字正音和推廣普通話是要在自覺自願的原則上來進行的。

採用這個辦法，首先得打破一個陳舊的觀念：就是拿識字多少來定識字運動的成績，來定掃盲的成績。我們今後決不應這樣來看問題。我們只能拿閱讀能力來衡量成績，拿學員們獲得文化知識的實際效果來衡量成績。如果學員們上了一屆冬學之後，就能暢快地閱讀一些粗淺的注音的書刊，即使認識的單字比過去少得多，那總還得評一個“成績不錯”吧！

談到鄉村文化，我們還不能忽視小學教師，他們是長期在农村中擔任文化工作的人物。下鄉幹部一定要幫助他們解決一些在兒童教育方面的問題以及本身進修的問題。就推廣普通話這個工作來說，小學教師是比青年農民更重要的對象，因為他們要是掌握了普通話，就可以在學校里教小孩子，而在农村中正規地推廣普通話也只能夠在小學校裏面進行。

關於在鄉村小學推廣普通話的工作，我也認為暫時不必過分強調“說話”，除非教師的確能用普通話教學的應該首先實行外，一般條件不夠的暫時也只需做到按北京音讀書就行了。小學第一學期的學習應該着重字母和拼音的練習，不注重漢字的學習。從第二學期起，可以教較長的課文，生字多些沒有關係，但字旁都要注上音。也和掃盲一樣，不要要求學生全記住課文

里面的生字，自然更不要要求四會。今年聽到許多人批評小學語文教材不好，說一、二年級要學1500個生字，分量太重；是不是小學教科書因此就要修改，就要把一、二年級的生字大大減少呢？我個人的意見是反對故意減少生字的。本來在一、二年級內多教生字是有相當充分的理由的，這就是為三年級能順利閱讀做準備；同時編這套書的人也應用了速成識字法的原理——不要求四會，用字母拼音幫助識字。這一些原理在全國各地小學教師中可能不完全通行，有些人對識字教學還堅決主張“四會”的辦法，有些人不教字母拼音，這當然就產生困難。不過即使不要求“四會”，1500個生字還是不容易掌握，最好是不要要求全部認識，只要能讀注音的課文就算合格，這就可以毫無阻礙地讓我們的小學生也和蘇聯的小學生一樣讀較長的課文了。依照這個精神，一、二年級語文教材還是要適當修改的，因為原來的編輯的目標還是在於勉強兒童硬記生字，課文的內容還是有些貧乏或欠活潑的地方；今後應當着重內容及生詞的安排，至於單字的多少可以不去計算它。從第二學期起，可以逐步進行方塊字的字形教學，由單體字的書寫進到合體字的書寫；同時學會一些同音方塊字的分工；但是並不必要把課文中所有的字都弄的熟習，而只是選一些容易學的先學。這樣經過幾個學期以後，大約到了三、四年級之間，就可以比較大量地識字了。到五、六年級，可以閱讀一些不注音的讀物。但是一般兒童讀物一定都要注音，不要吝嗇這点点注音，因為不注音的書報還是像海洋一樣存在着，它自然會吸引兒童去閱讀的。這樣的教學精神如果要貫徹下去，就不但要对教師們進行宣傳，而且要对學生的家長們進行解釋，否則是不容易推行的。然而，為了適應我們文字的特殊情況，使語文教學獲得更大的效果，就只有這樣做。

最後我要重複一句，為了文化下鄉，必須讓漢語拼音字母盡量發揮它的作用。這套字母是幫助識字的“拐棍”，但是我們堅決反對過早地“丟拐棍”。丟拐棍要聽其自然，當人們閱讀了大量注音讀物，掌握了許多漢字以後，他自然會擴大閱讀面，試着去讀不注音的讀物的。幾年前速成識字法高潮中，黎錦熙先生曾提出不丟拐棍的主張，而受到一些青年積極分子的批評；但是今天對速成識字法竟沒有提起了；我們認為速成識字法採用拼音工具和“分散難點”的教學原理是決不應拋棄的，只是突出生字和丟拐棍的方法不能用。我們大家如果有了這個認識，漢語拼音字母的作用就會充分發揮出來了。（1957.12.21）



# 坚持字母的匯通原則

袁家驊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制定和公布，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件大事，是我国各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一个里程碑。这个方案的制订，正如吴玉章、黎锦熙两位同志所指出，至少已经酝酿了六十多年（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1日第7版）。明末方以智在《通雅》里提出“因事而合音，因音而成字”，可以算是汉语拼音化的首倡。三百多年前的理想终于逐步实现了，关系着中国人民切身利益的文字改革运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们热烈地拥护这个方案，要在实际语言工作中正确地运用这个方案，积极地支持这个方案。

也许有人认为这个方案还不是尽善尽美的，因而抱着或多或少的怀疑和观望态度。这种态度不是推动历史车轮向前进，而是消极怠工，甚至是搬石头阻挡前进的大道。比方说，方案中有四组双字母zh eh sh和ng，同时也规定了简式ê ê ê和η，这种“两可”的办法不是方案自身的一个弱点么？可是我觉得这正是方案的优点，这个“又式”的规定完全符合实际——符合过去的传统和今后的发展的。三五年以后，根据全国推行的经验，文字改革委员会也许会吸取广大群众的意见，考虑并建议作出一些必要的修订。当然，今后对方案建议作任何细微的修订都必须十分审慎。但是，尽善尽美并不等于一劳永逸。特别是关于语言文字的措施，必须从传统和发展两方面考虑问题。

汉语拼音方案不但会受到汉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并且同时也会受到兄弟民族人民的热烈欢迎。许多兄弟民族，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和正确领导下，在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之下，已经或正在设计并制订适合于自己语言文字。少数民族创造文字，主要是为了发展自己的民族语言，同时也是为了更有效地学习汉语汉文。少数民族跟汉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已经在平等的基础上，空前地接近了，并且越来越密切了。少数民族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有了保证，可是为了迅速地提高自己的文化，为了加强民族间的互助合作，也会更迫切地要求学习汉语文，并且不再像过去那样只限于少数人学习，而是普遍地要求学习汉语汉文。所以少数民族在创造文字的时候，考虑到同汉语拼音方案的匯通，贯彻了匯通的原则。所谓匯通，根据我的了解，就是同样的字母代表同样的或相当的音位或音素。匯通的目的和作用是为了互相学习。但是少数民族语言，如侗语族和苗语族的许多语言，和

汉语在语音系统上有很大的差别。要求拼音法则互相匯通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可是在技术上却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例如，侗语语音系统中有两个濁塞音[b]和[d]，实际上往往还带有喉门塞音或喉部肌肉的紧张，严式标音应该写作[ʔb]和[ʔd]，或[ʔb]和[ʔd]，如果不要求跟汉语拼音匯通，用b和d两个字母倒是恰好的。可是汉语拼音方案规定以b、d、g代表不送气的清塞音，侗语也有这么三个相同的、完全对当的音，却没有送气的清塞音p、t、k（侗语标准音没有，南部方言却也有）。为了匯通，侗族同志经过再三的考虑和讨论，从民族团结的愿望出发，终于坚持了匯通的原则，另行创制了两个新字母(ɓ, ɗ)代表侗语的[ʔb] [ʔd]。从纯技术的角度来看，创制新字母会引起种种的不便利。可是为侗族人民的长远利益着想，为侗语的发展前途着想（例如从汉语吸收新词和术语），侗族同志经过再三的思想斗争，一致认为匯通原则必须坚持执行。侗族领导和语文工作同志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完全符合侗汉两族人民利益的。他们在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一年多以前作出这样的决定，就是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汉语拼音方案，拥护汉语拼音方案，这是值得我们感激的！

各民族文字拼音方案的匯通问题，令我联想到汉语自身的，与匯通原理有关的一个迫切问题。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1日社论指出，“汉语拼音方案的用途主要是为汉字注音，来帮助识字和统一读音。”所谓“统一读音”，就是“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以逐渐统一汉民族的共同语言”。1956—57年，与推广普通话运动相结合，开展了全国汉语方言普查工作，目的在找出方音和标准音的对应规律，作为教学普通话的参考，帮助方言区的人民更好地掌握标准音。这是一项艰巨而细致的工作。北方话（或“官话”）的语音系统，跟北京语音的差别不大，利用26个字母说明方音和标准音的对应关系所遇见的困难也许不会太大。可是东南各省的方言有许多语音特点，26个字母是很不够用的。为方言区的人民编写学习普通话手册（以县、市为单位），怎样运用这26个字母，要不要增加一些记音符号（或音标），技术上将遇见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困难，这是不可避免的。解决这类困难问题是纯技术性的。可是技术问题的解决必须服从一个统一的原则，就是匯通原则。比方说，p、t、k代表送气的清塞



音, b, d, g 代表不送气的清塞音, z, c 代表舌尖塞擦音(相当于国际音标不送气的 [ts] 和送气的 [tsʰ]), zh, ch, sh, r (或 ʒ, ʧ, ʃ, r) 是卷舌塞擦音和擦音(相当于国际音标 tsʃ, tsʃʰ, ʃ, ʒ), j, q, x 是舌面塞擦音和擦音(相当于国际音标 tɕ, tɕʰ, ɕ)……等等, 都是拼音方案所规定的, 拼写法則在任何場合(国内或国际)都要服从这统一的規定。換句話說, 汉语拼音方案是一个庄严的系統, 不容許任何人自由改动, 学生写錯了由教师糾正, 朋友写錯了互相糾正。編写学話手冊, 当然也要服从这个原則, 使国际音标服从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方言里相同的、或者完全对当的音, 都要按照汉语拼音方案所規定, 用同样的字母作为記音符号。这就是汉语自身的各方言間拼写或記音方法的匯通原則。

假使我的了解不錯, 汉语方言記音的匯通原則必然会引起一些新的技術問題, 需要由全国的語言学工作者根据汉语拼音方案和国际音标作一番調整和設計, 为全国各方言区編写学話手冊及早作出統一的規定, 避免不必要的分歧和混乱。比方說, 閩南話、吳語和一部分湘語(包括湖北省东南角)有整套的濁声母——塞音、塞擦音和擦音, 不是 26 个字母所能概括的, 必須另行設計。b, d, g 代表了不送气的清塞音, 那么濁塞音只好用一套新符号来表示。近几年內有些出版物利用原有的 b, d, g 在右上角加兩点(b'', d'', g''), 这个办法值得参考, 但是我觉得还不够理想。我記得从前赵元任先生設計过一套音标, 把 b, d, g 和弯头 h([ɦ]) 結合起来, 或者就用双音标——b, d, g 加弯头 h。但是这三个音标的設計(采用上述的任何一种)也只能解决局部問題, 还没有考虑到跟其他符号取得協調和一致。單音标, 双音标, 附加符号的使用應該有个系統,

最好能够符合語音学的原理, 同时尽量跟傳統習慣保持密切的联系。近三四十年來, 方言調查一向应用国际音标, 已經形成了相当完整的系統, 現在为了配合拼音方案的推行, 勢必要作一番新的調整和設計。可是新符号的拟制或旧符号的改裝, 不是一下子就能完全滿意的。最巧妙的設計也得經過一定时期的应用或实践才能讓大家習慣。但是这一类技術性的困难, 要是集中全国語言工作同志的智慧, 我相信是不难克服的。我現在不揣愚陋, 根据汉语拼音方案, 为汉语方言記音試拟一套輔音符号, 目的在引起同志們考慮問題, 并不一定有多少参考价值:

塞音	清、送气:	p t tʰ ɕ k	[pʰ tʰ tʰʰ cʰ kʰ]
	清、不送气:	b d ɖ ʒ g ʔ	[p t tʰ ɕ k ʔ]
	濁:	bɦ dɦ ɖɦ ʒɦ gɦ	[b d ɖ ʒ g]
塞擦音和擦音	舌尖:	z c ʒɦ s z	[ts tsʰ dz s z]
	卷舌:	ʒ ʧ ʃɦ ʃ r	[tʃ tʃʰ dʒ ʃ ʒ]
	舌面:	j q ɕɦ ɕ x ɕɦ	[tɕ tɕʰ dɕ ɕ ɕɦ]

这套符号用来記錄少数民族語言还是不够的, 例如舌根音需要兩套: 舌根前音和舌根后音。我心目中的总原則是: 使国际音标服从汉语拼音方案。如果这个大前提不錯, 我的拟議也許能够得到同志們的諒解和考慮。至于將來为方言調查編写科学报告, 要不要采取同样的措施, 那是另一問題, 需要从長計議的。关于元音符号, 汉语拼音方案中的規定大致符合拉丁字母發音的傳統, 也符合国际音标的系統, 不会引起多大困難問題。

全国語言学工作的同志們, 讓我們積極行动起来, 热烈拥护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 “語文短評”討論

280 [原文]被美軍上士雷諾槍杀的刘自然的妻子奧特华(右)在美国“大使館”門前举行絕食抗議, …(光明日报 1957 年 5 月 30 日 4 版圖片說明) [原評]“举行”在这里是大詞小用, “举行”應該用在至少有兩個以上的人的行为。这里可把“举行”改成“进行”, 或干脆刪去。[討論]“举行”應該用在至有少兩個以上的人的行为嗎? 我看不一定。本刊总 56 期《語文短評》132 条: “我想我虽然早年在上海也常常举行个展……”評改者只修改了“个展”而没有修改“举行”。但这一句的“举行”显然只是一个人的行为。在实际語言里, “举行”用于一个人的主动行为有的是。例如: “他在那里公然举行記者招待会, …”(光明日报 1957 年 8 月 27 日 4 版); 七月, 汪精衛繼蔣介石之后举行清共…。(北京日报 1957 年 9 月 5 日 3 版)。以上几个例子足以証明“举行”是可以用在一个人的主动行为的。

其实即使是一个人“举行”活动, 也还是有很多人参与的。“举行”者不过是活动的主持者罢了。所以, 我認为 132 条, 不修改“举行”是正确的。同样, 本句用“举行”也是無可非議的。(海寬、偉森、河水)

124 [原文] 柏油馬路又直又寬暢, 中間兩条電車軌道, 兩旁是汽車跑道和人行道, 馬路兩旁栽种着綠叶成蔭的行道樹。(萌芽 1956 年 10 月 1 日 7 期 11 頁) [原評](一)……(二)……(三)馬路寬了当然会“暢”的, “暢”字和“寬”字一起修飾“馬路”不必要, 可刪。[討論]“寬暢”本身是一个詞, 比如: “寬暢的大道; 明朗的天”就不能改說“寬的大道, 明朗的天”。可見它本身只代表一个概念, 再不能拆开来解釋了。如果原評的批改能够成立, 那么, 汉语的許多联合式的詞就都可以拆开来当成兩個單音詞来看了。(海寬、偉森、河水)

# 學習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一點體會

林 熹

漢語拼音方案草案已經由國務院正式公布了。這個草案公布以後，必將對全國人民的文化生活產生很大影響。國務院關於公布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決議中說：“應用漢語拼音方案為漢字注音來幫助識字和統一讀音，對於改進學校語文教學，推廣普通話，掃除文盲，都將起推進作用。對於少數民族制定文字和學習漢語方面，也有重大的意義。”漢語拼音方案草案在人民文化生活中所起的各方面的作用都和我們語文工作者有最直接的關係，我們語文工作者應該滿懷熱情地歡迎這個草案，擁護這個草案。

這個草案是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56年2月所發表的最初草案的基礎上產生的。拿原草案和新草案對比一下，就會發現新草案所做的修正是不算太小的。修正總要有原則，初步學習新草案之後，感覺新草案幾乎完全是根據學習和應用的方便來修正的。我們試看下面這幾點的修正：

1) 新草案取消了新字母  $\text{ㄗ ㄘ ㄙ ㄣ ㄤ}$ ，改用原草案的代用式  $\text{zh ch sh ng i}$ ，字母系統變得非常整齊，學習和書寫都很方便， $\text{ㄗ ㄘ ㄙ ㄣ ㄤ}$  給印刷打字等工作所帶來的種種不便也就根本不存在了。

2) 新草案取消了俄文字母  $\text{y}$ ，改為  $j$ ，字母系統變得單純，而且可以避免在手寫體中  $\text{y}$  和  $\text{yu}$  等字母相混。（原草案的  $\text{yi}$  和  $\text{ui}$  在手寫體中是非常不容易分別的。）

3) 新草案把  $\text{au}$  和  $\text{iau}$  改為  $\text{ao}$  和  $\text{iao}$ ，完全避免了  $\text{au}$ ， $\text{iau}$  和  $\text{an}$ ， $\text{ian}$  在手寫體中相混。曾經有一個人用手寫體写出了  $\text{hanhau}$ （喊好），我就完全分辨不出他寫的是“喊好”還是“好喊”，是“喊喊”還是“好好”。這種混淆的情況在新草案中就再也不會出現了。

4) 新草案把  $\text{ung}$  和  $\text{yng}$  改為  $\text{ong}$  和  $\text{iong}$ ，也是為了詞形清楚，便於學習和應用。

5) 新草案規定  $\text{iou}$ ， $\text{uei}$ ， $\text{uen}$  在前面加聲母的時候一律寫成  $\text{iu}$ ， $\text{ui}$ ， $\text{un}$ ，這就使得詞形簡短，書寫方便。

6) 新草案的隔音符號由“'”改作“'”，只在  $\text{a o e}$  開頭音節和前面音節連起來的時候才使用，不但形式清楚，而且作用單純。

上述第二點  $\text{y}$  改為  $j$  的修正使得原草案的好幾個字母要受到影響：新草案用  $j$  代替了  $\text{y}$ ，原草案的  $j$  就改用了  $\text{y}$ ；新草案用  $\text{y}$  代替了  $j$ ，原草案的  $\text{y}$  就改用一個新增加的  $\text{ü}$ 。總起來說是去了一個  $\text{y}$ ，加了一個  $\text{ü}$ ，

整個的改變是： $\text{u} > j$ ， $j > y$ ， $y > \text{ü}$ 。 $\text{ü}$  這個字母德文里就有，並不是我們自己新創的。 $\text{u}$  上加兩點，寫起來自然有些不方便；但是標準音里的  $\text{ü}$  只能和  $j q x n l$  五個聲母結合，而  $j q x$  三個聲母又不能和  $\text{u}$  結合，也就是說標準音里只有  $j\text{ü}$ ， $q\text{ü}$ ， $x\text{ü}$ ，沒有  $j, q, x$  和  $\text{u}$  拼音的。於是新草案規定：“ $\text{ü}$  上面的兩點在極大多數場合可以省去，不會跟  $\text{u}$  相混。 $\text{üu}$ （居） $\text{üu}$ （區） $\text{üu}$ （虛）一律寫作  $jü qu xu$ ；只有在  $n, l$  後面不能省去兩點（例如“女”寫作  $n\text{ü}$ ，“呂”寫作  $l\text{ü}$ ），但是這類字是很少的。”省去  $\text{u}$  上的兩點，也是為了書寫和應用的方便。

新草案沒有說明  $n, l$  和  $\text{üe}$ ， $\text{üan}$ ， $\text{ün}$  三個韻母結合時  $\text{ü}$  的兩點是否可以省。事實上標準音里根本沒有  $n\text{üan}$ ， $n\text{ün}$  這兩個音節， $l\text{üan}$ ， $l\text{ün}$  過去有，現在也不存在了，像“擘”已不讀  $l\text{üan}$  而讀  $luan$ ，“淋”已不讀  $l\text{ün}$  而讀  $lin$ 。 $n\text{üe}$  和  $l\text{üe}$  是有的，但是  $\text{u}$  上的兩點也完全可以省去，因為  $nue$  和  $lue$  這兩個音節在標準音里是不存在的。等到拼音方案用習慣了以後，在日常書寫時，不但是  $n\text{üe}$ ， $l\text{üe}$ ，就是韻母  $\text{üe}$  本身上的兩點也有可能取消，因為  $ue$  這個韻母根本不存在，把  $\text{üe}$  寫成  $ue$ ，不會有任何誤會。

剩下來的只有  $n\text{ü}$ ， $l\text{ü}$  需要在  $\text{u}$  上加兩點， $n\text{ü}$  只有一個“女”字常用， $l\text{ü}$  也只不过只有“驢、呂、旅、綠、律”等十幾個字常用。由此可見， $\text{ü}$  出現的機會非常少，並不會給我們在書寫上帶來很大的不方便。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來，新草案的修正除了個別地方（如聲調符號）以外，幾乎都和詞形的清楚或書寫的方便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根據這樣的原則對原草案加以修正是否正確呢？我認為完全正確。

一般人是會想到這原則正確不正確的，只要拼出來的音節容易寫、容易認，對他們就只有好處，沒有壞處，他們就會歡迎。對我們語文工作者來說，情況就比較複雜一些。自然我們不會有人根本反對這原則，可是遇到和傳統的語音學知識有關的具體問題，就容易糾纏起來，忘掉了這根本的原則。例如新草案把  $\text{ung}$ ， $\text{yng}$  改成  $\text{ong}$ ， $\text{iong}$ ，我們就有可能認為打亂了傳統的开、齊、合、撮四呼的體系；新草案把  $\text{iou}$ ， $\text{uei}$  改成  $\text{iu}$ ， $\text{ui}$ ，我們就容易想到沒有了主要元音，分析音素有困難。

一個語文工作者也許有理由要求拼音方案盡量把實際語音的細致區別都表現出來，並且要求它合於傳



統的語音分類。事實上新草案也確實這樣做了，例如 *ao*, *iao*, *iong* 以及 *uen* 和 *un* 都比原草案更接近於實際語音，四呼的區分也基本上保留了下來，但是這些都不是擬定拼音方案最主要的目的。

拼音方案是幫助教學漢字和推廣普通話的重要工具，是要在日常生活實踐的，它要為廣大的群眾服務，以後將有千千萬萬的人每天都要用到它。因此我們首先應該從實踐方面要求它的形體清楚，書寫簡便，然後才能考慮語音學上的四呼、主要元音以及其他等等問題。廣大的群眾並不需要知道什麼是四呼，什麼是主要元音，一個完全不懂四呼和主要元音的人也照样可以熟練地掌握這套拼音字母。實用的拼音字母要求簡便清楚，語音學的音標要求細致精確，二者的作用並不相同。如果我們由字母的角度來看這套拼音方案，像四呼一類的問題自然就會迎刃而解了。

事實上世界上沒有一種表音符號能夠真正起語音學上音標的作用。例如英語，英語 *cough* (咳嗽) 這個詞，如果按字母讀，應該是(用我們的拼音方案拼寫) *si-ou-you-ji-êq(i)*，可是實際的讀音反而接近於 *kof*，文字和實際讀音之間幾乎完全看不出聯系來。因此，在分析英語的語音系統時，一般都另外採用一套語音學上的音標。

我們的拼音方案和英語以及其他一些語言所使用

的拼音文字比較起來，系統既簡單，拼法也固定。它不但可以幫助我們教學漢字和推廣普通話，如果加上一些輔助性的符號，它還可以立刻成為標寫漢語語音最好的音標。這套方案是根據標準音擬定出來的，它同時也反映出了漢語語音結構的基本特點，因此，只要加上一些輔助性的符號，就可以用來作為調查漢語方言的記音工具。它雖然沒有國際音標細致精確，但是容易學，容易用，做一般的方音調查，已經足夠用了；而且用它來記錄方言，更容易看出方言和普通話之間的關係。這些都是過去注音字母所絕對不能做到的。由此可見，這套方案不但是教學漢字和推廣普通話最好的、最重要的工具，也是記錄漢語方言最實用、最方便的工具。我們語文工作者應該多由根本的原則和所起的作用來看這套拼音方案，而不要只糾纏於個別的零星問題；要求一種拼音方案能夠使每個人從每個角度上都覺得滿意，那是完全脫離實際的想法。

自然，我們並不是說這套方案已經十全十美了，既然是草案，就可能還要修正。它的主要作用既然在於實踐，那麼它的進一步的修正也只有在實踐中取得。因此，我們語文工作者今天首要的任務就是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盡自己的力量宣傳這個草案，使用這個草案，使它在各方面都能發揮最大的實踐作用，從而求得進一步的完善化。

(上接 39 頁)

體詞結構中發展而成的，在這個結構里，前置詞最初充當被修飾的主要詞，因而它在自己的定語後面；由此可以看出后置詞之所以在中心體詞的後面的原故。<sup>①</sup>

因此，那些把后置詞歸入體詞範疇成分之內，把前置詞歸入動詞範疇成分之內的研究者的觀點，也不是沒有一定根據的。

對漢語中體詞狀語形式的分析表明，除了狀語的完全形式(“前置詞——體詞——后置詞”)之外，有時也會遇到不完全形式：“前置詞——體詞”與“體詞——后置詞”。

這兩種不完全形式，可以在中心體詞所表示物體的空間性質由於第二個輔助詞的存在(相應地為前置詞或后置詞)或從上下文看來十分明顯的地方遇到，但所以可能省略輔助詞之一，這一事實本身的原因是狀語成分中有作為狀語結構學形式要素的兩個輔助詞，以致體詞的結構學功能看來似乎是被雙重地表現出來，因此省略其中之一不致改變中心體詞的結構學特性。

當輔助詞除了表示狀語成分中體詞的空間性質之外，還用來確定這個體詞跟其他體詞的結構學關係的

時候，這個輔助詞的省略就是不可能的(參見狀語在主謂語之間時前置詞的使用情形，還請比較狀語在雙成分句句首時后置詞的運用特性)。

#### 本文略號表

毛澤東 《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1951。

巴金，1 《家》，北京，1953。

巴金，2 《巴金選集》，新文學創作選叢書，北京，1952。

巴金，3 《巴金短篇小說集》，上海，1939。

老舍 《老舍選集》，新文學創作選叢書，北京，1951。

丁玲，1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上海，1951。

丁玲，2 《丁玲選集》，新文學創作選叢書，北京，1951。

周立波，1；2 《暴風驟雨》，上下冊，上海，1950。

中國語文 《中國語文》(括弧內指的是期數與年分)。

王力 《中國語法理論》，上海，1951。(括弧內第一個數字表示冊數)

黎錦熙 《新著國語文法》，第8版，1929。

呂叔湘 《中國文法要略》，上海，1951。(括弧內第一個數字表示卷數)

(羅時豫譯自《漢語語法的幾個問題》，1957，莫斯科)

① 關於輔助詞的一般形成過程與原始結構學結構的蛻變，請參考Л. С. 巴爾胡達羅夫的論文《輔助詞及其功能》，《ВИИЯ論文集》，第1冊，1952。



# 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几个问题

## 拓 牧

近六亿人使用的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由于这种语言的文字是表意制的，一套表示这种语言的表音体制，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了，尤其是一套完善的、法定的表音体制。这种表音体制既要能体现汉语的特点、系统，便于广大人民学习，又要适应国际环境，符合现代科学技术的要求。这是跟前进中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利益密切相关的。现在，国务院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这个方案就要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批准，从此我国人民的文化生活将转入一个新的活跃的阶段。

这个方案的优点和用处已经有不少的文章谈到，今天我想说的是有关使用方面的几个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在进一步考虑到推行方面的事项时被提出来了。这兒我只谈一谈我个人的看法，供同志们参考。

### 一 汉语拼音字母的使用范围问题

根据国务院关于公布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决议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说明，汉语拼音字母主要有下列用处：

1)为汉字注音，以帮助识字；2)统一读音，推广普通话；3)帮助扫除文盲以提高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4)改进学校语文教学；5)用作科学技术上的术语和符号以及对外译音；6)利用字母的习惯次序作各种索引；7)我国少数民族在创制和改革自己的民族文字的时候，可以把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共同的基础，并且可以利用它来直接学习汉语；8)语文工作者可以用这套拼音字母研究和实验中国文字的进一步改革。

以上这些用处显示了汉语拼音字母的巨大作用。由此可见，我们不仅要把它作为帮助学龄儿童和文盲认识汉字的拐棍，作为推广普通话的利器（虽然这些方面的作用是主要的），我们还要依靠它在文化生活方面做许多事情，所以已经认识大量汉字的人也应该学会掌握这套拼音字母，不然他就不能享受拼音字母所能有的那些用处。也只有大家都会用拼音字母了，拼音字母的各项作用才能充分实现。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北京协和医院的病历姓名是按照拼音字母的次序排列的，在将近八十万个人的病历中，不到一分钟就可以查出要找的某个病人的病历。而北京图书馆的图书编目却是在汉字形体上打主意，在卡片匣里找一本书要花很多时间。但是北京图书馆为什么不能仿协和医院的办法照字母的次序编索引

呢？因为，医院的病历只要工作人员学会查法就行了，而图书馆的书目和著者索引则是供千万读者来使用的，如果大家都不懂这种查法，虽好也还是不能用。只此一端，就可以看出普遍学会拼音字母的必要了；而一般人也具备了普遍学会的条件。学生是一定要学会的，成人文盲和半文盲也一定乐于学会。知识分子虽然可能有一部分人不大热心，但是好处是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学过拉丁字母和拼音的，只要花费几个钟头就可以了解汉语拼音字母的拼法。我们可以把这套字母看做对汉字的一种补充，正如日本的假名字母是对日本使用汉字的一种补充一样，不承认它，终是缺陷。千百万中小学生、大学生、语文教师和其他语文工作者、机关干部都有义务积极为拼音字母进行宣传，耐心地说服并教会周围的人，首先是自己的家里的人和亲戚朋友。

在推行汉语拼音字母的时候我们也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保守的和急躁的。保守的倾向可能表现在限制拼音字母的使用范围，他们会借口说拼音字母不是拼音文字，因而只允许它为汉字注音，而对于试着独立使用拼音字母拼写语言的做法就发生反感，或者乱扣帽子，限制人家作各种使用。我们认为这种限制是不对的。在上述拼音字母的用处中我们就可以看见它会有不少独立使用的场合。你不能不允许识汉字不多的人临时用拼音字母代替写不出的汉字，你也不能限制少数民族利用拼音字母“直接学习汉语”，你也很难想像拼音电报还要被汉字的形体拴住。至于科学技术上的术语和符号以及对外译音，如果经大家同意采用拼音字母，也就没有必要与汉字并列。拼音文字的研究虽然是专家的事，而一般语文工作者在少数人里边进行他们自愿的研究和实验，也不可以过分反对。所以，有了进步的工具，就要好好利用它，而不是限制它。

急躁的倾向可能表现对政府的方针政策的了解。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1日的社论里谈到：“研究语文的专家可以使用拼音字母来研究中国文字的进一步的改革，但是这是学术性的工作，不属于政府当前所推行的文字改革工作的范围，不应该也不会与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混淆起来。”因此，不仅在名称上不当用“拼音文字”误称现在的“拼音字母”（这种误称常常碰到），而且在实践上也要善于体会政府的方针政策，并耐心向人解释。摆在我们面前的文字改革方面的

既定任务是光荣的同时也是艰巨的。试想一下，如果全体使用汉语的成员都普遍认识并会使用拼音字母了，如果大家都通过拼音字母学会普通话了，如果我们把拼音字母在科学技术上的应用推广开了，那该是多大的好事，我们的文化事业将因此获得多大的便利。我们要为这些艰巨而光荣的工作付出巨大的精力和相当长的时间，不会一蹴而就的。因此，不要急躁，要体会政府的方针政策，要认真贯彻文改工作当前的重要任务，不要放着眼前的迫切任务不作，只一天到晚高谈远景。我们要避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想法和做法。

## 二 关于进一步修订方案的问题

方案草案公布以后有不少人表示拥护，这可以从有关期刊和报纸上的读者来信看得出来。但是也有人对方案的某些地方提出修改的意见或者表示不赞成某些地方。上述人民日报的社论说：“这个草案经过长时间的专家钻研和群众讨论，是比较成熟的，尽管方案本身可能还有一些缺点，日后在实践中仍然可以逐步修正”。面对着这个事实，如果在目前再提出些个人的一偏之见，争论不休，不仅是走回头路不会有大家一致的修正意见，而且会拖长对方案的最后确定和正式推广的时间。这是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利益相违背的。从技术上说，它是一个有系统的东西，在某一点上提出修改，就会牵一髮而动全身，欲理还乱。轻易改动反而会“治丝愈棼”。当然，修正也许是避免不了的，但那应该是“在实践中”经过一段使用之后。所以，如果说这几年来，尤其是1956年2月以来我们在方案的设计方面曾经进行了全国性的大辩论，那么现在就是终止这场辩论的时候，现在是大家协力同心来学习，宣传国务院公布的、将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的这个方案草案的时候。而一旦正式批准之后，就要协力同心来推广这个方案。这才是真正的爱祖国、关心人民文化事业的态度。国务院“关于公布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决议”里说：“汉语拼音方案，…现在由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准备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讨论和批准，并且决定登报公布，让全国人民事先知道。”我们应该充分了解“让全国人民事先知道”的精神所在，它表示争论已经告一段落，大家应好好了解这个方案的内容，了解它的好处和用处，在群众中造成良好的气氛，使它得以顺利批准施行。

## 三 关于字母表的次序、zh ch sh 的名称和它们跟 ü 在字母表中的地位问题

汉语拼音字母表的字母次序是根据拉丁字母表的历史习惯排的，这跟中国过去的习惯不同。我国的音韵研究曾经是受了梵文的影响，从“帮滂并明”到注音字母(ㄅㄆㄇㄏ…)的排法，都是按发音部位排列的。过

去的方法当然有它的好处，今后研究音韵系统和讲语音学还是要用到它们。但是我们的字母表既然按照拉丁字母表的历史习惯排列了，我们就应该为这一种的排列法准备条件，让它能推行开来。我们在现代的文化生活中既然处处离不了abcd和它们的次序，现在既然把abcd当做我们自己的拼音字母了，就应该在次序上取得一致。一切都按同一轨道就不会引起使用上的混乱。假定说忽尔bpmf，忽尔abcd，有时候就会弄得不知道a和b，c和d哪一个在前，哪一个在后。

注音字母的次序是声母表和韵母表的次序，而abcd是一般的字母表的次序，这个次序的特点是子音和母音交织在一起，而且只列单一的字母符号，不考虑字母组合所表示的语音(单一的或复合的)。现代几个重要语言的字母表都是这样。比方，英语、法语、德语的字母表都是26个字母，跟汉语拼音字母的字母表一样。但是它们都有表示单一语音的双字，如英语有ch, sh, th, ng，德语还有sch和tsch。这些字母组合并不因为表示特殊的单一语音而列入字母表。因此，英语的Chinese排起次序来是插入cession和eider中间的，也就是ch插入c的中间。当然，我们也可以找到例外，比方，西班牙语字母表就不是这样，它在c后边(而不是中间)安插了ch，l后边跟上了ll。从影响的大小和通行的范围说，还是前者的成例是主要的，国际间都一致了解的，某些语言的特殊办法是不能为大家所了解和采纳的。

根据这种情况，对于汉语拼音字母里的zh ch sh我们就可以选择比较适当的安排办法。关于zh ch sh，有没有名称(像b读bê, z读zê)的问题，这要结合它们在字母表里所占的地位来解决。字母表里如果有它们，它们就得有名称。国语罗马字的双字母ch, sh, tz, ts等没有列入字母表，自然不存在字母名称的问题。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的ch, ng, rh, sh, zh等双字母是列入字母表的，但北拉方案没有特殊的字母名称，只像注音字母的办法读接近音值的音，因此实际上也不存在双字母名称的问题。新草案没有把它们列入字母表，它们不必有特殊名称是很明显的了。

但是人们不免要说，字母表里可以没有zh, ch, sh，而正式编词典、作索引等等的时候还是可以把它们当作单一的符号放在z, c, s的后边，因为这是汉语的特点。上边已经谈过，从用双字母表示单一的音位说，这并不算汉语独特的特点。人们之所以觉得它们是特点，是受了过去字母次序(声母表的次序)的影响。现在既然有了新的次序了，旧方法就可以不必沿用了。如果把ch排在c的后边而不是插入c的中间，那么，我们向人说cuo音节的字母时说成cê, n,



o, 而說 cha 音節的時候如果說成 cê, ha, a, cha 在 cuo 後就不合理。如果說成 ch, a, ch 就是照音值讀而不是照字母名稱讀, 這就自相矛盾, 時而按字母名稱讀, 時而按音值讀。這也牽涉到略語的問題, 有人認為這三個雙字母 (尤其是 zh, sh) 的出現頻率是很高的, 如果不承認它們的獨立地位, 那麼作略語符號時就該是 z, c, s, 因而跟 z, c, s 聲母的詞相混了。其實略語符號是假定的, 它們本身並不是只有一種代表性的可能。同一聲母里就可以代表許多不同的詞。比方 c 就可以代表“曹、蔡、崔”等姓, zh 也可能是“中國”的“中”, 或者“僮族”的僮。略語符號既是假定的, 就要根據實際情況有時只用一個字母, 有時用兩個或者更多的字母。比方, 俄語寫法里有這樣的例子: карельский 可以略寫為 к., кар., карельск., 它還有這樣的規定: 幾個不同的輔音相連時, 略寫時應該從最後一個輔音截斷。所以是否按單一符號排列雙字母的次序並不影響略寫時用一個字母還是兩個字母, 這完全可以根據實際情況來決定。代表音節的第一個字母不一定就是聲音的全部。比方, 英語的 c, 既可作 carbon, cape 等一系列的詞的略符, 也可以作 chancellor, church, christian, chief 等等的略符。同時, ch 也可以作為略符代表 chapter, child, china 等一些詞。而 chief, church, chapter 等詞則既可以用 c. 表示。假定說英文的 ch 不列入字母表而 china (中國) 可以用 ch. 表示, 我們用 zh 表示“中國”也並不一定要牽涉到它的聲母字母組合始終不拆開的問題。這兒要聲明一下, 略語問題一般是拼音文字里的問題。我們現在的拼音字母還不就是拼音文字, 似乎離了題。其實, 在不使用拼音文字情況之下, 略符還是要用到的。這兒再舉個例子, 公海上的船只需要字母略號表示國籍, 我們中國也不例外。

zh, ch, sh 究竟應該怎樣讀呢? 如上邊所說, 名稱問題是不存在的。提到它們的時候, 如果是按聲韻母的成分叫, 就照它們的音值讀, 比方 zhang 讀 zh, ang, chao 讀 ch, ao. 如果按字母名稱叫, 就全照字母叫, 比方 zhang 讀 zê, ha, a, nê, gê, chao 讀

cê, ha, a, o, 如果照音素分析的方法讀, zha g 就讀 zh, a, ng, chao 讀 ch, a, o. 把 zhang 讀為 zh, a, nê, gê 的樣子是錯誤的, 因為這兒把字母音值和字母名稱混起來了。

至於 ü, 它不存在名稱的問題。因為母音的音值和名稱是一致的, 它在不在字母表里都是一個讀法。在排次序的時候它們跟 u 的區別是個值得考慮的問題。如果 ü\* 始終都是一個樣子, 倒也好辦, 排在 u 後邊好了。這是加符號的字母排列次序的公例, 如羅馬尼亞語的 ș 排在 s 後, ț 排在 t 後; 拉脫維亞語的 ģ, dz, g, k, l, n, š, ž 依次排在 c, dz, g, k, l, n, s, z 的後邊; 西班牙語的 ñ 排在 n 後。問題在於 ü 在有些情況之下省略了上邊的兩點。這時候, 根據字形還是根據字音呢? 如果根據字音, 必然把問題弄得非常複雜, 一般使用拉丁字母的語言也並不這樣處理問題。英文里表示 s 音的 c 和表示 k 音的 c 在排列上並無分別, 同樣 i 不因表示 ai 和 i 而分別排列, 俄語也是這種情況。如果根據字形, 就難免 ü 音有時排到 ü 的地位, 有時排到 u 的地位, 在不習慣的人看來, 把同樣的 ü 音因形式不同而放在不同的位置總是有点不自然。可是我們檢查一下實際的情況, 就知道問題並不是想像的那麼麻煩了。在 ü 行韻母所構成的音節里, 首先出現的是 u 作 ü 音的 ju, juan, jue, jun, 這兒沒有 j 後邊跟 u 本音的音節。其次是 ü, lüan, lüe, 這兒 ü 上的兩點不省, 應該排在 lu, luan, lun 之後; 同樣, nü, nüe 也應排在 nu, nuan, nun, nuo 之後。下邊的 qu, quan, que, qun, xu, xuan, xue, xun, yu, yuan, yue, yun 均無讀 u 本音的相同音節與之對立, 所以也不發生誰先誰後和 ü 音插入 u 音的問題。總的說起來, 由於漢語的語音特別, 雖然在 ü 有時用 ü 表示, 有時用 u 表示的情況下也並不發生 ü 音插入 u 音的現象, 像英語或俄語那樣。

\*ü 跟 zh, ch, sh 等有區別, 前者是給字母加符號表示新的符號, 後者是兩個現成的符號的組合。

(上接 19 頁)

一切都可能解決, 漢語速記的教學、研究工作自然不應該再滿足於過去那種狹窄的範圍了。個人認為, 今後更重要的是: 應該如何根據普通話語音系統趕快制定出一個新的符號方案, 應該如何圍繞着提高速記的教學質量來進行研究工作, 比方如何把漢語的語法、修辭的基礎知識貫串到速記教學中去, 如何利用漢語方言與普通話語音對應規律的資料來建立語音知識課程, 如何利用分門別類的漢語詞彙統計資料來編寫比

較實用的常用詞略符彙編, 如何進行速記在各個部門行政事務中廣泛應用, 等等。

總之, 漢語速記要在各方面得到發展, 跟普通話的推廣密不可分。歷史上的漢語速記研究者以及一切從事速記工作的人們, 曾經直接、間接地傳播過一些拼音知識; 今天在各方面的速記工作者也必將以自己的拼音知識來大力傳播新的漢語拼音字母, 為加速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事業而貢獻出一分力量!

# 我国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胡明揚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公布不仅是我国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我国解放八年以来,工农业生产在党的领导下已经飞速发展,最近宏伟的“农业发展纲要”的公布,更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幅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丽的图画。今后十年内我国的农村将发生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变化;但是,农业生产技术的现代化是和农村的文化普及工作分不开的。不掌握一定程度的文化而要掌握现代的农业技术是不能想像的。学文化的第一步是识字,可是笔划繁多,读音不定的象形汉字是不太好认的。像“一、二、三”这样类似符号的汉字倒还容易,可惜绝大多数的汉字并不如此。比如北方农民称一般的庄稼活为“活茬”(huocha),可是这个“茬”就不好认,在这次讨论“农业发展纲要”中,甚至连一些大学教授也不认得,读一半读成“活在”(huozai)。我们设想一个农民如果认了“在”字,恐怕很难想到加了个草字头的怪字“茬”就是他日常口头说惯了的“活茬”的“茬”字。

为减少识字的困难,加速扫盲工作,制订一套简明的注音工具是完全必要的。邢建华速成识字法的特点就是利用了注音字母来作拐杖,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可是目前公布的拼音方案比起注音字母来,就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注音字母有37个,现在的拼音字母只有26个,在数量上大为减少,并且从语音的角度上来看,新的拼音字母标写语音更为准确。比如过去有不少学普通话的南方人总搞不通为什么u和l能拼出“用”的音来,x和l能拼出“轟”字的韵母来。注音字母照顾汉语的音韵系统是很周到的,但是在实际语音上未免有些出入。注音字母有的字母代表两个音,如ㄅ、ㄌ,现在的拼音字母基本上是一音一字母。此外,过去的注音字母由于数目太多,又和国际形式差别太大,所以无法利用现代化的各种技术设备,这也是一个缺陷。这次公布的拼音字母采用了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形式,除了容易学和字母总数少以外,同时还带来不少其他的方便。因此,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套注音字母,现在另外制订一套拼音方案是完全必要而且是有充分的理由的。

采用拉丁字母来为汉语注音的历史已经有三百多年了,但是过去的各种方案可以说都不如这次公布的合理和容易为大家接受,当然可以商榷的地方不是没有(所以才称为草案,还让各界人士广泛地提意见,以

便最后定案)。举个例来说,过去像“东”这个字,很多方案,包括去年发表的在内,都拼成*dung*,这次改成*dong*,更符合实际读音了。过去替l、x规定用jw作为隔音符号,可是为什么不替u也规定个隔音符号?这次把这个问题也解决了。既使字母形式更为协调,又使利用现代技术设备成为可能。

在这里,我想再简单地谈一谈汉语拼音方案对改进资料索引工作的贡献。在现代社会中一切工作都离不开统计资料。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哪一个机关团体,更不必说学校和研究部门,往往有很大一部分干部在从事不同种类的资料搜集和研究工作。可是资料的编排工作是一个难题,因为事实证明,按汉字笔画编排卡片或是目录索引,往往是不很理想的。按汉字笔画编排的主要缺点是:1)费事。要查一个材料,先得数笔画,数准了还得在同一笔画中去找,找到了在同一汉字项内还得一张张或是一条条地在找;2)不精确。汉字的笔画各人算法不一致,也许多一笔也许少一笔,可是一笔之差就要费半天工夫在上下栏中去找。因为有两个缺点,有时候几乎使千辛万苦做出来的资料无人问津。这无形中对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生活都会是一种损失。现在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就可以利用拼音字母来做索引。按*abcd*音序排列,检查起来既方便,又合于国际习惯。

这不过是拼音方案带来的说不尽的好处中的一种,更重要的好处是前面说的用来加速扫盲工作。因为随着经济建设而出现的文化建设高潮,是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为主要对象的。拼音方案正是为了解决这个基本问题而提出来的,那末,这难道不是一个和当前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問題嗎?

最后,我们要澄清一些人的看法,因为可能还有些人认为拼音字母和简化汉字只是一些文字学家、语言学家的玩艺儿,和社会实际生活无关,一提起来,就不免一笑置之。这种想法是不应该的。要知道,拼音方案是影响到千百万人民能不能迅速地掌握文化,影响到我们日常的政权和文教工作的大事情,我们怎能漠不关心呢?所以说,拼音方案草案的公布,不仅是文化工作者应该动员起来,宣传推广,全国一切岗位上的积极分子也应该来关心这个工作,支持这个工作,为文化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这一伟大任务贡献出自己的一分力量。



#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給汉语速記帶來的好处

張朝炳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1957 年 12 月 11 日由国务院公布了。这个草案的重大意义和作用，同一天的人民日报社論和各报刊有关的文章都談得很詳細。現在，我只就个人的一点体会談談草案給汉语速記帶來的几点好处。

人民日报社論說：“…編輯字典、書目、索引，以及电报、速記等方面，有了拼音字母都要方便得多。”这里所說的速記有了拼音字母的方便，主要是指这样一些情况：1) 拼音字母在速記中作序碼用特別方便。我們知道，速記符号形体簡單，符号之間的差別極小，如果在速記稿中仍然用速記符号作序碼，必須加特殊的附加符号或移行写在显著位置才易于識別。拼音字母形体明确，書写方便，写在速記稿中能自成一类，閱讀起来十分醒目。另方面，說話时(特别是長篇报告或辯論会的發言)每每大項目之下有小項目，小項目之下还可能更有更小的項目，速記中表示这种大小項目的序碼，一般都必须根据情况有所区别，否則譯稿时識別困难。速記为了書写迅速，汉字的各类数碼都不大采用，除了用速記符号(另附加符号)和阿拉伯数字以外，就得用拼音字母。2) 拼音字母在速記中还可以做常用語句的临时代用符号或表示情态的符号。在有的講話場合，由于内容关系或語言关系，有些語句常常重复使用；为了节省書写時間，加快書写速度，就可以利用某一个拼音字母固定代表某一常用詞組或常用語句。在有的會議中，与会者的情态需要記錄时(如“全場起立”、“暴風雨般的掌声”、“齐声欢呼”等)，用拼音字母临时作为描写符号，显然也比純用速記符号如实地記錄来得方便(有的速記方式已有先例)。

以上只是就拼音字母在汉语速記应用方面說的，如果从汉语速記的其他方面来看，拼音方案草案的好处还更多。

首先，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推广普通話，这就使得速記工作中語言障碍的消除得到有力的保証。速記工作者的任务大多是在各种會議場合記錄發言人的講話，每当發言人使用的是一般人难懂的方言时，速記工作者就很难順利地完成本身的工作任务(听講的人也不一定都能听懂)。按說速記工作者由于职务关系，要求發言者的一詞一句都能听得清楚、明白，这應該是很合理的，但是，速記工作者在速記时所碰到的語言障碍多少年来一直存在着。当然，語言

障碍造成的损失或不便，各个部門的工作人员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感受，只是速記工作者感受得特別深刻。解放以来，我們国家在政治、經濟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都达到了高度的統一，因此，从速記工作者的角度說，更希望人人都能在公开的場合用普通話来作为統一的交际工具。过去这只是一種空想罢了，而今天我們却看到了实现这种希望的具体措施，这就是作为推广普通話的有力工具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公布。这是多么使人兴奋的事情！

其次，草案的公布很快就能給汉语速記的教学工作創造出便利条件。任何一种語言的速記方式都是根据本語言的語音系統創制的，一般說，操某种語言的人學習本語言的速記方式應該是比较容易的；可是，汉语速記的教学情况表明，事实并不是这样，有不少人學習汉语速記都失敗于語音上。实际上，任何一个沒有一点語音知識的人，要想以短时期內通过突击方式介紹的一些語音知識来掌握速記，的确是比較困难的，特别是方言区的人；何况有的人在“普通話”这个名称提出了相当時間后还不了解方言跟普通話之間的关系呢！在这种情况下，速記教学的效果無形中就打了折扣。現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不仅即將在学校中推广，而且也必然要在社会生活中大力推广。这样一来，社会上學習普通話的人势必会越来越多，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只要學習过普通話再来學習速記，必然可收事半功倍之效；速記教学方面也就可以充分利用多餘的時間来配备对学生提高質量有作用的課程内容。

再一方面，拼音方案的公布給汉语速記的教学研究工作开辟了新的領域。我們从六十年来来的汉语速記著作中不难看出：过去的速記教学除了單純傳授速記符号外，就談不上配合技术訓練的有关理論課程。甚至前人在汉语語音、語法、語彙方面的研究成果，都沒有被系統地利用到速記技術的學習上；并且速記的研究工作，一向也只限于符号系統跟語音系統如何配置和符号書写問題。解放后一些私立速記学校曾經作过关于音素、音节的調查統計工作，但是，實質上那也是為了如何配置速記符号而進行的。这种情况的形成，一方面固然跟速記研究者的水平有关；另一方面，历史上从来沒有一套完善、明确的語音规范作为依据，也不能說不是一个重要原因。現在有了拼音方案，这

(下轉 17 頁)

# 衷心拥护,認真学习

袁世海 李和曾

我們从小入科班和戏曲学校学戏,虽然那时也有文化課,但是少得可憐,只是一种点綴。不用說学不了什么文化,就是在識字方面,也应着俗語說的那句話:斗大的字認得二升。学戏詞全憑老师口傳心授,假若老师念錯了,我們也就跟着錯下去。有时,我們打算把复杂的大本戏抄个底本,困难更大了,根本不会写多少字,怎能抄写,于是白字也有,自己講符号代表某一个字的也有,千难万苦凑合着写成了一个本子,过几年,自己都不認識了。我們当时因为自己識字有限,以致怀疑到汉字为什么这么麻煩!

艺成出科,踏入社会,开始向各地演出,發覺各地的語言發音,有很大的距离。有时,我們在戏中念出来的字,各地的观众都不能直截了当地明白。例如到了上海,就鬧“皇王”变成“皇皇”,“青蛇白蛇”变成“七索八索”的笑話。我們这时又感觉到各地語言的發音不能統一,也影响了戏曲的發展。

解放以后,党和国家首先提出文字改革的任務,最近又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的草案,这真是全国人民文化生活中的大事。

因为我們从小就遇到学习汉字和使用汉字的困难,在我們仔細地讀了国务院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草

案之后,心里有說不出来的高兴。我們欢呼地說:“党和国家真为我們办事,創制拼音字母和規定汉字簡化,使人更容易認識汉字和使用汉字。并且推广以北京語音为标准的普通話,逐漸統一汉民族的語言。不但便利了像我們这样識字不多的人,而且对于戏曲事業的發展,也起了積極的推动作用。”我們和同学或同行談起我們的感想,他們也和我們一样,为国家这样一个偉大措施而欢呼。

在經濟建設高潮的到来的同时,必然有一个文化建設的高潮,我們戏曲工作者在文化建設事業方面也負有一定的責任。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我們的文化学习是相当重要的。現在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使我們在文化学习方面得到無限的便利,这真是我們最高兴的一件事。

党和政府对于文字改革工作,采取了積極的稳步前进的方針。我們必須認識:当前的文字改革工作,不是为了廢除汉字而代之以拼音文字,而是为了改良現在适用的汉字,使其更便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学习和使用,同时逐步統一汉民族的口头語言。这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設最主要的項目之一。我們应当衷心拥护,認真学习。

## 語文工作者座談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1957年12月25日,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的中文系汉语教研室、普通語言学教研室、外国留学生中文專修科联合举行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座談会。出席會議的有語言所和北大的語文工作者丁声树、王还、邓懿、石明远、朱德熙、呂叔湘、林燾、李荣、陆志章、肖家林、罗常培、郑冀、岑麒祥、周定一、周祖謨、周殿福、赵榮普、魏建功、宁渠等和上述兩單位的其他工作人員共三十余人。座談会由語言研究所副所長呂叔湘主持。

會議开始时,呂叔湘叙述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公布前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务院汉语拼音方案审訂委员会,以及国务院全体會議如何慎重审訂方案的大致經過,隨即希望参加座談的同志在如何推行,如何利用方案等方面着重發表意見。

先后相繼發言的有魏建功、周祖謨、陆志章、岑麒祥、林燾、邓懿、肖家林、李荣、周定一、赵榮普等。大家对方案的公布一致表示热烈拥护,并各自从学习普通話使用注音字母的不便,从工作上的急切需要,从方案順利公布的情况等方面來說明方案的优点比注音字母多,方案的公布已迫不及待,只有在新社会才可能使方案順利公布并得到順利推行。有人給方案提出了在教学上值得注意的一些問題。有人談到如何在方案的基础上,增加部分符号以滿足記錄方言和少数民族語言的需要。也有人在方案的某些細節上提供了一些建議。

最后,語言研究所所長罗常培強調指出,方案不一定是完善的,但它是广大人民群众所迫切需要的。正因为如此,我們的国家领导同志对汉语拼音方案的公布十分重视。罗常培希望参加座談会的同志,在宣傳汉语拼音方案的时候,必須讓每一个人認識到:拼音方案的公布是党和政府从六亿人民的利益出發的重大措施,不仅汉族人民迫切需要,少数民族也迫切需要。同时,要求語文工作者能为这一重大措施广为宣傳。(秋甫)



# 閩南方言的虛字眼“阿”和“仔”\*

黃丁華

現在就研究閩南方言的已有著作看來，語音方面還是談得不够，詞彙、語法方面更只是初步的研究。這裡，我從舊存的零碎筆記中先整理出一些虛字眼來討論，並且拿來跟普通話作比較。這樣作也無非是“拋磚引玉”的意思。

我所要討論的虛字眼有三組。本文先就第一組的“阿”和“仔”來談談，第二組的“在、着、里”和第三組的否定詞及其相關的能願動詞，以後另談。因為有的是詞，有的不是詞，有些個還牽連到實詞；可是主要地是要談這些字眼的語法作用，所以籠統稱之為“虛字眼”。為了討論方便，也借用了一些比較通行的語法術語，主要是借用初級中學《漢語》課本的。不過，閩南方言的成分跟普通話的多少有點兒差異，借用的術語就不一定跟原來的概念完全相同，這是要聲明的。

《語文知識》上曾有人討論過閩南方言里的“仔”，可是“仔”還有好些用法漏掉沒談。又有人把“阿”和“仔”混同起來，說“閩有話稱單名可以叫‘仔平’或‘平仔’。”<sup>①</sup>其實前者該是“阿平”。實際上，“阿”和“仔”不但讀音有異，而且用法也不同，不好混起來。

阿 “阿”是名詞詞頭，有三種用法：

1.1 加在單音名前頭，念[aɿ]（陰平），帶有彼此熟悉的意味。如“阿和”[a-ho]，“阿平”[a-piŋ]。要是雙音名，如“和平”，就省掉一個字，稱如單名；習慣上總留下後一個字稱“阿平”，很少稱“阿和”。“阿”在閩南方言里不加於姓前，如廣州話的“阿李”；也不加於排行，如蘇州話的“阿三”。閩南方言倒是如普通話稱“老李”“老三”。“老”念上聲[dau˥]。

1.2 加在親屬稱謂前頭，常用於當面稱呼，也就是呼格，還是念[aɿ]。漢語的呼格大都不很嚴格，背後稱呼也可以用。但是，用於背後稱呼的另有一個“阿”，要念上聲[an˥]，具體用法依輩份親疏而有所不同。例如下表：

稱謂：	公(祖父)	母	伯	兄	妹
當面：	aɿ-kəŋ	a-bu	a-peʔ	a-hiã <sup>②</sup>	a-be
背後：	同上	dau-buan-peʔ	aɿ-hiã	sio-be	

祖父母及更上輩的都稱[aɿ]，當面或背後不分。父母當面稱[a]，背後用“老”[dau˥]（陽去）。伯父母並包括其他父輩親屬，[a][an]用法有別。兄弟輩的背

後也稱“大”[tua˥]，弟妹輩的背後都稱“小”[sio˥]。“大”“小”都沒有意義，除非是在注意區別排行。<sup>③</sup>

1.3 “阿”念上聲[an˥]，跟稱代助詞“兀”[e.ɿ]④結合成“阿兀兀”，用以稱人，帶有輕視、戲謔的語氣。“兀”可以省去，但那語氣也就較弱。例如：

“阿癡兀”[a-gəŋ-e]（傻瓜蛋），“阿散兀”[a-san-e]（游手好閑者），“阿多兀”[a-hioŋ-e]（多巴佬）…；“阿癡”[a-gəŋ]（傻子），“阿肥”[a-pui]（胖子）…。

北京方言沒有“阿”這個詞頭。普通話從南方方言（主要是吳語）吸收了少數幾個，如“阿哥、阿姨”“阿貓、阿狗”，“阿”可都念為去聲了。普通話的親屬稱謂多採取迭音方式，第二音節讀輕聲，如“爺爺、媽媽、姐姐、弟弟…”。也是不很嚴格的呼格。

近幾年來，閩南人也學來了迭音稱謂。可是聲調學歪了，不管是“媽媽”“弟弟”…，一律念陰去、陽平，如[ma˥ ma˥] [ti˥ ti˥]，聽起來有點兒怪聲怪調的。

仔 “仔”原作“𪛗”，也是方言字，本義是“兒子”。唐代顧況《上古之什補亡訓傳》詩第十一章“𪛗”：“𪛗生閩方…”，題下自注云：“𪛗音塞，閩俗呼子為𪛗。”《集韻》：“𪛗，九件切，閩人呼子曰𪛗。”“𪛗”，閩南讀書音[kian˥]（上聲），福州方言[-n]併入[-ŋ]，讀[kian˥]（上聲），音義均相當，俗寫也都作“仔”。但是，閩南方言通行的卻是說話音：漳廈說[kia˥]，泉屬大都說[kã˥]。作為虛字眼，漳廈變讀[a]，泉屬

\*這裡討論的閩南方言以廈門話為代表，漳州話、泉州話等只是附帶提到作為參照。標音用寬式音標，虛字眼第一回出現標上聲調。音值都根據我自己的記音，跟專家們所記的偶有出入，這只好另文討論了。

① 《語文知識》1956年8月號：《閩南話的“仔”並不那樣簡單》之（三）。

② 本文標音用[~]加在主要元音上，是表示整個音節鼻化的。

③ 區別排行時，閩南方言還可以說“大阿兄”“細小弟”。

④ “兀”就是“其”字，相當於普通話的“的”。“其”“箇”“格”等是一系，“之”“底”“地”“的”等是一系，都是古漢語的代詞演化來的。

多数仍讀[kāŋ]。咱們要討論的是虛字眼的“仔”。

1.4 “仔”附在人名后头,也帶有熟悉者的意味,如“和仔”“平仔”“和平仔”。要是再加詞头“阿”,如“阿平仔”,那是熟悉而又熟悉,已是亲近者的爱称了。这里“仔”要讀輕声[a.](等于陰去的短調)。試比較“名叫珠仔”和“一粒珠仔”。前者是輕声[tsu- a.],后者是重音[tsu- t- aŋ](參照1.6)。

这一用法本来只用于小輩,泉州話至今还是这样,漳廈却跟語气助詞“啊”[a.](俗写作“吓”)混,漸漸不拘輩份了。至于稱謂的“阿母啊”“阿兄啊”…,显然不是“仔”,因为泉州也叫[a.]而决不叫[kā.].

1.5 “仔”仍讀輕声,附在單音方位詞后头,隱含着那方位相距不远的意义。例如“边仔”[pī-a](旁边),“中仔”[tiŋ-a](中間),“前仔”[tsiŋ-a](前面),“后仔”[au-a](后面),“頂仔”[tiŋ-a](上面),“下仔”[e-a](下面)…。迭音的剛相反,乃表示那方位之最者,如“边边仔”,“中中仔”“頂頂仔”…。非迭音的复音方位詞,很少加輕声的“仔”,个别几个如“边头仔”[pī-thau-a](旁边),“中央仔”[tiŋ-ŋ-a](中間)。

这一类跟后面 1.7 B 項的复音方位詞加重音的“仔”偏指处所稍有不同。

这以下,“仔”都讀重音,用法和含意都比較复杂些。

1.6 “仔”用作名詞詞尾,表示小或少,也就是細小格。

- A. “刀仔”[to-a],“竹仔”[tik-a],“鳥仔”[tsiau-a],“团仔”[kin-a]或濁化[gin-a](孩子)。
- B. “鋸仔”[ku-a],“鑿仔”[tshak-a],“站仔”[tsŋ-a],“篋仔”[khuan-a]。这些个動詞須是原先已經兼作名詞,并非加“仔”才变。
- C. “姨仔”[i-a](小姨子),“舅仔”[ku-a](小舅子),“小叔仔”[sio-tsik-a](年幼的小叔子),“新妇仔”[sin(m)-pu-a](童养媳)。
- D. “五里远仔”[godi hŋ-a],“一文悬(高)仔”[tsit tŋ kuāi-a],“尺半闊仔”[tshio? puā khua?-a],“三兩重仔”[sā niū taŋ-a],“一刻久仔”[tsit khā? ku-a]。这里形容詞变为抽象名詞,并且含有估量的意思,前面必須加数量詞。要不然,就只限于称人的,例如:“矮仔”[ue-a],“蠢仔”[gŋ-a](傻子),“阿肥仔”[a-pui-a](小胖子)。
- E. “看看仔”[khuā khuā-a],“等等仔”[tan tan-a],“行行仔者”[kiā kiā-a tse],“歇歇仔者”[hio? hio?-a tse]。單音動詞迭用,第

二个加了“仔”也变为抽象名詞,后头通常帶着語气助詞“者”[tse.],①表示稍微試一下。

A. B. 兩項如果还要極言其小(例如指小孩兒的玩具),可以再加“团”。泉屬“仔”“团”同音就加“嬰”[i-].例如:“椅仔团”[i-a-kiā],泉州是“椅仔嬰”[i-kā-i]。

1.7 “仔”用作時間詞、处所詞、量詞、形容詞或動詞的詞尾,也是細小格,可以算作 1.6 的附类。

- A. “頂日仔”[tiŋ-dzit-a](前几天),“下月仔”[e-ge?-a](下个月),“旧年仔”[ku-nī-a](去年),“些陣仔”[tsit-tsun-a],②(这会兒),“彼陣仔”[hit-tsun-a](那会兒),“底时仔”[ti-si-a](什么时候),“今仔日”[kin-a-dzit]或[kiā-dzit](今天),“明仔早”[bin-a-tsa]或[miā-tsa],“头先仔”[thau-siŋ-a](剛才),“較停仔”[kha-thiŋ-a](等会兒)。加了“仔”帶上不很久的語气。
- B. “些位仔”[tsit-ui-a](这兒),“彼位仔”[hit-ui-a](那兒),“些在仔”[tsit-te-a]③(这里),“彼在仔”[hit-te-a](那里),“那一在兒”[to tsit te-a](哪一个地方),“那落仔”[to-do?-a](哪里),“頂面仔”[tiŋ-bin-a](上头),“下底仔”[e-tue-a](底下),“头前仔”[thau-tsiŋ-a](前头),“后面仔”[au-bin-a](后头)。“在”本是处所,其他方位詞加上“仔”也偏指处所。“位”“在”都必須跟代詞結合。这一項的“仔”帶有那地方距离不远或範圍不大的意思。“在仔”往往合音成[taŋ],就像陝北方言的“达兒”了。
- C. “四兩仔”[si niū-a],“半斤仔”[puā kun-a],“五条仔”[gō tiau-a],“三双仔”[saŋ saŋ-a],“一点仔”[tsit tiam-a]。“仔”一加上,也表示少或小。
- D. “淡薄仔”[tam-po?-a](微少),“小可仔”[sio-khua-a](微、小),“零星仔”[dan-san-a],“輕輕仔”[khin-khin-a]。这一項一般作定語,原詞語义多是消極的。語义要不是消

① 閩南方言“者”作为語气助詞,表示祈使、商量的語气,跟唐宋元詩文中所見的表語气的“著”“者”“咱”“則箇”相当。請參閱呂叔湘《釋景德傳燈錄中在、著二助詞》,載《漢語語法論文集》,科学出版社,1955。

② 《尔雅·釋詁》:“些、已,此也”。《集韻》:“些,蔣氏切”,現在泉州音 tsiŋ;又“資昔切”,現在漳廈均音 tsitŋ。

③ “在”,处所也,如“所在”[so-tsai]。“在”說話音是[teŋ],



極的，只能作補語，後頭往往還要帶“者”，例如：“算清楚仔者”[sq tshiq-tsho-a tse]，“打扮整齊仔者”[tā-pan tsin-tsue-a tse]。

- E. “歇睏仔”[hio?-khun-ā]（休息會兒），“看覓仔”[khuā-bia-a]（看一看），“拍算仔”[pha?-sq-a]（打算一下），“帮忙仔”[paŋ-baŋ-a]（帮忙一下）。復音動詞加“仔”，帶“者”不帶“者”，都一樣普遍。

跟1.6類的稍微有點兒不同，這一類的A. B. 兩項，“仔”的語法作用已經弱化，加“仔”不加“仔”，用起來不很嚴格；C. D. E. 三項都並不名詞化。

1.8 用於稱人，本不算小而加“仔”，一般是憎稱，帶有特殊感情相反是愛稱。以憎稱翻作愛稱，也本是修辭通例。

- A. 附在身份、職業、籍貫等等：“少爺仔”[sinu-ia-a]“後母仔”[au-bu-a]，“看命仔”[khuā-miā-a]，“賊仔”[tshat-a]，“土匪仔”[tho-hui-a]，“美國仔”[bi-kok-a]，“日本仔鬼”[dzit-pun-a kui]，“天壽仔”[iau-siu-a]，“短命仔”[te-miā-a]。這一項完全是憎稱。

- B. 嵌在姓與名之間：“秦仔檜”[tsin-a kue]，“曾仔國藩”[tsan-a kək-phuan]，“袁仔世凱”[guan-a se-khai]，“汪仔精衛”[aŋ-a tsin-ue]。這樣叫名，鄙惡之情非常強烈。

- C. 附在稱謂的：“大姊仔”[tua-tsi-a]，“兄嫂仔”[hiā-so-a]，“四叔仔”[si-tsik-a]，“阿姨仔”[an-i-a]。

- D. 附在人名的：“紅娘仔”[aŋ-niū-a]，“益春仔”[iau?-tshun-a]，“寶玉仔”[po-giok-a]，“平仔”[piŋ-a]。這裡的“仔”仍讀重音，跟1.4類讀輕聲的稍有不同。

C項的一般是憎稱，不過憎的味兒較A項輕微得多了；要是用於戲謔或人前避嫌，也可以翻作愛稱。D項的是愛稱，通常稱小輩；要不是小輩，那只有帶點兒戲謔或避嫌的情味才這麼稱呼。

1.9 嵌在物品或處所的名詞中，由表示大家所熟悉的漸漸成為專指：

- A. 物品：“鈕仔丹”[diu-a-tan]（一種成藥），“片仔癭”[phin-a-həŋ]（一種成藥），“竹仔枝”[tik-a-ki]（成塊成條的豆腐皮），“青仔米”[tshī-a-bi]（一種顏料，有時只說“青仔”）。這一項跟“刀仔柄”“賊仔目”等用帶“仔”的一個詞跟另一個詞合成的不同。專指的，“仔”不能省；合成的，“仔”去掉詞義不變。

- B. 普通處所變為專指地名，對照如下：

處所：	港後	河墘	山頂	塔脚	橋頭
地方：	港仔後	河仔墘	山仔頂	塔仔脚	橋仔頭
	[kaŋ-a- au]	[ho-a- ki]	[suā-a- tiŋ]	[tha?-a- kha]	[kio-a- thau]

顯然的，這一項嵌入式的跟附加式的“魚仔市”“竹仔街”“釣仔巷”或普通話的“雀兒山”“井兒胡同”等不同。“後”“墘”“頂”等是後附的方位詞，並不像“市”“街”等以名詞作中心詞。

1.10 用在對稱的名詞詞組上，表示1)彼此間親近的，或者2)好些個一起的。後一含意恰好跟細小格相反。

- A. 用在稱謂上的，“仔”的位次要依習慣，大體上跟親疏有關，嵌中和迭用的不好隨便援例。分列如下：

“翁仔某”[aŋ-a-bə]（夫妻，“某”是同音借用），“父仔团”[pe-a-kiā]，“母仔团”[bu-a-kiā]，——含意1)；

“翁仔某仔”，“父仔团仔”，“母仔团仔”，“公仔孙仔”——含意1)和2)；

“翁某仔”，“父团仔”“母团仔”，“公孙仔”，“兄弟仔”，以及其他一切親屬對稱，——含意1)和2)。

- B. “鷄仔狗仔”[kue-a-kau-a]，“脚仔手仔”[kha-a-tshiu-a]（指幫同做事的人，有時也可以是本義聯合），“今仔明仔”[kin-a-bin-a]（經常、不時），“五仔十仔”[gə-a-tsap-a]（這麼些那麼些）①。——含意2)。

1.11 嵌在迭音動詞中，或用作狀語語尾，也跟細小格相反。例如：

- A. “看看看”[khuā-a-khuā]，“坐仔坐”[tse-a-tse]，“叫仔叫”[kio-a-kio]，“想想想”[siū-a-siū]，“變仔變”[pi-a-pi]。表示這動作、行為或變化已經作過了好多了，這跟以輕聲音節作韻字的“看啊看”不同。

- B. 用作狀語語尾。例如：“緩仔食”[un-a-tsia?]，“懸仔想”[gəŋ-a-siū]，“輕仔拍”[khin-a-pha?]，“慢仔大”[ban-a-tua]。又：“認真仔讀”[dzin-tsin-a thak]，“出力仔踢”[tshut-dat-a that]，“放心仔睏”[paŋ-sim-a khun]，“細聲仔笑”[sue-siā-a tshio]，“笑笑仔講”[tshio-tshio-a kəŋ]，“步步仔行”[pə-pə-a kiā]，“常常仔來”

① 數詞帶“仔”也已經名詞化。不過，這是賭牌九的術語。如“三仔”“五仔”就是三點仔的牌五點仔的牌。有些人借用過來，表示“這麼個數兒”，帶有同行語色彩，不大通行，本文不加論列。

[sion-sion-a dai], “不时仔去” [put-si-a khi], “好好仔学习” [ho-ho-a hak-sip], “慢慢仔红” [ban-ban-a aŋ], “赶紧仔大” [kuā-kin-a tua]。

“仔”的用法和作用大抵已如上述。还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同安話里加“仔”的变音。同安是廈門的緊鄰。同安話里凡是[-a]的开尾音节帶了“仔”就必定加上[i]尾,即使是鼻化的或附喉塞音的[-aʔ]也不例外。这是語音异化作用。例如:

泡 [pha] : 泡仔 [phai-a]  
 籃 [nā] : 籃仔 [nāi-a]  
 鴨 [aʔ] : 鴨仔 [ai-a]  
 車 [tshia] : 車仔 [tshiai-a]①  
 鏡 [kiā] : 鏡仔 [kiāi-a]  
 蝶 [iaʔ] : 蝶仔 [iai-a]  
 帶 [tua] : 帶仔 [tuai-a]  
 山 [suā] : 山仔 [suāi-a]  
 屨 [thuaʔ] : 屨仔 [thuai-a]

这种异化跟北京音里“媽啊”变“媽呀”相似而不尽相同:第一,同安語是逆行异化,后音使前音异化;北京音是順行异化,前音使后音异化。第二,同安話的异化跟“仔”的語法作用結合着(別的[-a][a]相遇并不异化),是語法意义的形态变化;而北京音的异化却單純是語音現象。

現在把上面所論列的綜合起来,閩南方言的“阿”和“仔”的語法作用基本上有三种:1)表熟悉。达到如所周知的程度就成为專指。2)細小格。相对的作用可以叫作“頻繁格”。3)憎称和爱称。这三种作用其实也是相联系的。熟悉滋生感情,是爱称;熟悉也会

产生輕視,那是憎称。細小的就瞧不起,是憎称;細小的也引人憐惜,又是爱称。

“阿”是普通話所沒有的,那么,“仔”呢?就語源及語法作用說,跟“仔”相当的,普通話是“兒”(兒化)和“子”。当然,“仔”跟“兒”“子”并不完全相等。主要的差异有下面三点:

1) 閩南方言“仔”的用法种类較普通話多一些。普通話的“兒”“子”沒有“仔”的 1·8 A、B, 1·9 A、B, 1·10 A, 1·11 A 等項用法。而普通話里有加上“兒”“子”变了詞义的,閩南方言倒非常少見。例如:“信兒”(消息),“帽兒”(最好的),“路子”(方法)“門子”(門路、緣由)。

2) 閩南方言“仔”的語法意义較明显,限制也較严,用起来不像普通話那么寬泛。普通話的“大盤兒”“長袍兒”“高高兒个子”“大釘子”,不合細小格。閩南方言里,“大”“長”“高”这些詞只有用于比較才加得上,不然就得去掉“仔”。普通話的“平兒”“寿兒”“祥子”“二虎子”也無所謂爱憎,而且“兒”“子”大都是本名,并不是称叫时才加上的。

3) 称代助詞也在这里交錯着(当然,用詞尾的跟用助詞的含意不完全相同),有閩南方言用“仔”普通話只好用“的”的,如“看命仔”(看命的)、“牽猴仔”,[khan-kau-a](拉綫的)也就是动宾式的“的字結構”。有普通話用“兒”“子”而閩南方言用“兀”的,如“瘋子”“瘦子”“干淨兒”“熱鬧兒”“有了吃兒”“別的唱兒”这一类比較多。

① [iai] 的实际音值是 [ɿɿ], 本然的同安話以至全部閩南方言都沒有这一韵母。



# 揚州方言里的程度副詞“蛮”和“稀”

刘培倫

和普通話“很好”“很坏”中的“很”相当的程度副詞，在揚州方言里除了“很”以外，还有“蛮”和“稀”。

“蛮”和“稀”經常附加在形容詞(或詞組)的前面。

## A 蛮

桂花蛮香的  
糖蛮甜的  
天气蛮暖和的  
王小明是个蛮勇敢的孩子  
他蛮大方的  
汽車走得蛮快的  
雞蛋蛮便宜的  
桌子上蛮干净的  
他生得蛮好看的  
吃飯的人蛮多的

## B 稀

厕所里稀臭的  
今天魚煮得稀苦的  
身上稀冷的  
我心里稀害怕的  
他稀小气的  
船走得稀慢的  
雞蛋稀貴的  
地上稀靜的  
他生得稀难看的  
生产的人稀少的

兩組里的形容詞(或詞組)是反义詞。A組的形容詞都是表現事物的正面或好的、積極的一面;B組的形容詞是表現事物的反面或不好的、消極的一面。普通話“很香”“很臭”中的“很”，只單純地表示“香”和“臭”的程度;而揚州話的“蛮”和“稀”，除了表示相当于普通話“很”的程度外，还附着了人們的“喜爱”与“厭惡”的感情色彩。揚州人在表达自己“喜爱”的感情时，都用“蛮”，不会用“稀”;而在表达自己“厭惡”的感情时，都用“稀”。一般的說，这个界限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这不等于說某些形容詞只能用“蛮”，而另一些形容詞只能用“稀”。例如：

硬 { 面下得蛮硬的，我頂欢喜。  
飯煮得稀硬的，我不能吃。(有胃病)  
爛 { 蹄子爛得蛮爛的，真好吃。  
路上稀爛的，难跑得要命。  
热 { 鍋里的飯还是蛮热的呢，赶快吃吧。  
我身上稀热的，要脫衣服了。  
冷 { 茶已經蛮冷的啦，可以喝了。(在夏天)  
我身上稀冷的，要回家穿衣服了。  
快 { 我們的車子走得蛮快的，馬上就可以到了。  
你走得稀快的，我赶不上啊!  
慢 { 車子走到万福桥蛮慢的，正好讓我看看大桥。  
船走得稀慢的，真叫人着急死了。  
远 { 他手榴彈擲得蛮远的。  
王家溝离我們村子稀远的，要三四个鐘头才能跑到呢。  
近 { 小菜場离我家蛮近的，买菜真方便。  
曹王小学校址离汽车站稀近的，才不好呢。

早 { 他每天总是起得蛮早的，真是个好学生。  
这几天睡得太迟，起身又稀早的，我身体吃不消。  
晚 { 社員們每天总是工作到蛮晚的才收工。  
現在已經稀晚的了，天又黑，我不高兴去了。

从以上例句看来，象“硬”和“爛”、“热”和“冷”等反义的形容詞，可以附加“蛮”，也可附加“稀”。但原則仍只有一个：表含有“喜爱”感情时用“蛮”，表含有“厭惡”感情时用“稀”。

有一些表示事物正面的形容詞，它們本身含有積極的、好的概念。这些形容詞(或詞組)不会附着“厭惡”的感情色彩，因而在它們的前面就附加“蛮”，一般不附加“稀”。如

他待人蛮和气的。 这所房子还是蛮有用的。  
他蛮大方的。 那样的做不是蛮光荣的吗?  
陈鹤同学蛮聪明的。 这种花样蛮好看的。  
郑华表现得蛮積極的。 我心里蛮愉快的。  
你說得蛮有理的。 舅舅蛮欢喜的。

上面例句中如果用了“稀”，就变成了反語或幽默諷刺的話。

相反地，有一些表示事物反面的形容詞，它們本身含有消極的、不好的概念。这些形容詞(或詞組)不会附着“喜欢”的感情色彩，因而在他們的前面就附加“稀”。但是如果用了“蛮”，还是可能的：

李小宝平时蛮落后的。  
这个孩子蛮調皮的。  
我心里蛮难过的。  
三角蛮难学的。  
桌上蛮靜的。  
外面蛮黑的。

上面这些例句中的形容詞(或詞組)“落后”“調皮”“难过”“难学”“靜”“黑”，應該附加“稀”;但在它們前面附加的却都是“蛮”。在这些句子里，是不是“蛮”和“稀”一样附着了“厭惡”的感情色彩呢？不。“蛮”和“稀”终究是不同的。“蛮落后的”和“稀落后的”不同。“李小宝稀落后的”中的“稀”，不仅表示程度“很”，而且对李小宝的“落后”含有卑視、厭惡之感。“李小宝蛮落后的”中的“蛮”，也表程度“很”;但附加“蛮”是說明說这句话的人，对李小宝的“落后”有憐惜、同情之感。这是因为“蛮落后的”中的“蛮”仍是附着“喜爱”的感情色彩。“落后”是人所厭惡的，当它前面附加了含“喜爱”感情的“蛮”，便减弱了“落后”这个詞儿所附着

的“厭惡”的感情。因此，我們可以說：“李小宝蜜进步的”和“李小宝蜜落后的”兩句中“蜜”的意思和感情色彩完全是一样，不因为所附加的形容詞性質不同而有所改变。

还要說明的，在表“好”“积极”意义和表含有“喜爱”感情的句子里，無論如何不能附加“稀”。但是在表示“厭惡”感情的句子里，虽然形容詞是表示“好的”“积极”的，也应该加“稀”。比方：可以说“桂花蜜香的，真好聞”，“大王水果糖蜜甜的，我頂喜欢吃”；也可以說“她身上擦得稀香的，我怕靠近她”，“番瓜稀甜的，我不想吃”；但决不会說“桂花稀香的，真好聞”，“大王水果糖稀甜的，我頂欢喜吃”。因为既然認為桂花的“香”真好聞，是喜爱桂花的“香”的，因而在“香”的前面附加表含有厭惡感情色彩的“稀”就不通了。

和“稀×的”同样表含有厭惡感情的，揚州話里还有“稀里不×的”。如：

稀里不髒的	稀里不黑的
稀里不远的	稀里不疼的
稀里不滑的	稀里不痒的
稀里不甜的	稀里不吵人的
稀里不燙人的	稀里不燙人的

一般的說，“稀里不髒的”比“稀髒的”所表示的程度要深些，特別是“稀里不髒的”所含有的厭惡感情比“稀髒的”要强得多，只有对“髒”表示非常或極端厭惡的时候，才說“稀里不髒的”。“稀里不×的”和普通話形容詞中的“A里AB”（如“糊里糊塗”“囉里囉嗦”，揚州話里也有，都表“厭惡”的感情），是非常相象的。

“稀里不×的”常簡去“里”，說成“稀不×的”。

稀里不辣的→稀不辣的  
 稀里不远的→稀不远的  
 稀里不难看的→稀不难看的  
 稀里不戳人的→稀不戳人的

揚州話里的“稀不×的”和普通話中“好不××”（如“好不伤心”，揚州話里也有）一样。其中都鑲嵌一个“不”。

从語法作用來說，揚州話的“蜜”“稀”和普通話

的“很”同样具备副詞的一般特点，并能够附加在形容詞、能願動詞和表心理活動動詞的前面，作句子中的狀語。

普通話里的程度副詞“很”能單獨跟在助詞“得”的后面，做表心理活動動詞和形容詞的補語。如：

近來老趙愁得很。…… } 做表心理活動動詞的補語。  
 好久不写信了，想念得很。 }  
 这幅画好得很。 } 做形容詞的補語。  
 他的臉黃得很。 }

揚州方言里的程度副詞“蜜”和“稀”都不能單獨做動詞、形容詞的補語。揚州人决不会說“这幅画好得蜜”或“这幅画坏得稀”。但当“蜜”“稀”附加在形容詞（或詞組）的前面成为“蜜×的”“稀×的”，便可以做動詞、形容詞的補語了。如：

燒得蜜焦的。 } 做動詞的補語  
 养得蜜胖的。 }  
 人热得蜜难过的。 } 做形容詞的補語  
 电灯亮得稀脹眼的。 }

揚州方言里还可以說“这件事做得是蜜好”也可以說“这件事做得是蜜好的”。倒是前句的語气比后句重。

至于“稀×”（后面不跟“的”），則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有。揚州人只說“葡萄稀酸的”“那条几何稀难的”，如果說成“葡萄稀酸”“那条几何稀难”，在揚州人听来，这两句話都还没有說得完整。从这点看来，揚州方言里的“蜜×的”和“稀×的”，不能看为一般的詞組，而是似乎已經形成一种固定的結構了。“蜜×的”“稀×的”在句子里的作用，相当于一个形容詞。

虽然揚州方言里的“蜜”和“稀”不能單獨做補語，但揚州方言里原来也有可以單獨做補語的“很”。近年来因受了普通話的影响，揚州人又常用“很”做狀語。因此，現在揚州方言里相当于普通話程度副詞“很”的有“蜜”“稀”“很”三个詞兒。揚州方言里的程度副詞“蜜”“稀”“很”和普通話程度副詞“很”的差別可以列表如下：

	用 途	作 狀 語	作 形 容 詞 補 語	作 動 詞 補 語
	副 詞			
普 通 話	很	今天天气很好(坏)。	今天天气好(坏)得很。	好久不写信了，想念得很。
揚 州 話	很	今天天气很好(坏)。	今天天气好(坏)得很。	
	蜜	今天天气蜜好的。	人热得蜜难过的。	养得蜜胖的。
	稀	今天天气稀坏的。	电灯亮得稀脹眼的。	燒得稀焦的。



# 海南島海口方言中的吸气音

梁猷剛

海南島海口的方言是汉语一个地点方言，从语音构成、基本詞匯和語法結構方面看，大致屬於閩南方言的系統。但在語音方面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作为声母的輔音[ɸ]和[d̪]是帶音的吸气音。

一般語言里的通常的語音大都是呼气音（由呼出的气流造成的音）。在汉语中，絕大多数方言的語音都是这样。所謂吸气音就是由吸入气流造成的音。当發通常的呼气音时，只要把呼出气流的动作改为吸入气流的动作，就成为吸气音。非洲有些語言，如 Hottentot 語和 Kaffir 語里，吸气音是常見的；但在汉语方言里面，吸气音很少見。

凡是由吸入气流造成的音都可叫做吸气音。因此，吸气音是有各种各样的。普通的吸气音只有吸气，沒有同时呼气的。吸入的气流一般都能通过口腔，达到咽喉而入气管，不过达到咽喉时气流已大大减弱，深藏在喉部的声帶是不容易受振动而颤动。因此，普通的吸气音大部是不帶音的清音，例如表示喜悦时的[ɿ]。表示疼痛时的[f̪]或[ɸ̪]。

海口方言的[ɸ]和[d̪]和普通的吸气音不同。它們發音时一方面在口腔里吸气，一方面在声門挤喉出气，同时并發，造成一种又吸气又呼气的特別的吸气音。这样一方面在口腔吸气，一方面在喉部呼气的發音方法完全是可能的。只要在吸入气流的时候不要吸得太深，讓气流流动到口腔后部即“适可而止”，那么，深在喉部的声帶就完全受不到吸入气流的影响，可以受到从气管呼出的气流的振动而發出濁音。这样，吸入的气流和呼出的气流在口腔、喉部之間互相冲击，再加上声門先紧閉而后裂开引起颤动，就給这一类的吸气音造成了一种特別的音色。

海口的[ɸ]是吸气的、帶有挤喉作用的帶音的双唇破裂音。成阻时双唇紧閉，同时声門也紧閉。除阻时双唇破裂吸入气流。这吸入的气流在除阻时通过双唇进入口腔，造成双唇的吸气的破裂音后就不再深入。在双唇除阻口腔吸气的同时，紧閉着的声門也突然裂开，留着一条小縫，讓从气管呼出的气流冲击声帶而成濁音。

海口的[d̪]是吸气的、帶有挤喉作用的帶音的舌尖齿齦破裂音。成阻时舌尖頂住上齿齦，同时声門也紧閉。除阻时舌尖突然离开上齿齦，吸入气流。这吸入的气流在除阻时通过舌尖齿齦之間进入口腔，造成舌

尖齿齦的吸气的破裂音后就不再深入。在舌尖齿齦除阻口腔吸气的同时，紧閉着的声門也突然裂开，留着一条小縫，讓从气管呼出的气流冲击声帶而成濁音。

[ɸ]和[d̪]的發音方法基本相同，只是發音部位各異。因为發音部位有異，它們的吸气量也各不同。[ɸ]是双唇音，双唇在口腔外面，吸气量較大，吸气現象也很显著；[d̪]是舌尖齿齦音，舌尖齿齦在口腔内部，吸气量較小，吸气現象就不很显著。

[ɸ]和[d̪]在海口方言里只充当声母，即只出現音节的开头。

[ɸ]是海口方言中的唯一的双唇破裂音声母。作为一个声母（也就是說，作为一个音位），它有时可變讀呼气的不帶音的双唇破裂音[p]。在連續的兩個音节的声母都是[ɸ]的时候，往往是第一个音节的声母念[ɸ]，第二个音节的声母變讀[p]，例如：“包办”[ɸau ɸan]→[ɸau pən]①，“宝贝”[ɸoɿ ɸueɿ]→[ɸoɿ pueɿ]，“辯駁”[ɸin ɸoɿ]→[ɸin poɿ]。但也有兩個音节的声母都念[ɸ]的。年輕一輩的海口人，懂得別的方言（例如广州話、北方話）的人，也往往把[ɸ]讀成[p]，例如“帮”不讀[ɸan]而讀[pən]，“並”不讀[ɸeɿ]而讀[pɛɿ]。从上面所述的情形看来，在海口方言里，[p]是声母[ɸ]的音位变体。为什么吸气的帶音的双唇破裂音[ɸ]的音位变体，是呼气的不帶音的双唇破裂音[p]而不是呼气的帶音的双唇破裂音[b]呢？这种現象可能这样解釋：（1）在海口方言里，[b]是呼气的帶音的唇齿摩擦音[v]的音位变体。声母[v]的实际音值是[v]和[b]，如果声母[ɸ]的音位变体也是[b]，那就引起語音上的混乱。（2）海口方言中的[ɸ]同別的汉语方言（例如广州話、北方話）的[p]是相对应的，海口人（尤其是青少年）会講北方話、广州話的人相当多，因此海口的[ɸ]也受这些外地方言的影响，有时候變讀成[p]。

[d̪]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在海口方言里，舌尖齿齦破裂音有吸气的帶音的[d̪]，还有呼气的不帶音的[t̪]。作为一个声母（也就是說，作为一个音位），[d̪]沒有[ɸ]那样有變讀呼气的不帶音的破裂音的可能，因为在本地人的語感上，[d̪]和[t̪]是分別得很明显的，例如

① 海口方言的調类、調值是：陰平 23，陽平 22，上声 212，陰去 24，陽去 33，陰入 15，陽入 3。

[dɔŋ˥˩]是“东”，[tɔŋ˥˩]是“中”，絕不能混淆。在海口方言中，[d]沒有音位变体。

在海口方言中，声母是[ɖ]的字有以下几类：

(1) 古音声母是“帮”，現代北京語音声母是[p]的。海口方言全部讀[ɖ]。例如：

波[ɖo˥˩] 把[ɖa˥˩] 布[ɖu˥˩] 拜[ɖai˥˩]  
閉[ɖi˥˩] 杯[ɖoi˥˩] 堡[ɖau˥˩] 标[ɖiau˥˩]  
班[ɖaŋ˥˩] 变[ɖin˥˩] 宴[ɖin˥˩] 本[ɖun˥˩]  
帮[ɖaŋ˥˩] 崩[ɖeŋ˥˩] 冰[ɖeŋ˥˩] 丙[ɖeŋ˥˩]  
八[ɖi˥˩] 別[ɖit˥˩] 撥[ɖuak˥˩]  
必[ɖit˥˩] 博[ɖək˥˩] 碧[ɖək˥˩]

(2) 古音声母是“並”，声調是仄声，現代北京語音声母是[p]的，海口方言全部讀[ɖ]。例如：

部[ɖu˥˩] 敗[ɖai˥˩] 幣[ɖi˥˩] 暴[ɖau˥˩]  
办[ɖaŋ˥˩] 辯[ɖin˥˩] 笨[ɖun˥˩] 並[ɖeŋ˥˩]  
拔[ɖuak˥˩] 泊[ɖək˥˩]

(3) 古音声母是“並”，声調是平声，現代北京語音声母是[p']的，海口方言一般讀[f]；只有下列各字有[ɖ][f]兩讀：

爬[ɖa˥˩] [fa˥˩] 排[ɖai˥˩] [fai˥˩]  
牌[ɖai˥˩] [fai˥˩] 賠[ɖue˥˩] [fue˥˩]  
脾[ɖi˥˩] [fi˥˩] 袍[ɖau˥˩] [fau˥˩]  
便便宜[ɖaŋ˥˩] [fin˥˩] 盤[ɖua˥˩] [fuaŋ˥˩]  
平平坦[ɖe˥˩] [feŋ˥˩]

(4) 古音声母是“非”或“奉”，現代北京語音声母是[f]的，海口方言一般讀[f]，只有下列各字有[ɖ][f]兩讀：

“非”母字：

斧[ɖau˥˩] [fu˥˩] 傅[ɖau˥˩] [fu˥˩]  
飛[ɖue˥˩] [fɔi˥˩] 癩[ɖui˥˩] [fui˥˩]  
分分开[ɖun˥˩] [fun˥˩] 糞[ɖun˥˩] [fun˥˩]  
方四方[ɖaŋ˥˩] [faŋ˥˩] 放[ɖaŋ˥˩] [faŋ˥˩]  
幅[ɖak˥˩] [fək˥˩]

“奉”母字：

符靈符[ɖau˥˩] [fu˥˩] 吠[ɖui˥˩] [fui˥˩]  
肥[ɖui˥˩] [fi˥˩] 馮[ɖaŋ˥˩] [fɔŋ˥˩]  
佛[ɖut˥˩]①

3) 4) 兩类字，讀[ɖ]的一般是“說話音”，讀[f]的一般是“讀書音”，但沒有严格的分別。有时候說話也可用“讀書音”(例如“脾气不好”[fi˥˩k'ui˥˩vo˥˩ho˥˩])，有时候讀書也可用說話音(例如“与子同袍”[zi˥˩tsi˥˩hoŋ˥˩ɖau˥˩])。兩讀中以讀[ɖ-]較多。

在海口方言中，声母是[d]的字有以下几类：

1) 古音声母是“端”，現代北京語音声母是[t]的，海口方言全部讀[d]。例如：

躲[dɔ˥˩] 都首都[dɔ˥˩] 獸[dai˥˩] 低[dɔi˥˩]

抵[dɪ˥˩] 对[dɪi˥˩] 叨[dau˥˩] 鬥[dəu˥˩]  
耽[dam˥˩] 店[dɪam˥˩]

丹[dan˥˩] 典[din˥˩] 斷[duan˥˩] 敦[duŋ˥˩]  
党[dan˥˩] 登[dɔŋ˥˩] 丁[dɛŋ˥˩] 董[dɔŋ˥˩]  
答[da˥˩] 得[dit˥˩] 篤[dɔk˥˩]

2) 古音声母是“定”，声調是仄声，現代北京語音声母是[t]的，海口方言全部讀[d]。例如：

大[da˥˩] 杜[du˥˩] 怠[dai˥˩] 遞[dɔi˥˩]  
队[dɪi˥˩] 地[dɪ˥˩] 道[dau˥˩] 調声調[dɪau˥˩]  
淡[dam˥˩]  
但[dan˥˩] 电[din˥˩] 盾[du˥˩]  
蕩[dan˥˩] 邓[dɔŋ˥˩] 定[dɛŋ˥˩]  
疊[dɪap˥˩] 敌[dɛk˥˩] 独[dɔk˥˩]

3) 古音声母是“定”，声調是平声，現代北京語音声母是[t']的，海口方言一般讀[h]，只有下列各字有[d][h]兩讀：

題[dɔi˥˩] [hɔi˥˩] 濤[dau˥˩] [hau˥˩]  
檀[duai˥˩] [han˥˩] 壇[duai˥˩] [han˥˩]  
屯[du˥˩] [hu˥˩] 豚[duŋ˥˩] [hu˥˩]  
飽[du˥˩] [hun˥˩] 臂[dɪi˥˩] [hu˥˩]  
堂[do˥˩] [han˥˩] 塘[do˥˩] [han˥˩]  
簾[dɪa˥˩] [heŋ˥˩] 亭[dɛŋ˥˩] [heŋ˥˩]  
庭[dɪa˥˩] [heŋ˥˩] 同[dan˥˩] [hɔŋ˥˩]  
銅[dan˥˩] [hɔŋ˥˩] 筒[dan˥˩] [hɔŋ˥˩]

下列各字，只有[d]一種讀音：

屠[du˥˩] 蹄[dɔi˥˩] 条[dɪau˥˩]  
甜[dɪam˥˩]。

4) 古音声母是“知”，現代北京語音声母是[tʂ]的，海口方言一般讀[ts]，只有下列各字有[d][ts]兩讀：

張[dio˥˩] [tsian˥˩] 帳[dio˥˩] [tsian˥˩]  
脹[dio˥˩] [tsian˥˩]  
着[dio˥˩] [tsiək˥˩] 桌[do˥˩] [tsiək˥˩]  
琢[due˥˩] [tsiək˥˩] 啄[due˥˩] [tsiək˥˩]  
摘[dia˥˩] [tsək˥˩] 竹[dɪək˥˩] [tsək˥˩]

还有一个“猪”字，只有一种讀音[du˥˩]。

5) 古音声母是“澄”，声調是仄声，現代北京語音声母是[tʂ]的，海口方言一般讀[ts]，只有下列三个字有[d][ts]兩讀：

箸[du˥˩] [tsi˥˩] 滯[dɪ˥˩] [tsi˥˩]  
重[dan˥˩] [tsɔŋ˥˩]

6) 古声母是“澄”，声調是平声，現代北京語音声母是[tʂ]的，海口方言一般讀[ts]，只有下列三个字有[d][ts]兩讀：

(下轉34頁)

① “佛”字只有一种讀音[ɖut]。这可能和“佛”是外来語音譯字有关。



# 太原方言中的“文白異讀”現象

王立達

李榮先生在《方言里的文白異讀》一文中，以北京、漢口、蘇州三處方言為例，指出了方言中的“文白異讀”現象。<sup>①</sup>這種現象，在太原方言中也相當顯著。

太原人通稱文言音為“官字眼”，白話音為“土字眼”。兩者的差異，主要表現在下列幾方面。

## 聲母的差異

一、古“疑”母字的齊齒、撮口二呼字在文言音中變為零聲母字；而在白話音中則有舌尖鼻音聲母 n，而與古“泥”母字相混。舉例如下：

例字	文言音	白話音	俗語舉例
1) 顏	ɕie (烟)	ɕnie (年)	顏色
2) 銀	ɕin (營)	ɕnin (寧)	金銀財寶
3) 咬	ɕi (邑)	ɕni (鳥)	咬臍郎
4) 牙	ɕia (鴉)	ɕnia	門牙、牙行
5) 眼	ɕie (掩)	ɕnie (攪)	眼睛人人(瞳孔)
6) 硬	inʔ	nieʔ	硬鉄蛋

二、古全濁“群”、“定”、“澄”、“並”、“从”五母的平聲字，在文言音中俱讀為送氣音；但在白話音中，則俱讀為不送氣音。舉例如下：

例字	文言音	白話音	俗語舉例
1) 田	ɕtʰie (天)	ɕtie (顛)	耕田種地
2) 桃	ɕtʰau (滔)	ɕtau (刀)	桃榴五果
3) 前	ɕtʰie (千)	ɕtie (煎)	前頭后背
4) 騎	ɕtʰi (祁)	ɕti (机)	騎馬坐轎
5) 厨	ɕtsʰu (初)	ɕtsu (朱)	厨房、厨工
6) 迟	ɕtsʰi (池)	ɕtsi (知)	天陰沒迟早
7) 排	ɕpʰee (牌)	ɕpee (白)	安排
8) 調	ɕtʰiau (挑)	ɕtiau (刁)	調和
9) 提	ɕtʰi (梯)	ɕti (低)	提籃趕集
10) 甜	ɕtʰie (天)	ɕtie (顛)	酸甜苦辣

## 韻母的差異

一、古“梗”、“曾”二攝的“庚”、“耕”、“清”、“青”、“蒸”諸韻字，在文言音的韻母部分有鼻聲隨[-ŋ]；而在白話音中則失掉鼻聲隨，變成以元音[i]收尾。舉例如下：

例字	文言音	白話音	俗語舉例
1) 青	ɕtʰieŋ (親)	ɕtʰi (妻)	青菜(菠菜)
2) 清	ɕtʰieŋ (親)	ɕtʰi (妻)	清明(节气名)
3) 明	ɕmieŋ (民)	ɕmi (迷)	明燈蠟燭

4) 定	tiŋʔ	tiʔ	(第)定盤星
5) 听	ɕtiŋ	ɕti	(梯)打听、听話
6) 經	ɕtʰieŋ (斤)	ɕtʰi	(鷄)經由
7) 病	piŋʔ (鬢)	piʔ	(幣)毛病
8) 釘	ɕtiŋ	ɕti	(低)釘子
9) 蝇	ɕin (因)	ɕi	(夷)蝇子
10) 醒	ɕieŋ	ɕi	(洗)醒鼻涕
11) 映	inʔ (印)	iʔ	(意)灯映兒(皮影戏)
12) 頃	ɕtʰieŋ	ɕtʰi	(起)一頃地
13) 命	miŋʔ	miʔ	(謎)救命、要命
14) 淨	ɕtʰieŋʔ(尽)	ɕtʰi	(祭)干淨
15) 井	ɕtʰieŋ (紧)	ɕtʰi	(挤)井兒

二、古“曉”、“匣”二母的二等字，文言音中的韻母部分有[i]介音；而白話音中則沒有。更由於太原方音中[x]不與[i]相拼，所以由於[i]介音的有無，影響到聲母部分，也發生了異讀現象。即文言音有[i]介音，聲母為[ɕ]；白話音無[i]介音，聲母為[x]。舉例如下：

例字	文言音	白話音	俗語舉例
1) 下	ɕiaʔ	xaʔ	下學、下來
2) 夏	ɕiaʔ	xaʔ	夏天、收秋了夏
3) 鞋	ɕie (斜)	ɕxe (孩)	穿鞋戴帽
4) 瞎	ɕiaʔ	xaʔ	(喝)瞎眼、瞎子
5) 鹹	ɕie (嫌)	ɕxæ (含)	酸鹹、鹹菜
6) 巷	ɕidʔ (向)	xidʔ	柳巷(太原街道名)

三、古“果”攝“歌”韻“端”、“精”二組的韻母部分，文言音有u介音；而白話音則沒有u介音。舉例如下：

例字	文言音	白話音	俗語舉例
1) 多	ɕtuɔ	ɕtɔ	多少
2) 拖	ɕtʰuɔ	ɕtʰɔ	拖泥帶水
3) 駝 <sup>③</sup>	ɕtʰuɔ	ɕtɔ	駱駝
4) 陀	ɕtʰuɔ	ɕtʰɔ	阿彌陀佛
5) 馱	ɕtʰuɔ	ɕtɔ	馱煤漢(煤礦工人)
6) 挪	ɕnuɔ	ɕnɔ	挪動
7) 鑼	ɕluɔ	ɕlɔ	敲鑼打鼓
8) 羅	ɕluɔ	ɕlɔ	馬尾籬子
9) 羅	ɕluɔ	ɕlɔ	張羅
10) 左	ɕtsuɔ	ɕtsɔ	左右、左手

① 見《中國語文》1957年4月号。

② 括弧中的漢字為同音字。如無同音字時則不標注。

③ “駝”字為古“定”母字，在太原方音中的白話音聲母變為不送氣音[t]。

- 11) 佐 <sup>c</sup>tsuɿ      <sup>c</sup>tsɿ 君臣佐使(中医术语)  
12) 搓 <sup>c</sup>ts'uɿ      <sup>c</sup>ts'ɿ 搓手、搓背

### 声調和韵母的差异

这种异讀現象，主要表現在一部分入声字因受普通話語音的影响而变为其他声調；在声調發生变化的同时，韵母部分也連帶地起了变化。举例如下：

一、入声“白”、“六”等字，在白話音中仍旧讀为“入声”（太原方音中的“入声”分为“陰入”、“陽入”二类：“陰入”的調值为 4<sub>2</sub>；“陽入”的調值为 4<sub>54</sub>）。即“白”字讀为 [piəʔ]<sub>2</sub>，屬“陽入”調；“六”字讀为 [luəʔ]<sub>2</sub>，屬“陰入”調。但是在文言音中，却像普通話語音那样，將“白”字讀为 <sup>c</sup>[pɛɛ]，变成了平声；“六”字讀为 [liəu]<sub>2</sub>，变成了去声。这种現象，显然是受普通話的影响而發生的。

二、另外一种入声字的文白异讀現象，則与上述情况相反。就是入声“肉”、“宿”等字，在文言音中有时仍旧保存着入声的讀法，例如中藥材“肉桂”、“肉蓯蓉”的“肉”字，均讀为 [zuəʔ]<sub>2</sub>，屬“陰入”調；但是在日常口語中說“牛肉”、“羊肉”的“肉”字时，則讀为 [zəu]<sub>2</sub>，变成了去声。至于“星宿”的“宿”字，在文言音中讀为 [ɣyəʔ]<sub>2</sub>，屬“陰入”調，与“宿舍”、“寄宿”的“宿”字同音（例如說“二十八宿”）；但是在白話音中，則通称“星宿”为 [ɣipɛu]，而与“西秀”二字的發音相同。这种“宿”字讀为“去声”的現象，正与《广韵》去声有韵“息救切”的讀法相合。

### 声母、声調皆异而来原不同的异讀字

除了上面所述三种类型以外，在太原方言中，还有一些極少数的声母、声調皆异，而来原不同的异讀字。例如“合作”的“合”字，在文言音中讀 [xaʔ]<sub>2</sub>，屬“陽入”調；但是，在白話音中則有 [kaʔ]<sub>2</sub> 的异讀，不仅声母部分有异，就是声調也不相同。这种异讀現象，多見于日常应用的俗語、俚諺中，現在举例如下：

一、合配：即“配合”的意思，“合”字讀为

[kaʔ]<sub>2</sub>，与“閣”字同音。

二、合葬：例如“冥婚合葬”。

三、合聚：旧式的农業生产合作形式，例如甲家的牛和乙家的車“合聚”在一塊兒。又男女未經正式結婚即行同居亦称为“合聚”。

四、相合：例如說“油和水不相合”，“相合”二字的白話音为 [ɣiəʔkaʔ]<sub>2</sub>。

五、合对对：一种紙牌的游戏形式，即將相同的紙牌（例如“一万”和“一万”、“二餅”和“二餅”）配成一对的意思。（以上各俗語中的“合”字均讀 [kaʔ]<sub>2</sub>，与“閣”字同音。）

从上面所举的俗語例証看来，可知在白話音中讀为 [kaʔ]<sub>2</sub> 的“合”字，其意义都是“合作”、“集合”，而和“石”、“斗”、“升”、“合”的“合”字含意不同。容量單位名称的“合”字太原方言的白話音为 [k'aʔ]<sub>2</sub>，声母部分是送气音；与 [kaʔ]<sub>2</sub> 不同。按《广韵》入声二十七“合”的“合”字本有“侯閣”、“古沓”两个反切。其中作“古沓切”的“合”字原注即为“合集”的意思。由此可見，“合”字讀为 [kaʔ]<sub>2</sub>，并不一定專指容量單位，而是在中古时代它本来就有“合集”的意思。

从上面所列举的各种类型的例証看来，可知在今日太原方言中的“文白异讀”現象很为普遍，这实在是值得方言調查工作者加以注意的一个問題。

太原人在讀書时一般都用文言音，教师这么教，学生也这么学。久而久之，受过教育的人們就用文言音来講話了。由于文言音和普通話語音相近，所以把文言音用于口語，从推广普通話的角度来看，实在是一个好現象。但是，由于在讀書識字时都用文言音，就使得被認為是“土字眼”的白話音和文字失掉連系，弄得連識字的人也不能够把他口里說的字都正确地写出来。例如“俗語”中常說的“年女”（言語）、“西秀”（星宿）、“冬离”（冬凌，即“冰”）、“鷄油”（經由）、“衣时”（营生）等，如果不是对古今音的对应規律稍有常識的話，就很难写出它的本字来了。

## 上海市汉语方言普查近况

上海市的方言調查工作，是江苏省方言調查总任务的一个方面。根据1956年11月10日江苏省、上海市方言調查工作会议決議，在指导組下面，設南京、上海两个組。上海組共負責21个点。华东师范大学負責松江專区的南匯、奉賢等9个点；复旦大学負責南通專区的如皋、啓东等9个点；第一师范学院負責苏州專区的常熟市、太倉、崑山3个点。

整个調查工作由于起步迟，加上在整風、反右当中，時間安排得不紧凑，因而各个点的調查进度参差不齐。截至1957年底，华东师大已完成金山等4个点的調查任务，其中青浦与金山的初稿已經完成。复旦的9个点和第一师院的3个点，均已初步完成，大部分点正在核对材料，其中上海市的学話手册初稿已經完成。这个手册的初稿，包括3个部分：1)北京語音練習；2)上海人學習普通話的难点及克服的方法；3)普通話的詞彙、語法。此外，还編写了适合上海人學習的标音讀本及上海方言同音字表的初稿。这些材料都将爭取在1958年初出版。（刘征）



# 語詞复用例釋

黃岳洲

平常教語法，發現一些句子，把作用相同的兩個詞連在一起用，本文想舉出一些來試作解釋。例如：

- 1) 你在这里等一下，我馬上就回來。(初中漢語課本 4.97)
- 2) 他們願意立刻就下工地。(又，4.13)
- 3) 那邊山坳里，你看，楓樹的叶子全都紅了。(又，4.93)
- 4) 有几个店鋪才只開了半扇門。(又，4.85)

拿例1來說，“馬上”和“就”是“回來”的時間狀語，表示動作的即將發生，這沒有問題。但“馬上”和“就”都是時間副詞，二者是什麼關係呢？只用一個能不能夠達意呢？如能達意，又為什麼要用兩個呢？用了兩個不合規範呢？一連串的問題普通語法書總都沒有談到，所以沒有答案。如果這種句子占極少數就不可能或者也不必要探求規律。但是，再到語言事實里去摸一下，又會發現不少與以上情況相同的例子。例如：

- 5) 單四嫂留心看他神情，似乎彷彿平穩了不少。(魯迅：明天)
- 6) 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桃花源記)
- 7) 我好意來幫你，你道翻成惡意，我却偏鳥要去。(水滸1241；全傳本無“鳥”字)
- 8) 辦農會的人對農民說：“你們打轎子，反倒替闊人省了錢。”(毛澤東選集，39)
- 9) 她有時感覺女兒實在並沒有“那個”。(葉紹鈞：夜)
- 10) 就只剩了這一點。(魯迅：為了忘卻的紀念)
- 11) 只等姑娘一句話應了聲，立刻就要鼓樂喧天，欢声匝地。(兒女英雄傳，25回)

這類句子都是以意義相同的兩個詞兒作動詞或形容詞的狀語。首先應該肯定這類句子是合乎規範的。因為，第一，象例1的“我馬上就回來”，例9的“實在並沒有‘那個’”這種說法，在口語里數見不鮮。第二，上列諸例皆出之于名家手筆，第三，清朝學者俞樾的《古書疑義舉例》(卷四)里已經提到過“語詞复用”，可見有關的兩個詞語复用，由來已久。

上列諸例复用的都是副詞。仔細分析起來有時間副詞(如例1、2、11)，有範圍副詞(如例3、4、10)；有肯定、否定副詞(如例5、6)，有語氣副詞(如例7、8、9)；此外還可能有程度副詞。副詞意義上的分類可算是全了。

再从音节多寡方面来看，兩個單音詞用在一起，有

了兩個音，讀起來也順適，因此复用的兩部分以單音詞為較多。時間一長，有的竟然復合成詞，而失去复用的迹象了。例如：

- 12) 現在會同館內，要王親自去請他。(西游記，作家出版社，779)
- 13) 你家姐姐剛才家去了，你不知道？(金瓶梅，47)

雙音詞复用(如例5、11)是比較突出的，讀起來不怎么便當，人們不在非常必要的情况下(原因詳后)總不采用這種方式。介于二者之間的是雙音詞與單音詞的复用，其位置是雙音在前、單音在后(如1、2、6、9、11諸例)。這種排列形式一般是不能更動的，更動了有的說不通(如例9)，有的不大通暢(如例2)。

這很難找出什麼原因來，只能說是習慣使然。相反的情況也有。如：

- 14) 有決定意義的某一、二個戰役失敗了，全局就立即起變化。(毛澤東選集，第1卷，173)
- 15) 那一處沒有武裝，或者對付敵人的策略錯了，地方就立即被敵人占去了。(又，67)

上兩例复用的副詞是先雙后單，究其原因都是條件式複合句，兩個“就”雖然表示時間，但其主要作用是把正句連接到偏句之后。“就”放在雙音副詞前，第二部分是正句的意思才顯豁些。要是把“就”移到“立即”之后呢？當然可以，只是承接作用不及在前的顯豁了。

下列諸例是能願動詞的复用：

- 16)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
- 17) 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孟子，告子上)
- 18) 太公道：“師父怎能得知？”(水滸，1229)
- 19) 那些人怕入另冊，便多方設法求入農會，一心要想把他們的名字寫上那農會的冊子才放心。(毛澤東選集，第1卷，16)
- 20) 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要錯誤的。(又，82)
- 21) 凡事須得研究，才會明白。(魯迅：狂人日記)

《古書疑義舉例》里不見能願動詞复用的例，其實如例16的“可”和“得”，复用在古代典籍中是很多很多的。能願動詞复用範圍也廣，例16、17、18、20是表可能的；例19是表示意願的；例21則是表示必要的。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也可以認定，能願動詞原則上也是可以复用的。

此外,文言里还有近指指示代詞复用的。例如:

- 22) 此若言何謂也? (管子,山国軌)  
23) 此若义信乎人矣。(荀子,儒效)  
24) 我倒象楊貴妃,只是沒有好哥哥,可以做得楊国忠的。(紅樓夢,30回)

## 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另一語言現象。如:

- 25) 尽管是由一號出来,他还能沉得住气。(老舍:偷生,上册131頁)  
26) 正說着,只見吳大妗子家,使了小廝来定兒来請。(金瓶梅,47回)  
27) 小栓撮起这小东西,看了一会,似乎擎着性命一般。(魯迅:藥)  
28) 明日,我没有什么孝順,只是唱曲兒与姐姐听罢了。(金瓶梅,46回)

上列諸例有关的兩部分在意义上是复用的。假定在前的是A項,在后的是B項,那末只要兩項中的一項出現于句子結構里,就表达了兩項所要表达的意思。

这种語言現象可概括为三个类型:一是例25的能願動詞“可以”、“能”与表可能性的助詞“得”連用。二是例26的副詞“正”和时态助詞“着”連用。三是例27以下的副詞和助詞合用:“似乎……一般”、“只是……罢了”。这些类型有两个共同的特点:第一,兩部分之間一定要插入实詞或詞組或句子,而不能直接連用;第二,兩部分只有一部分作句子成分,另一部分不作句子成分,只有关連或其他的輔助作用,具体說来,是后一部分不作句子成分。

## 三

上面所談是詞兒的复用,还有詞与詞組或詞組与詞組复用的。如:

- 29) 忙怎的,那里才来乍到,就与他喫,教他前边站着。(金瓶梅,47回)  
30) “国子監”系急就率成,不妥之处諒当尚多,容他日逐一訂正。(北京文艺,1957年6月号12頁)  
31) 这三个女子才来未久。(鏡花緣,51)  
32) 姚明道:“广东的强盜是有名的,至少办掉几个起碼。”(李伯元:活地獄,10回)

这里有兩種情况:例29、30是第一种,复用部分是比较固定的結構,这两个詞組不但結構相同、詞义

相同,而且位置也相同,这是比較明显的复用形式。例31、32是第二种,有关的兩部分意义相同但結構不相同,也不处于同一位置,而是一作狀語,一作补語,如例32把“至少”拿去,也能說成“起碼办掉几个”:这种复用純然是意义上的关系,形式上不及第一种明白易懂。

## 四

現在,我們可以对語詞复用試作解釋。一个句子里,有两个詞性与意义皆相同的詞,或者意义和作用皆相同的詞組,并列地处在某一成分;或者两个詞組,或者两个詞性不同的詞,意义相同,却不是处于同一位置的,我們管它叫語詞复用。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語言現象。我們不妨把第一例作一番說明:例1說成“我馬上回来”“我就回来”意思都沒变,但是因为上文有“你在这里等一下”,說話者急于要使对方不离开他所立定的位置到別处去,需要把自己“回来”的时间描述得極其短促,于是就把两个表示距离下一动作时间很短促的副詞复用起来,說成“我馬上就回来”。“馬上”与“就”复用,尽管意义不变,但語气却是大大不同了。語詞复用为的是加重語气,因此語詞复用是一种語法現象,也是一种修辞現象。理解了这个原因,不仅可以肯定“我馬上就回来”不是不合乎规范的,也不是偶見的;也可以理解語詞复用的这一手段有时候在表达上是必要的。語詞复用表现在形式上是多种多样的,这样的形式正可彼此互为印証。

語詞复用的現象不只限于虛詞,还有能願動詞,还有个别的代詞,甚至还有某些詞組。俞氏所說“古人用語助詞,有兩字同义而复用者”的話是不够全面的。当然,实詞里其他詞兒复用的应算破格。如:

- 33) 虽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蘭亭集序)  
34) 那些童生紛紛进来,衣冠齐楚的,藍縷破爛的。(儒林外史,27頁)

例33言“絲竹”又言“管弦”,例34言“藍縷”又言“破爛”,是罕見的。但如果某一結構比較固定,或者是成語性質,那末有关部分的复用又是允許的。如:

- 35) 你又孤身一人,在客伙內,还是少了你吃的、穿的?(儒林外史,22頁)  
36) 他媽的張裕民这小子,有朝一日总要問問你这个道理。(果树園)



# 《水滸傳》里的助詞“地”

胡竹安

《水滸傳》原本的寫定年代，目前還不能十分肯定。多數學者認為寫成在明代，但是現存本中的語言，因為編寫者要摹擬北宋的情景，又多少受了前人話本和一部分有關的雜劇的影響，所以夾雜了很多宋元時的名称。<sup>①</sup>在用詞方面，雖然屢經增刪修改，也還保留着宋元作品的特点。《水滸傳》中助詞“地”的用法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水滸傳》里的助詞“地”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

(一)時態助詞，(二)結構助詞。

(一)作時態助詞“着”用的。例如：

- 1)三人在廟簷下立地看火。(10.155)②
- 2)…廟前樹下，時還放着担兒在那里坐地。(56.945)
- 3)各施禮畢，請到厅上坐地。(63.1079)
- 4)智深道：“都來廡宇里坐地說話。(7.111)

“立地”“坐地”就是“立着”“坐着”。這樣的“地”一般只跟在單音自動詞之後，常見的也只有“立”“坐”兩字。<sup>③</sup>還值得注意的是帶“地”的動詞後邊不能再有存現賓語。試比較下邊兩例：

- 5)上首馬上坐着一籌好漢…(59.993)
- 6)傍邊立着一個嫡親兄弟…(62.1048)

由此可知，自動詞一旦有了存現賓語，就只能帶“着”，不能帶“地”。

(二)作結構助詞用的“地”又可以分為兩項：甲、相當於現用的“的”，乙、相當於現用的“地”。

先談甲項。最明顯的是那些定語和名詞間的“地”。

例如：

- 1)正欲移步，只听得松樹背後，隱隱地笛聲吹響，漸漸近來。(1.6)
- 2)東觀西望，猛然听得远远地鈴鐸之聲。(5.91)
- 3)…只見呼延灼把鎗尖一指，远远地一碗紅燈。(64.1094)

其次是那些作補語的形容詞後邊附着的“地”。例如：

- 4)這一帶，草滾得平平地，都倒了。(49.807)
- 5)…將解珍、解寶剝得赤条条地。(49.808)

還有那些作謂語的形容詞後邊附着的“地”(一般在作賓語的主謂結構中)。例如：

- 6)酒保听得，慌忙上來看時，見魯提轄氣憤憤地。(3.47)
- 7)…時還見班里靜悄悄地…(56.940)
- 8)沒了當絮絮聒聒地！(21.308)

以上這些“地”字現在都應該換成“的”字。現代作家中有些人的早期作品里還有在謂語是描寫性的形容詞或

形容性詞組時仍用“地”的。例如：

- …深陷的眼眶里，紅筋連牽地，發亮。(叶聖陶：夜)  
老通寶背脊上熱烘烘地，象背着一盆火。(茅盾：春蚕)

再談乙項：作狀語後的結構助詞。這跟我們目前的用法一樣。例如：

- 9)你與湯隆慢慢地走。(56.942)
- 10)却說宋江暗暗地喝彩道…(59.990)
- 11)正喫時，只听得外面必剝剝地爆響。(10.155)
- 12)兩箇好漢，扑桶地都翻筋斗撞下江里去。(88.607)
- 13)明晃晃地點着燈燭。(62.1043)
- 14)眼睜睜地只看着這箇孩兒。(51.843)
- 15)林子裡一聲炮响，托地跳出一籌好漢。(61.1030)

無論甲項或乙項，跟有“地”的不外乎三種情況：

(一)自身是重迭形式的(例1—4，例8—10都是)，  
(二)象聲的(例11，例12，例15都是)，<sup>④</sup>(三)帶重迭輔助成分的(例5—7，例13例14都是)。對於這種語法現象，呂叔湘先生在《論底、地之辨及底字的由來》里有一段很好的說明。他認為在唐宋時代，“跟‘地’的大率是重言(xx或xyy)，或雙聲，疊韻”；又說它們的作用“在於描寫情態”。這樣說來，跟我們目前的用法是有出入的。

除此以外，代詞“怎、恁、這般”等也可以後跟“地”。

例如：

- 16)你把我的哥哥性命怎地謀害了。(26.415)
- 17)怎地这个大寺院，沒有一個僧众？(60.1009)
- 18)你如今却是要怎地？(56.945)
- 19)你那主人恁地不曉人事。(47.780)
- 20)北京有名恁地一個盧員外，只直得這一兩金子！(62.1049)
- 21)你這般地說時，生辰綱不要送去了。(16.227)
- 22)你且說怎么地來。(45.744)

這些“地”也不是前有狀語的標志，如例18的“怎地”就是謂語，例20的“恁地”就是定語。

魯迅先生在《藤野先生》里還用了“怎地”：“不知怎

① 如宋人稱蒸餅(饅頭)為炊餅(《云麓漫鈔》可証)，元人稱道士為先生(《至元辨偽錄》可証)，稱妓院為行院(見王國維：《宋元戏曲史》)等。

② 例引自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水滸全傳》，前為回数，後為頁數。以下均照此例。

③ 《詩詞曲語辭匯釋》第300頁所引王安石詩和刘知遠傳兩例很覺得牽強，那兩個“地”字都不表示時態。

④ 照聲音，“必剝”又是雙聲，“扑桶”又是迭韻。

地,我到現在還記得這名目。”這只能算是一種殘留現象。

称得上作為狀語標志的只有“特地、驀地”等幾個副詞後邊的“地”。這些“地”,嚴格說起來,並不能從這些副詞中硬拉出來稱它為結構助詞。“特地、驀地”等只能作狀語,這是跟以上幾項不同的地方。下邊是兩個例子:

1)却不是特地來消遣我?(3.51)

2)待他來得較近,林沖把袞刀杆剪了一下,驀地跳將出來。(11.171)

在魯迅、茅盾等現代作家的作品里,還常常可以發現這些副詞。

跟現代語中的結構助詞“地”相當的倒是個“价”字(也寫作“家”)。這個助詞現在吳語中尚保留着。

宋詞和金元戏曲里,“价”早有充當狀語後結構助詞的用法。下邊是幾個很明顯的例子。

1)經年价兩成幽怨。(柳永詞,鳳銜杯)

2)終日价淺酌輕謳。(趙長卿詞,滿庭芳)

3)气長長价吁,泪冷冷价落。(戲文,張協狀元)

不過那時還有其他用途。①至於《水滸傳》中的“价”只作動詞前結構助詞之用。試看下列例句:

1)在那里舒頭探腦家望。(16.232)

2)号炮連珠价响。(80.1825)

3)一有錢鈔在手,三兄四弟,終日大酒大肉价同喫。(101.1571)

4)那粉頭…色艺双絕,賺得人山人海价看。(103.

1591)

狀語是比喻性的詞組時,“般”字常作它的結構助詞。如:

1)跳上台基,把刺子只一板,却似攤葱般扳開了。(4.72)

2)…勃瀾瀾地風困兒也似般走。(13.189)

但這不等於說,書中的“般”就是狀語後的“地”,因為“這般的事”“諸般人等”在書中還是常見的。那個“般”是詞的輔助成分。

由於《水滸傳》不是一人一時的創作,所以用的語言既是文白夾雜,又是南北互見。以助詞“地”來講,宋元時代該用“地”的地方常常以“的”代替。下邊是一些突出的例子:

1)官人休要坐的,娘子在廟中和人合口。(7.113)

2)那馬不刺刺的望東溪村攢將去。(18.261)

3)怎的着了那廝的手?(20.291)

4)洒家特的要消遣你!(3.51)

這些“的”字照宋元時的用詞規律似乎都應該寫成“地”。

這篇文章的簡短結論是:從助詞“地”的用法可以看出:(一)書中的“地”和現時用的“地”並不一致;(二)《水滸傳》的語言確含有宋元時代的因素,儘管比重目前還很難確定。

① 見《詩詞曲語辭彙釋》上冊389頁“价”字條和“家”字條(一)。

(上接28頁)

母是[tɕʰ]的,海口方言一般讀[s],只有下列各字有[dʰ][s]兩讀:

茶[dɕʰ] [saɿ] 厨[dʰuɿ] [suɿ]

迟[dʰiɿ] [siɿ] 鍾[dʰuiɿ] [suiɿ]

綢[dʰiuɿ] [siuɿ] 陈[dʰaŋɿ] [sinɿ]

長[dʰoɿ] [siaŋɿ] 腸[dʰoɿ] [siaŋɿ]

場[dʰioɿ] [siaŋɿ]

3) 4) 5) 6) 四類中,讀[dʰ]的一般是“說話音”,讀[h][ts][s]的一般是“讀書音”,但沒有嚴格的分別。有時候說話也可用“讀書音”(例如“肚脹”[dʰauɿ tsiaŋɿ]),有時候讀書也可用說話音(例如:“着重研究”[tsiək dʰaŋɿ ɲin ɿ kinɿ])。

總的說來,1)古音“幫”母字全部和“並”母字中的仄聲字,海口方言全部讀[dʰ],古音“並”母字中的平聲字和“非”“奉”兩母的字,有極少數是又讀[dʰ]的(“敷”母字沒有又讀[dʰ]的。)2)古音“端”母字全部和“定”母字中的仄聲字,海口方言全部讀[dʰ],古音“定”母字中的平聲字和“知”“澄”兩母的字,有極少數是又讀[dʰ]的(“徹”母字沒有又讀[dʰ]的)。

從上面所舉例字看來,我們可以知道,海口方言

的[dʰ]和[dʰ]相當於北京語音(或一般的漢語方言)的[p]和[t]。北京語音和一般漢語方言中的[p][t][k]是和海口方言的[dʰ][dʰ][k]相對應的。在這裡我們發現了一種情形,那就是,在海口方言中,吸氣的破裂音只有唇音和舌尖音,沒有舌根音。這種情形可以從發音原理上得到解釋:1)舌根音的成阻部位(舌根和軟顎)在口腔後部,要在除阻時從口腔外邊往口腔內部吸入氣流,是比較困難的;2)舌根音的成阻部位離喉部很近,除阻後,從氣管呼出的氣流很快就通過聲門達到舌根軟顎之間,因此,發吸氣的舌根軟顎破裂音是比較困難的。

本文所討論的是吸氣破裂音[dʰ]和[dʰ]作為音素和聲母出現在海口方言中的情形。海口附近各縣——瓊山、文昌、瓊東、定安、澄邁等縣——的方言中也有[dʰ]和[dʰ]這兩個音。這幾個縣的方言和海口方言非常接近,在語音上,即在發音部位、發音方法上,這幾個縣的[dʰ]和[dʰ]同海口的[dʰ]和[dʰ]是相同的。但是在聲母系統中的地位、音位變體、與古音的對應關係等方面,這幾個縣的[dʰ]和[dʰ]的分布同海口的[dʰ]和[dʰ]的分布是有些差別的,這裡暫且不討論了。



# 現代漢語中的後置詞(下)

H. И. 賈布基娜

## 充當定語的體詞+後置詞的詞組

體詞+後置詞的詞組，同任何體詞一樣，可以充當句子中的定語。

漢語中名詞的定語關係總是把定語放到被限定者的前面來表示的，而且在一定情況下，定語要附加小詞“的”。

充當定語的體詞+後置詞的詞組通常是利用定語小詞“的”加在被限定者的前面。

充當定語的體詞+後置詞的詞組在運用中必須利用小詞“的”作為其必要的構成形式這個特性，在漢學文獻中曾經不止一次地指出過。<sup>①</sup>

下面我們試圖用略去小詞“的”的方法，舉出一系列例子來揭示它的具體功能。

房-里|的|女性|的|聲音|也|不時|送進|他底|耳-里(巴金，1-11)(試比較：房-里|女性|的|聲音|也|不時|送進|他底|耳-里)

這兩句的差別在於：在第一句中，用“的”的名詞+後置詞“房-里”只跟后面的名詞發生關係，充當它的定語。

在第二句中，名詞+後置詞“房-里”的結構學功能，視上下文情況而有兩種解釋：“房-里”可以照舊是后面名詞“聲音”的定語，在這種情況下，句子保持相同的意義。在其他上下文中，“房-里”可以不屬於它后面的名詞“聲音”，而屬於整個句子；在這情況下句子便獲得下列意義：“在房裡，送進他底耳裡的不時有女性的聲音”。因此，在我們的例子裡，當沒有“的”的時候，名詞+後置詞的結構學功能就是模稜兩可的。

在“語法-上|(的)|意義|是|不|同|了”句子中，“的”的有無也分別反映了定語關係或狀語關係：缺乏“的”時，名詞+後置詞的詞組“語法-上”不屬於名詞“意義”，而屬於整個句子，它是狀語：在語法上，意義不同了(不是有“的”時的：語法上的意義，不同了)。

用加“的”的方法把狀語倒置而變為定語也可得到相同結果：

街-上|行人|不|多

(請比較：街-上|的|行人|不|多)。

譯成俄語時，名詞+後置詞表現的狀語譯成前置詞+名詞。定語通常譯成前置詞+名詞表現的非同格關係定語，接在體詞的后面(例如：женские голоса в комнате)。

當體詞+後置詞的詞組充當句子內部體詞成分的定語的時候，也有類似情況。對文章的研究表明，就是在这种場合，充當定語的名詞(代詞)+後置詞的詞組也要利用“的”，例如：

我們|看看|引號|里头|的|話(中國語文1952年10月號)。

於是|那|穿|黑|大布|長褂|的|瘦長|男子|才|从|床|后|的|小|門|蹺了|出去(丁玲，2-109)。

誰|知道|一|分鐘-以后|的|事?(巴金，2-104)。

在這一組例子中，“的”不能省略，因為這樣做會使名詞+後置詞的結構學功能不十分明顯，或者會根本破壞句中詞的結構學關係(見最後一例)。

對比有“的”無“的”對照的例子，可以斷定，當名詞+後置詞在另一名詞之前的時候，這種詞組的定語關係或狀語關係通常相應地表現在“的”的有無上。在第一種情況下，名詞+後置詞所表示的特征只屬於被限定的體詞，在第二種情況下，則是屬於整個句子的。

因此，充當定語的體詞+後置詞用小詞“的”作為其形式，看來是語言為了區別定語與狀語而造成的語法手段。

違反這一規範的頻率有多大呢？

當體詞+後置詞所表示的定語后面跟着指示代詞“那”或“這”的時候，“的”可以省略，<sup>②</sup>例如：

小|學校-里|那個|任|教員，也|不|是|個|好|東西(丁玲，1-40)。

在這個句子中，名詞+後置詞“小|學校-里”不是狀語而是定語，首先可以證明這一點的是，在意義上它只屬於后面的名詞，而不屬於整個句子。

在語調上，名詞+後置詞跟被限定的名詞一起構成一個節拍群，節拍群總是用停頓跟以後部分分開來，通常反映在文字上是加逗號(請參見我們的例子)。狀語在語調上總是以單獨的節拍群出現的。

當名詞+後置詞所表現的定語后面有數量-指示後綴的時候，“的”也可以省略，例如：

① 例如，龍果夫：《現代漢語語法研究》，72-73頁。(譯文《中國語文》1955年3月號，35-36頁。)又見上述《華語課本》，256頁。

② 人稱代詞充當定語在指示代詞前面的時候，它也不必加“的”。例如：“我的|那|本|書”與“我|那|本|書”。

十五个|人-中|三十|来|岁|的|中等|个子|間…  
(周立波, 1—3)。

在另外一些——更多的——場合下,数量-指示詞的前面仍保留“的”,例如:

这|也是|国語-中|的|一个|特点 (黎錦熙, 199頁)。<sup>①</sup>

因此,分析充当定語的名詞+后置詞的使用表明,按照规范,定語要用定語小詞“的”構成,“的”是这类定語形式的要素。这个事实被广泛地記載在汉学文献中,但是对这个現象的原因却有着不同的解釋。

龙果夫在他的《現代汉语語法研究》一書中用名詞+后置詞具有謂詞屬性来闡明它們这个結構学的使用特点。按照龙果夫提出的詞类主張,在現代汉语詞类体系中,区分出两个更一般的范畴——体詞范畴与謂詞范畴。謂詞的基本語法特征是能不借助系詞,独立地表現謂語,能直接同否定詞“不”与情态時間小詞“了”結合。<sup>②</sup>充当定語时,謂詞必須加小詞“的”。<sup>③</sup>

因此,龙果夫把充当定語的名詞+后置詞要加小詞“的”認為是它們具有謂詞性質的証明,而謂詞性質出現的原因是:具有处所和時間意义的名詞(包括名詞+后置詞的复合体),因为常用作動詞-前置詞“在”(цзай || дай)或“到”…的賓語,本身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動詞化”,获得了一系列的謂詞性質。<sup>④</sup>

按照龙果夫的主張,謂詞性的基础是“潜在的不定性与易变性”<sup>⑤</sup>这个語法观念。正是“潜在的不定性与易变性”这个观念構成了“一个共同之点,它在意义上把汉语中的動詞与形容詞結合在一个更广泛的謂詞范畴之内,并且成为它們能不借系詞而充当謂語的原因”。<sup>⑥</sup>

但是,要是从这个角度看地点与時間名詞以及名詞+后置詞,显然,“潜在的不定性与易变性”这个观念决不是它們所固有的。<sup>⑦</sup>

实际上,在龙果夫也認為其中有一系列謂詞性質的名詞+后置詞的詞組(例如:“桌子-上”,“小說-中”等)中,在屬於地点与時間名詞范畴的詞(例如:“县”,“地方”等)中,或者,最后,在地名(山东、北京等等)中,我們看不出它們具有什么“潜在的不定性”观念。显然,什么也沒有。

但是,如果所有这些詞与詞組不具有“潜在的不定性与易变性的观念”,也就是說沒有“它在意义上能結合汉语中的一切謂詞并成为它們能不借系詞而充当謂語的原因”这个共同之点,則关于在它們中間出現謂詞性質的問題的提出,显然是不合理的。把時間名詞与地点名詞以及名詞+后置詞經常用作動詞-前置詞的賓語这一点,引用来作为它們“動詞化”的根据,也是不足以令人信服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历史上,成为現

代汉语中规范的動詞-前置詞,在古代前置詞位置上出現在語言中相当晚,而名詞附近的后置詞早在我們所知的最古文献中已能見到。例如,在《詩經》中,已經可以找到“乎|淇|之|上”,“于|澗|之|中”<sup>⑧</sup>等等。

关于汉语中名詞+后置詞的詞組具有謂詞性質这种理論的正确性,所以引起一定的怀疑,还因为它的理論根据实际上是建筑在各种方言材料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筑在汉族文学語言材料的基础上。

按照龙果夫的意見,体詞+后置詞的詞組的謂詞性質的存在表現在:“在河北省(北京和河間府)的方言中名詞+后置詞…在一定的条件下也能独立地作謂語…”。<sup>⑨</sup>既然独立地,即不借系詞充当謂語的能力是謂詞不同于体詞的特性,<sup>⑩</sup>在某些方言中名詞+后置詞的这种用法,龙果夫也就看成是它們具有謂詞性質的一个标志。其次,名詞+后置詞的詞組充当定語时,其謂詞性質表現在:它們同“凡是能够独立作謂語的詞和詞組”一样,“用作定語的时候必須加上个足以取消它的謂語性的东西,那就是定語-体詞后綴‘的’。”<sup>⑪</sup>

最后,在甘肃諸方言中,名詞+后置詞充当“主語的时候要加上取消謂語性的东西,那就是定語-体詞后

① 研究表明,还有一种情况,这时充当名詞定語的体詞+后置詞的詞組不用定語小詞“的”而直接接在名詞的前面,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加“的”是根本不可能的。例如:那|真|是|人-間|最|美滿的|事情|了(巴金, 1—40);說話|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極|普通的|事情(呂叔湘, 1—1);劣紳|…是|地主-中|特別|凶惡者。

这种情况是很少遇到的,我們全部不过拥有几个类似的例子,而且其中名詞+后置詞总是在句子内部的体詞成分的前面。在这种情况下,后置詞是把中心体詞看成一个范围而加以指明的,在这个范围内,被限定名詞按照某一特征区分出来;所以被限定体詞前面总是还有一个定語,这个定語表示体詞据以区分出来的特征,这个定語通常是帶有某个具有加强意义的詞(最、極等)的形容詞。

在本文中,这种名詞+后置詞,尽管沒有“的”,也認為是定語的一个特殊类别。但是,这不是最后的結論。

② A. A. 龙果夫:《現代汉语語法研究》, 12 頁。(譯文《中国語文》1955 年 1 月号, 7 頁。)

③ 同上, 72 頁(譯文《中国語文》1955 年 3 月号, 35 頁。)

④ 同上, 71 頁。(譯文同上)

⑤ ⑥ 同上, 160 頁。

⑦ 这一点是 B. M. 宋采夫提醒我注意的。

⑧ 《四書五經, 詩經》, 上海, 1936 年, 21, 6 頁。

⑨ 龙果夫:《現代汉语語法研究》, 71 頁。(譯文見《中国語文》1955 年 3 月号, 35 頁。)

⑩ 同上, 12 頁。(譯文《中国語文》1955 年 1 月号, 7 頁。)

⑪ 同上, 72 頁。(譯文《中国語文》1955 年 3 月号, 35 頁。)



綴‘的’。”①这个现象也被认为是名詞+后置詞的謂詞性質的表現。

由此可見,关于名詞+后置詞具有謂詞性这一点,龙果夫是引用了現代汉语各个方言的一系列材料以及口語材料加以論証的(帶后置詞的詞組充当定語时要加“的”)。在分析龙果夫的理論之前,讓我們先指出下面几点。

在被提出來証明关于名詞+后置詞的詞組具有謂詞性質的論点的所有理論中,唯一能在一定程度上証明在汉民族語言中这类詞組具有謂詞性的,就是它們充当定語时要加“的”。但是,为了弄明白名詞+后置詞的这个結構学使用特点是否能真正地作为它們具有謂詞性的充足証据,重要的是确定加“的”的形式是不是謂詞永远必要的,以及,相反地,对于充当定語的体詞是不是不必要的。

正如伊尔墨在其論文中所指出的,定語加小詞“的”的形式同所表示特征的“偶然”性質有关,“偶然”性就是跟事物本性無关的限定特征,它不同于事物具有的普通的或“經常的”限定特征,所以汉语中動詞不要加小詞“的”,如果它充当定語时表示已經改变了的事物的状态,事物的新的經常性質的話(請比較:“損|布”;“破|馬褂”;“烤|面-包”;“紅燒|海參”等等)。另一方面,体詞充当另一体詞的定語时并不要利用小詞“的”,如果它表示事物的經常的消極特征的話:“地方|工作”;“鵝蛋|臉”②等等。由此可見,名詞+后置詞充当定語时加“的”的形式不能作为它們具有謂詞性質的充足証据。

現代汉语中名詞+后置詞还失去了謂詞的一个基本屬性——在句子中不借系詞充当謂語的能力。龙果夫引为証据的是在河北省的一些方言中,名詞+后置詞具有不借系詞充当謂語的能力。在这些方言中表現出來的这种現象只是这些方言具有的,而非民族語言所具有的。而且甚至在這些方言中存在着的名詞+后置詞不借系詞用作謂語的情况,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爭論的。实际情形是:引用來作为这个理論的証据的是如下类型的例子:

包袱|掉的|河里(包袱|掉+的一主語,河里—謂語)。

把|那个|魚|捉(р|жао)的|鍋里;

剛|喝完啦,就|把|那个|酒杯|統的|袖里啦;

坐的|他|娘|旁边兒(河間府方言),

北京方言中的类似句子为:

別|睡的|地下。(別|睡+的一主語,地下一謂語)

你|住的|哪兒?——我|住的|北京;③等等。

按照龙果夫的意見,在这些句子中,主語包括“的”前面的与“的”本身全部,其余的——名詞+后置詞的

詞組——是謂語。除了普通前置詞結構(即前置詞“在”在“的”的地位)之外,这种結構的存在,龙果夫用現代汉语具有的总趋势來說明。这个总趋势是:“只要可能,就把邏輯上的謂語和語法上的謂語等同起来,把一切对于說話的人說起來是邏輯上最重要的,都变成語法上的謂語”。④

除了“包袱|掉|在|河里”或“包袱|掉|到|河里”形式的普通動詞-前置詞結構之外,語言中“動名詞”結構的出現,按照龙果夫的意見,是由下兩種情形促成的:“第一是后綴‘的’和無重音的前置詞‘在’(цай||дай||дэй)和‘到’(дао||до)的發音的接近。其次是…这种名詞+后置詞的組合形式的显明的謂詞性…”⑤

但是,不能不指出,這兩種情形——一方面是后綴“的”与前置詞“在”(цай||дай||дэй)和“到”(дао||до)的發音的接近,另一方面是名詞+后置詞的謂詞性的存在——是兩個相互排斥的解釋;在对句子进行語法分析时,它們被用来作为出發点,但是对这类句子,可以根据它們作出兩個完全不同的解釋。

1. 要是在这类句子中不用前置詞而用“的”,是在这些方言中“的”跟前置詞“在”与“到”的發音接近的結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就只不过是前置詞的語音变体,因此“的”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意味着句子的語法結構上有什么变化。

对这种句子的这个解釋是清清楚楚的。⑥

要是“的”的存在是名詞+后置詞的詞組作为謂語使用的結果,問題就完全不同。在这种情况下,“的”的語法作用根本不同于相应前置詞結構中的前置詞的作用;“的”賦予前面的詞組以体詞性質,使它成为主語。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的”的存在無論如何不能解釋为它跟前置詞的發音接近的結果;这时“的”表現另外的句子的語法結構。

龙果夫对“包袱|掉的|河里”句型的語法結構的分析(把“包袱|掉的”認為是主語,而“河里”是謂語)是不完全合理的,因为这个分析(为了証明名詞+后置詞具

① 龙果夫:《現代汉语語法研究》,73頁。(譯文《中国語文》1955年3月号,36頁。)

② Е. И. Ильмер:《現代汉语中名詞的定語功能》,碩士學位論文(打字本),列宁格勒,1955年。

③ 所有上面所引的例子与例子的附注都取自龙果夫的著作,71—72頁。(譯文《中国語文》1955年3月号,35頁。)

④ 龙果夫的上述著作,72頁。(譯文《中国語文》1955年3月号,35頁。)

⑤ 同上,107頁。(譯文《中国語文》1955年6月号,29頁。)

⑥ 1953—1954年邢公畹教授在莫斯科东方學研究所所作的演講中对这种句子也提出了这种解釋。

有謂詞性而作的)实际上不能證明它們具有謂詞性,而是以它們具有這種屬性的這個假設為出發點。由此可見,這個分析的最終目的就是那作為分析出發點的關於名詞+后置詞的詞組具有謂詞性這個理論本身的証據。

龍果夫還提出另外一個理由作為名詞+后置詞具有謂詞性的證明:謂詞充當主語時照例要加這個或那個體詞後綴,特別是後綴“的”;在甘肅諸方言中,名詞+后置詞也是這樣。由於它們的謂詞性質,用作主語的時候要加上取消謂詞性的後綴“的”。①作為例子的有下面一些句子:

我們|園子里的|一好|李兒|帶|果子(=蘋果);  
鍋里的|啥?一鍋里的|肉;②等等。

但是就是這種情況下,由於對“的”的作用的闡述存在着某種矛盾,關於這種句子的類似解釋也引起一定的懷疑。龍果夫在稍後對比“我們|園子里的|一好|李兒|帶|果子”句子跟它的否定句“我們|園子里|沒有|好|李兒|帶|果子”時,指出第一類帶後綴“的”的句子跟第二個句子比較,具有着重的、加强的意義。龍果夫認為在甘肅諸方言中,第一類型結構的存在本身是因為在這些方言中“…系詞‘是’不用於對比的、加强的意義上,這一項任務由後綴“的”來擔任。在其他方言和白話中,則在這種情況下需要用系詞”。③換句話說,“的”在這種情況下充當系詞。

由此可見,即使在此種情況下,名詞+后置詞具有謂詞性也是不足以令人信服的。既然名詞+后置詞具有謂詞性得不到確實證明,於是產生了一個問題:名詞與它前面的名詞+后置詞的詞組之間在沒有附加語法手段的時候不發生定語關係這一事實,究竟怎樣解釋呢?

看來,伊爾墨在上述論文中對這個現象作出了正確的解釋:地點特征是獨立於事物之外的,不是事物本身固有的特征,因此必須給它加上小詞“的”。

### 現代漢語中后置詞的語法本質

對名詞+后置詞的詞組的結構學用法的分析表明,在句子中,這種詞組總是充當結構學上的一個從屬成分——狀語或定語。大家都知道,作為輔助詞的后置詞的基本特征也正是它在結構學上的從屬性:后置詞不是句子的獨立成分,而是跟中心詞一起構成句子的一個成分。正如上面已經指出的,在中國作者的著作中,后置詞通常被認為是名詞的一個小類。因此“桌子—上—桌子—上面”型式的詞組被認為是兩個名詞構成的定語關係詞組。④這種說法會引起如下的反駁意見。

第一,在任何定語關係詞組中,可以對被限定成

分提出問題。但體詞+后置詞的詞組不允許提出這類問題。

第二,漢語中名詞的重要特點是它們前面能附加用形容詞、數詞等表現的定語。后置詞跟名詞不同,不能加進某一實詞而把它同中心體詞分离開來,這一點証明了它們沒有加用定語的能力。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漢語中兩個名詞的定語關係詞組表示它們所表現的事物之間的關係(例如:領有者與領有事物之間,特征與特征負擔者之間,整體與部分之間,材料與物體之間,等等),而體詞與從屬於體詞的后置詞的組合表示完全不同的關係。

但是,后置詞輔助體詞的作用還不能作為確定后置詞語法本質的充足証據:因為跟表示體詞的結構學關係有關的輔助功能不僅是輔助詞(后置詞與前置詞)所固有的,而且也是作為體詞形式的格所固有的,所以,現代漢語中后置詞到底是輔助詞,還是它們(或其中一部分)目前已經轉變成體詞的形式,這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這個問題的複雜性還由於漢語后置詞與其他語言中格詞尾表面上的近似。其實,作為輔助詞的后置詞不同於格詞素,其所以不同的決定性特點在於后置詞具有一定的詞彙意義,正是憑藉着詞彙意義,后置詞才列入語言的詞彙中。

根據這個觀點,對比一下一系列同類型句子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例如:

桌子上|放着|一本|書;

桌子—里|放着|一本|書。

在漢語中這兩個句子就詞的結構學關係的性質來說,是完全相同的,就句子的具體含義來說,却是不同的。差別之點在於:在這兩個句子中表現着一個事物(書)對另一事物(桌子)的不同的實際位置。這一簡單的對比表明,漢語中的后置詞,除了表示詞與詞之間的結構學關係外,還表示事物與現象的一定的實際關係,因此,具有一定的詞彙意義。這就是說,現代漢語中的后置詞,就其本質上看,不是詞的形式,而是輔助詞。

有人可能反駁我們說,單音节后置詞不同於雙音节后置詞的特點,是它們不僅能跟帶後綴的名詞結合,例如:“村子—里”,“桌子—上”,“院子—中”,而且在許多

① 龍果夫的上述著作,73頁。(譯文見《中國語文》1955年3月號,36頁。)

② 同上。

③ 龍果夫的上述著作,74頁。(譯文《中國語文》1955年3月號,36頁。)

④ 例如,見高名凱《漢語語法論》,192頁;又見《中國語文》1952年11月號,20頁,《語法講話》。



場合下還能跟這個體詞的無後綴形式結合，例如：“村-里”，“桌-上”，“院-中”。單音節後置詞的這個使用特點有時被認為是它們具有後綴性質的語法標志。例如，B. M. 宋采夫指出了後置詞不僅能在體詞後綴（“獨立的”）形式上而且能在無後綴（“半獨立的”）形式上“生長”，① 對比了帶後置詞的半獨立形式體詞詞組與相應的帶後綴的體詞（例如，“屋-里”——“屋子”；“村-上”——“村子”等等），並由此得出結論說：“後置詞在一系列情況下排擠後綴‘子’並占居它的位置，因而獲得詞形變化後綴的性質，也就是說，能改變詞的形式”。②

但是，這個結論是不完全合理的。

首先應當指出，歷史上不是後置詞“排擠”了後綴“子”，占了它的位置，相反地，是後綴“子”排擠了後置詞，因為在漢語中單音節後置詞的起源在歷史上比名詞後綴“子”要早得多。名詞加後綴（包括“子”在內）的形式同漢語中詞的雙音節規範的發展有關係，它在歷史上是遠為晚起的現象。

名詞加後綴“子”的形式在文獻中大約從紀元五世紀起可以見到。但是這種形式在規範上作為名詞的一定部分看來是很晚才形成的。在十三世紀的長篇小說《水滸》中，這些名詞通常使用起來還是不帶後綴：後置詞直接同單音節名詞結合。正如宋采夫在他的學位論文中所指出的，單音節名詞加後綴“子”並不給這個名詞添加什麼附加意義，因為在意義上此時不產生新詞。後綴“子”改變了古單音節名詞的存在形式，“排擠”了後置詞，現在後置詞已經能跟帶後綴的體詞結合，雖然，還同時保留下來跟這個名詞單音節形式的結合能力。但是應當指出，正如 B. C. 伊三克正確地指出的，允許以單音節形式跟後置詞結合的名詞的範圍是極其有限的。這是特殊的例外，決不是只能普遍適用於某些名詞的規則，這些名詞按本身語義來說，很容易用作地點狀語。

宋采夫拿後置詞同體詞“半獨立”形式的詞組（屋-里）跟名詞的辭典形式（屋子）做了一番對比，據此並作出關於“屋”是具有幾個派生形式的不變詞干的結論，這是不十分合理的。

宋采夫既然承認體詞“半獨立”形式是在語言中具備獨立使用（雖然是有局限的）的能力的詞，它跟後置詞的結合體，從結構上看，就不是一個詞，而是兩個詞合成的詞組。這就是說：後置詞跟不帶後綴體詞（用宋采夫的術語就是“半獨立”形式）的詞組，就語法意義說，同它的所謂獨立形式絲毫無關，因為在第一种情況下是詞組，其中第一個成分與第二個成分都是單獨的詞；在第二種情況下是由詞干與附加成分組成的單一的詞。

因此，把後置詞解釋為單獨的輔助詞是比較正確的。

### 幾個結論

對現代漢語中體詞狀語運用的研究表明，體詞狀語通常以“前置詞——體詞——後置詞”形式出現。狀語成分中同時存在兩個同類輔助詞（前置詞與後置詞）是漢語結構學上的特點。這個現象的原因在哪裡呢？

我們感興趣的一組前置詞③的意義，基本上可以歸結為下面三個：

1) 從什麼出發；

2) 趨向什麼；

3) 處在什麼之中。

狀語結構成分中的前置詞，根據本身的詞彙意義表示中心體詞所表現事物，是對於謂語所表現行為或特征的起點或終點（在空間中或在時間上），或者是這個行為或特征出現的地点（或時間）。

狀語成分中的後置詞用來確定其方向，是由前置詞表示的，對於中心體詞所表示事物在空間中或在時間上的位置（“中”、“旁”、“邊”等等）。

因此，漢語狀語成分中兩個同類輔助詞（前置詞與後置詞）的同時存在是同它們在功能上的上述差別有關係的。狀語成分中前置詞與後置詞在功能上的一定差別以及它們對於中心體詞所處位置的不同是因為歷史上它們各有各的來源，也就是說，是因為它們在其中發生與發展的結構學構造是不同的。

可以斷定，漢語中前置詞在歷史上是由動賓結構中的動詞發展而來的，那時這種結構處於主要謂語的前面，因此充當謂語的修飾成分，即次要的、從屬的成分。由此可以看出前置詞之所以在中心體詞的前面與整個前置詞-體詞結構之所以從屬於謂語的緣故。

漢語的後置詞起源於體詞。它們是在定語關係的  
(下轉 14 頁)

① 關於這種形式（所謂體詞的半獨立形式）的詳細情況，見 B. M. 宋采夫的碩士學位論文《漢語中詞與詞根的問題》（打字本），莫斯科，1953。

② 見 B. M. 宋采夫的上述論文，第一篇第二章。（文內談的是兩個單音節後置詞——“上”與“里”，但是，因為跟體詞無後綴形式結合的能力也是其他單音節後置詞所具有的，顯然，把它們也看成後綴構造是更合乎邏輯推理的——作者。）

③ 這裡指的只是那些跟後置詞合用的、本文所討論三類狀語（地點、時間與行為條件）成分中的前置詞。關於這一組前置詞，見龍果夫的上述著作，126—127頁。（譯文見《中國語文》1955年8月號，35頁。）

問	題
解	答

## 拼音字母为什么要有名称

問：拼音字母为什么要有名称？为什么不用注音字母的名称或者英文字母的名称？

讀者 余志道

答：字母有音值，又有名称，好比人有職業，又有姓名一样。为什么有了音值又要名称呢？因为：1) 字母多数是表輔音的，如果没有元音接在前面或后面，整个字母就叫不响亮，听不清楚。接上一个元音一同称呼，这就是它的名称了。2) 有些字母音值相同，例如汉语拼音字母 i 和 y, u 和 w。为了要使音值相同的字母称呼起来有区别，就得給它們起个听来不易相混的名字。3) 有些字母虽然音值各异，可是說的人和听的人彼此离得远了(例如教师和学生)，或者在电话里說，在無線电广播里說，就容易听錯。例如 l 和 n，它們的音值是不同的，可是听来容易相混，有些方言区根本把它們混作一个。这些易混的字母，就得有听来不易相混的名称。例如 l 的名称叫 ㄌㄌ，n 的名称叫 ㄋㄋ(不叫 ㄋㄌ)，这就不会听錯了。总之，字母所以要定名称，是为了称呼方便，說的人說得清楚，听的人不会听錯，这是有不可忽视的实际作用的。

我們的字母名称是怎样規定的呢？大致如下：1) 元音字母以汉语音值为名称，不另定名称(因为元音可以说得响亮)。2) 輔音字母在汉语音值前面或后面接上一个元音。元音接在或前或后，可以增加区别力；接上的元音不尽相同，也是为了增加区别力。3) 汉语音值相同的字母要有不同的名称。4) 汉语易混的字母要

有不易混淆的名称。5) 参考各国字母名称，尽可能接近国际最通行的名称。

为什么不就用英文字母名称呢？英文只是采用拉丁字母的文字之一種。它的字母讀音比較特殊，跟我們汉语的字母音值相去較远。我們的字母名称也有接近英文名称的(例如 j 叫 ㄐㄐ)，可是多数跟德文、法文或其他大陆文字相近。字母名称的基础是本国的音值，音值不同，名称也应当不同。例如 a 的汉语音值是 ㄚ，英文名称叫 ㄞ，差得太远，这如何能借用呢？拼音字母是我們自己的汉语拼音字母，当然要有汉语的名称。

为什么不就用注音字母的名称呢？第一，注音字母名称彼此之間区别力不大，听来容易弄錯。只要在电话里試一試，把一系列注音字母名称念給人家听，看人家听对了几个，听錯了几个，就可以明白。第二，拼音字母有 y 和 w 这样原来注音字母所沒有的字母，非得另定名称不可。第三，为了便利国际間文化交流，我們采取国际化的名称，但是同时又使它合乎汉语的特点，为汉语服务。

学习这一套字母名称难不难呢？一点也不难。小孩子听到字母歌，很快就会唱，字母还没有認識，字母名称已經唱順口了。26 个字母，按照汉语詩歌的傳統習慣，分成四句，前兩句各“七字”(七言)，后兩句各“六字”(六言)，句句押韵，非常容易上口。(参看《拼音》月刊1957年5月号：周有光《拼音字母的名称問題》；沈鶴巢《各国拉丁字母名称比較表》)(周 明答)

(上接49頁)

b) 数字非十分必要时不用。

c) 引号一律取“ ”形式，外双內單。引別人的話固然非用不可，可是用在自己的話里就要慎重考虑，避免濫用。

d) 书名篇名号一律取《 》形式。

e) 注碼一律用帶圈的阿拉伯数字，如①、②。

f) 着重点的使用需要多加考虑，不要随便加。

其他，如分号和冒号要書写清楚，避免混同，以及用不用破折号，等等，就不必細举了。

5) 語文工作者写的文章有时需要使用国际音标或者引用外文。音标的字体不能草率，必須是楷体；外文最好也能写成印刷体。

以上所談的属于技术加工的体例問題，不过是犖犖大者，也是文章中常發現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古人对于写作体例就是講究的，近人更是認真要求。不过越是大家知道的事，往往越是習而不察。从作者写作的心理活动上說，沒有人不重視自己的創造性劳动成果的，所謂“敝帚自珍”的心理誰也不免，可是稍稍一想到要尊重別人的劳动时，就不难意識到写作体例的重要了。固然内容重于形式，但是世界上的事沒有只重内容不講形式的。可以想像，一位作者把稿件送到編輯部，一位青年科学工作者把文章送給导师，要是完全不注意写作体例，那該花費別人多少劳动呢！



# 语文短评

404 一般知識分子对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特別感到兴趣。因为既然有了知識，总想把这些知識有所表現。  
(人民日报 1957 年 9 月 30 日 7 版)

“把…有所表現”說不通。“表現”之前加上“有所”以后，它就不能再帶賓語，因之提前的賓語“這些知識”就沒有動詞來支配了。可把“把”改為“使”，或者去掉“有所”，在“表現”之後加“出來”。“爭鳴”之後的逗號是多余的，可去掉。(詹人鳳)

405 全國著名的鳳陽烟叶，每年總產量達十七萬担，比 1952 年增長了 32% 以上。(人民日报 1957 年 10 月 5 日 1 版)

這個“每年總產量”從什麼時候起？文中沒有明確交代。是否從 1953 年起，才和 1952 年相比？如果是這樣，應當在“每年”前加“從 1953 年起”。如果只是今年一年的產量，應該把“每”字換作“今”字。(程澤)

406 在先后擔任總理和總統的職位上，薩波托斯基對捷克斯洛伐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整個國家生活作了多方面的卓越的貢獻。(人民日报 1957 年 11 月 15 日 1 版社論)

“在…職位上”和“擔任…職位”是一個意思。要就是“先后在總理和總統的職位上”，要就是“在先后擔任總理和總統的時候”，不要夾雜着說。(張正寶)

407 拖拉機廠安好設備兩千台(人民日报 1957 年 11 月 27 日 3 版標題)

從文章中看，這裡的“設備”是機器，但是拖拉機廠的設備不僅是機器，同時“設備”是不能有個數的，當然也不能論“台”，索性把“設備”改為“機器”。(趙長信)

408 領導人：我不給你原則，是要考驗一下你，這樣才能鍛煉幹部。(人民日报 1957 年 11 月 28 日 4 版)

“一下”作補語的時候，如果賓語長，“一下”直接放在動詞之後，賓語之前，例如“考驗一下青年幹部”；如果賓語只有一個字，像這裡的“你”，“一下”就得放在賓語的後面。(而中)

409 上猶水電站的建成打破某些水電站比火電廠建設慢，投資大的成見看法，…(人民日报 1957 年 12 月 1 日 1 版)

1) “某些”不知是修飾哪個名詞的。這裡“水電站”應指所有水電站，不能加“某些”；“看法”只有一種，也不能加“某些”。惟一可能是指“某些人”，但“某些人”之後還應該有一個動詞。2) “建設慢”之後的逗號應換頓號；3) “成見”和“看法”意義重復，按文義，可刪“看法”。全句改為：“…打破了某些人認為水電站比火電廠建設慢、投資大的成見，…”(黃世翔)

410 衡陽湘江大橋有七孔，全長 426 公尺。今年元旦前可以通車。(光明日報 1957 年 10 月 6 日 2 版)

“今年元旦”早已過去了，這裡的“元旦”諒系指 1958 年元旦。應該把“今年元旦前”改做“年內”。(莫善樂)

411 中共江蘇省委文教部在今後將更多地組織政治教師及其他高級知識分子去農村作好準備。(光明日報 1957 年 10 月 25 日 1 版)

這句話唸下去到“去農村”就好像完了，“作好準備”無論在句法上或是在內容上都接不上，應刪。如果“作好準備”是謂語的主要部分，則應在“將”後加“為”。這兩句話意思不一樣，不知作者到底是什麼意思。此外，“更多地組織…”也不如“組織更多的…”順當。(羅忠新)

412 民盟市委宣傳部長陳翰伯以“我們的目的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為題，駁斥了右派分子故意歪曲“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政策，指出…(光明日報 1957 年 10 月 31 日 2 版)

“方針政策”本是“長期共存…百家爭鳴”的中心詞，但這裡卻成了“駁斥了”的賓語，這是不對的。駁斥的應該是右派分子的謬論，應該在“政策”後面添上“的謬論”。“方針”前的“的”字可去掉。(劉凱鳴)

413 由於右派言論在农村、特別是城鎮附近和工作薄弱的农村，有些人中了它的毒。(中国青年報 1957 年 7 月 29 日 1 版)

1) “右派言論”缺少一個謂語，應該在“工作薄弱的农村”後面加上“傳播開來”之類的話。2) “工作薄弱”前應加“政治”二字。(莫善樂)

414 这种教育方式虽則是受“刘介梅的今昔对比展覽会”的啓發，但在上海却得到了推广。(中国青年报 1957 年 10 月 24 日 2 版)

“虽則(虽然)……但是……”一般用在語气轉弯的場合，如“虽則失敗了，但是一点也不灰心”，本句并無轉折之意(“受刘介梅……展覽会的啓發”和“在上海得到推广”并無矛盾)。應該把“虽則是”、“但”、“却”都刪去。(徐允)

415 摄影組同志發揮了高度的工作責任心，將原需二个月的筹备時間縮短为一半。(文匯報 1957 年 10 月 17 日 2 版)

1)“一半”是数量詞，用在“为”后并不表示具体的時間量。如果用“为”，就得說成“为一个月”；如果用“一半”，就得去掉“为”。(刘凱鳴)

416 崇明島上的人民，世世代代在这个小島上以勤勞奋斗的精神与風暴、海浪、敌人斗争，解放前島上人民的生活从未被人关怀过，他們一直在穷困、灾荒、搶劫、掠夺下过日子；解放后只有几年工夫，小島在党与政府的领导下不但恢复了过去的創伤，而且各方面都蓬勃發展，面目一新。(文匯報 1957 年 11 月 11 日 3 版)

1)“勤勞奋斗”不如“坚苦奋斗”，但是既与風暴、海浪、敌人作斗争，就不可能不是坚苦奋斗，“以勤勞(或坚苦)奋斗的精神”在这里并不起多大作用，可刪。2)“敌人”不知道指哪些人。無論是日本人或蔣帮都不可能是“世世代代”斗争的对象。如果指土匪，最好就称之为土匪，而不用籠統的“敌人”。3)“搶劫”和“掠夺”意思没什么大不同，不如改为“剝削”。4)“恢复……創伤”，没这回事，把“恢复”换成“医治好”才是。(仲和、季民)

417 湖北日报从長江大桥通車掀起了高潮(新聞与出版 1957 年 10 月 25 日 1 版标题)

掀起了什么高潮？文章中有“……已掀起了紀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宣傳的第一高潮”的話，則标题里“高潮”前面的“宣傳”是不能省的。如果受字数的限制，宁可省掉“長江”兩字。(黃薇远)

418 从羊長發的事例里給我們严重的教訓。(青年报[上海] 1957 年 11 月 1 日 1 版社論)

句中缺少一个必要的主語。改法：1)刪去“从”和“里”，2)刪去“給”，在“我們”后面加“得到”。(徐允)

419 邑庙区公安分局下令取締一个……欺騙病人的三姑六婆陈素珍。(新聞日报 1957 年 11 月 19 日 2 版)

“三姑六婆”包括九种人物(尼姑、道姑、卦姑；牙婆、媒婆、师婆、度婆、藥婆、稳婆)，現在拿它来作陈素珍的定語，显然是不妥当的。如果加上一个引号，也許勉强可以借用。(王漢之)

420 ……今冬明春需做土方約四亿公方，超过工程最多的 1956 年的 14%。(新华日报 1957 年 11 月 22 日版)

如果只超过 1956 年的 14%，就根本說不上“超过”。这里显然多了一个“的”字，应刪掉。(張正雲)

421 全世界輿論同声欢呼紅色月亮發射成功，欢呼苏联科学的偉大胜利，特別在第二个又大又高并帶有动物的人造月亮升起的时候，完全震惊了整个地球，千千万万人的眼睛都面向天空，……。 (山西日报 1957 年 11 月 28 日 4 版)

“輿論”不能“欢呼”，“眼睛”不能“面向”。不如把“輿論”换成“人民”，把“面向”换成“望着”。(高貴明)

422 一二·九运动中的青年学生和知識青年所走过的光輝道路和优良傳統，……。 (四川日报 1957 年 12 月 9 日 1 版社論)

“所走过的……优良傳統”不通。可改为“……知識青年的优良傳統和所走过的光輝道路”，(王若瞻)

423 而其主要作用是用它来把語言形象化地固定在書面上。(中国語文 1957 年 1 月号 6 頁)

这里的兩個代詞“其”、“它”都指文字，若把它們还原，這句話就成了“而文字的主要作用是用文字来把……”，可見“它”跟“其”打架，刪去“用它来”三字。(赵恩桂)

424 “字”这个詞兒，它这种作用，在現阶段我們还应该充分利用它；不必立出一个“詞素”的名目代替了它。(中国語文 1957 年 1 月号 8 頁)

这里三个“它”，第一、第三个“它”不成問題是指“‘字’这个詞兒”的，可是第二个“它”呢？从語法上看，應該是指“它这种作用”的；从意义上看，應該是指“‘字’这个詞兒”。又“代替了它”的“了”应刪，“不必立出……代替了它”这种說法也别扭。全句可改为：“‘字’这个詞兒既然有这种作用，在現阶段我們还应该充分利用它，不必另立出‘詞素’的名目”。(赵恩桂)

425 我們把文学和語言的修养也应该不断地吸取新的知識来丰富和提高。……并把自己爱好中国文学作品例子来啓發實習生。(語文教学 1957 年 11 月号 1 頁)

这里的兩個“把”字用得都不对。前一句中根本不能用“把”把宾語提前，应刪去“把”字，讓“文学和語言的修养”回到“提高”之后。后一句的“把”字应改为“用”。(丁植園)



# 书刊评论

《四声究竟是什么东西》，陈家康著。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5月第一版。32开，30页，定价0.14元。

这本书是讨论汉语声调问题的一个专著。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论题，认为汉语的声调是基于元音和辅音的音素不同而形成的各种字音，作者称这种字音为音调。基于这个理论，作者又论证了北方音系里的所谓四声，是由清浊两类声母和长短两类元音配合起来而构成的。另外还提到以半元音和元音起头的字，前面还有半元音，这种半元音也是一清一浊。

为了论证上述的新的论题，作者还评述了前人对声调所下的定义，主要是驳斥了四声的声母和韵母的音素完全相同的说法。

诚然，前人对声调所下的定义，是有些失之笼统或没有抓住它的本质。但是，陈先生的论证是不是解决了四声五声的问题呢？是不是完全揭示了四声五声的本质呢？在我个人看来，并没有。

首先来看声母清、浊的论据，声母的清浊是指发音时声带不振动与振动而言。也就是发清声母时，声带不振动，发浊声母时声带振动。（早期所谓清浊也许与声带振动与否无关，另有所指。）在汉语的声母里，众所周知，有清的也有浊的。在北方音系里除了不送气塞音、塞擦音辅音是清是浊尚可争论外，其他声母像鼻音 m、n、ŋ，边音 l，半元音 j、w、等都是浊声母（零声母暂且不表）。p'、t'、k'、s、f、ʃ、ts'、tɕ'、tɕ'、q、x 等都是清声母，这应该没有问题。但是照陈先生的解释，情况就不一样。陈先生说：“北方音系中同样有清浊两种辅音”。“如果拿一个浊辅音和一个长元音相拼起来，就会产生一种历来称为浊平的音调（又称阳平）。如果拿一个浊辅音和一个短元音相拼起来，就会产生一种历来称为浊上的音调，也不妨称为浊仄（现在将北音浊上称为去声，这是不对的，北京音系没有去声）。”（见原书 28—29 页）这样一来，汉语的每一个声母都能有清浊两种性质，因为陈先生所称浊平与浊仄中所有的声母都能拼，同样清平与清仄中也是所有的声母能拼。也就是同样一个辅音或半元音，在清平清仄里是清的（如把把、嫣嫣等），在浊平浊仄里是浊的（如拔拔、麻麻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既然清浊是以声带振动与否为依归，那么同是一个声母，又怎能在一个元音（即令像陈先生所分的长元音或是短元音）之前一会儿声带振动，一会儿声带不振动呢？所以把声母全认为是两套，不光是声母没有定型，而且凭什么理由来说明这种区别呢？

再看长短元音。陈先生说：“以北京等地为代表的北方音系具有两种元音，第一种是长元音（即平），第二种是短元音（即上），而没有像南方音系的那种中元音……”（原书 25 页）。陈先生认为北方音系上、去声字元音都是短的，清平、阳平字元音都是长的，但是据人们的实验和观察，恰好是在许多情形下上声字比较长。陈先生引白滌洲《关中声调实验录》来说明实验没有推翻江永等的平仄长短论。但白滌洲氏的结果，是

指平均数而言，而在许多情况下（也就是某些声母、某些韵母条件下）阴平或阳平比上声为短的并不乏其例（参考白滌洲《关中声调实验录》）。再者陈先生说南方方言有长元音、中元音、短元音三种，也就是平声是长元音，上声是短元音，去声是中元音，那么这样的区分用甚么事实来证明呢？据我观测的结果，广州方言中上声较去声为长（以阴上最明显，当然也不定型化）。也许陈先生所指南方方言没有包括广州话，那么就给吴语做做实验看，未必能得出短、中、长三种元音的区别。

既然北方话里声母清浊论与元音长短论都说不过去，也即证据薄弱。那么四声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声调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认为，汉语的声调乃是发音时音的高低升降所形成的曲线型式（可用仪器实验出来），曲线型式不同就形成不同的声调。赵元任曾提到过这种曲线形状的问题（参考《现代吴语的研究》79 页）。曲线型式是声调最本质的特征，曲线型式不同，形成不同的声调。一字有声调的不同，只要把握住高低升降曲线型式这一本质，就能理解声调的实质了。

我们并不排斥声母的清浊跟韵母组成部分如半元音介音、辅音声母皆为声调构成的条件，也不排斥音的长短和音的强弱对声调起影响作用；但不影响高低升降曲线型式的改变时，这种影响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比方北京话里的“牙”、“额”其音势是有区别的，但不影响高低升降曲线的型式，我们还是把它看成是同声调的字。

既然是高低升降曲线型式的不同形成各种声调，这种型式有几种，就有几种声调，那么我们就需要借助声母的清浊不同来解释声调的形成，同样也不必仰仗元音长短的区分来解释声调的形成。同样一个 ma 音节，论声母是 m 辅音，论韵母是 a 元音；为什么有妈、麻、马、骂四种不同的音呢，就是这四个字的音，高低升降曲线型式各不相同而已。

声调是汉语的一种很大的特点，汉藏语系诸语言如藏语、傣语、傈僳语、彝语、苗语、越南语皆有这种特点，对于这种声调都可以用高低升降曲线型式去解释。同时各个语言里的声调的高低升降曲线型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在一个具体语言中自成系统。所以汉语里有所谓四声五声，就是这种系统中的类别。

陈先生的论文中的立论有许多是不能被人接受的，但是并不能得出结论说，这篇论文一无可取。相反，其中也有好些新的可取的论点：比方指出了南北方言声调的不同，自古就存在，切韵系统是代表南方方音。不能把南方音系的声调硬往北方音系上套（参考原著 20—25 页）。又指出了制定汉语拼音文字时应考虑到标调问题，也是理论的探讨要结合当前实践的一种观点。再就是陈先生大胆提出了关于声调问题的新论，这会起语言学工作者们对声调的研究的重大兴趣。

上面是我对陈先生的论文一些个粗浅的看法，我的学力浅薄，同时在这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极少，错误在所不免，特此就正于陈先生和读者们。（杨道经）

《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 1957年第2期, 1957年6月出版。定价: 道林本1.00元, 报纸本0.70元。

这期学报发表了林燾的《现代汉语补足语里的轻音现象所反映出来的语法和语义问题》一文。这篇文章主要是从语音角度来探讨语法和语义问题。

全文共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趋向补足语里的轻音现象。作者指出单音节的趋向补足语永远轻读, 如“走·来”。值得注意的是双音节的趋向补足语, 在一般情况下, 两个音节也都要轻读, (只有在加重语气时, 第一个音节可以不轻读。) 趋向补足语之前加上“得、不”变成可能补足语, 这时, 两个音节就不再轻读。这一点很重要。根据这个规律, 作者解决了趋向补足语和宾语在位置上的关系问题。许多语法书都认为趋向补足语的宾语比较自由, 可以放在趋向补足语的后面。如“拿·出·来一本书”; 可以放在趋向补足语的前面: “拿一本书·出·来”; 也可放在趋向补足语的中间, 如“拿·出一本书·来”。作者指出这里有了问题: 趋向补足语是一个成分, 在一个成分中间能插东西是很难理解的。作者根据前述补足语的轻音现象, 指出这种“拿·出·来”的格式只有“出”是趋向补足语, 后面的“·来”不是, 已经接近于语气词了。因为这种格式假如变成可能补足语: “拿·得出一本书·来”时, “·来”仍轻读, 和前面的规律不合。可见, 这“·来”并非趋向补足语, 而它放在句尾轻读, 性质倒很像语气词了。作者这个见解是很好的, 这一部分也是全文最精彩的一部分。

第二部分是可能补足语里的轻音现象。可能补足语就是指主要动词和补足语之间有“得”或“不”的。作者认为“得、不”永远轻读, 它们后面常是一个单词, 这单词不轻读。他指出“得、不”不是词头, 不是词尾, 也不是词头, 而是独立的词。他否认只能插“得、不”, 不能插别的成分的“打倒、看见”之类是一个词, 主张要重视后面补足语的作用。总之, 认定“得、不”的前后都只能是独立的词。肯定了这一点后, 再进一步分析了“得、不”和它前后的词的关系: “得”的轻读的高度永远跟着它前面音节的调值而改变, 所以“得”和前面的动词关系较近; 而“不”和后面补足语的关系较密切。除了从语音角度来观察以外, 作者还从语法和方言两方面来证明“得”和“不”在可能补足语里的作用不相同。

第三部分是程度补足语里的轻音现象。作者指出北京话里, 程度补足语的“得”有两个读音——de 和 dou。一个是由“到”变来的, 在北京话里可两读, 一个原来就是“得”, 作者并从方言和古汉语中加以论证。

第四部分是少数结果补足语里的轻音现象。一般结果补足语都不能轻读。作者指出“见、住、掉、死、开、到、着(zhao)”七个单音节的結果补足语是例外, 要轻读, 但不是动词词尾, 在句子里所起的作用和一般结果补足语也不同。作者指明这种轻音现象的产生和意义的改变有莫大的关系。并把这七个词按其不同的情况分成三类分别叙述。第一, “见”类, “见”做结果补足语, 永远轻读, 除了“看见”之类外, 和其他动词结合, 意义改变很大。第二, “住、掉”类, 一般也是轻读, 意义也有较大的改变, 但在加重语气时可以不轻读, 意义仍和轻读时相同。第三, “死、开、到、着”类, 这一类不一定全轻读, 但意义都改变很大。而且在做补足语时, 轻读和不轻读在意义上也有很大差别。例如: “别把话说死了”(不轻读), “我都要急·死了”

(轻读)。

最后, 作者把一些例子放在一起加以比较, 看出由于语音和语法作用的不同, 意义也不同。这足以证明语音、语法和语义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启示我们在进行研究的时候, 绝不能把这三方面割裂开来孤立地进行研究, 应该多注意有声语言的声音。把它们联系起来作全面的观察分析, 这篇文章正是这样一个尝试, 在研究方法上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途径, 给我们不少启发。但文章的内容从第二部分起有些脱离中心, 拉得很远, 正像作者自己所指出的那样, “不免庞杂零乱”, 这不能不说是个缺点。(林柏初)

《现代汉语》第三册, 杨欣安、李运益、赵荣璇、林序达编著。重庆人民出版社, 1957年9月第一版。32开, 393页, 定价1.00元。

这本书原是西南师范学院函授讲义, 全书共有三册。第一册是绪论编, 语音编, 第二册是文字编、词彙编, 本刊1957年2月号、7月号分别评介过。这里介绍的第三册是语法编, 是全书的重点。

这本书主要是供初中语文教师进修用的教材, 就决定了它的体系和术语基本上和初中汉语课本相同, 在许多地方对初中课本有所阐发, 但也有些与初中课本不同的见解。全书着重实用, 避免过多的理论上的探讨。

全书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总述, 除了词法总述和句法总述外, 比初中汉语课本多了一章语法总述, 这一章实际上纯粹是语法理论。从语言单位谈起, 谈到语法的性质、语法意义、语法手段、语法范畴、语法形式, 一直谈到语法规范化的重要性。作为供初中教师进修用的教材来说, 理论的探讨似不宜过多, 和一般语法书比较, 这部分占的比重显得多了些。

第二部分是词法, 和初中汉语课本一样, 把汉语词类分的十一类。其中和初中课本不同的地方是把“人、年”这些既有名词的特点又有量词的特点的词划分出来, 叫它“准量词”(“准量词”的说法在语言所语法小组的《语法讲话》里提出过来了)。又把“在、往、向、到”这类既可作动词又可作介词的词叫作准介词。初中课本把副词看作是虚词, 而本书却把它看作是半实词, 却没有交代理由。本书还新提出了形容词动化的说法。在初中汉语课本里只是指出形容词可以加上某些时态动词或趋向动词, 以表示人或者事物在性质和形状方面的变化。本书则进一步指出形容词加上了时态助词或趋向动词已经失去形容词的一些特点, 而取得了动词的一些特点。“形容词这种用法和形容词名化(按, 即课本所谓名物化)的情形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不必说形容词有一部分可以加时态助词或趋向动词, 说是形容词加时态助词或趋向动词以后它就动化了。这样免得动词和形容词在这方面纠缠不清。”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比初中课本的观点进了一步。初中课本把形容词在丧失了本身的语法特点, 取得了名词的一些语法特点时叫作形容词的名物化用法, 但在同样的情况, 形容词丧失了本身的语法特点, 取得了动词的一些语法特点时, 仍把它叫作形容词。使人难以了解为什么对同类的语法现象要作不同的解释。但是本书这种形容词动化的说法在概念上仍是不明确的, “形容词动化”这意味着它是形容词呢? 还是动词呢? 还是兼属



呢？又为什么不干脆叫它是动词呢？（形容词名化也是同样的道理）

第三部分是句法部分。本书对句子的分析基本上也和初中汉语课本一样，只小的地方有所出入。例如，复杂的谓语在汉语课本中是没有关联词语的，而本书把复杂谓语又分成带关联词语和不带关联词语的两种。所谓带关联词语的就是像“越……越……”“一……就……”之类的格式，这种句子一般是看作紧缩复句的，而本书把它归并到复杂的谓语中来，因为它和复杂的谓语的三个特点是吻合的：连用的动词之间没有语音上的停顿，而且动词之间有说明和被说明的关系，其间也有固定的次序，不能任意更动。

本书的特色是作者能较好的概括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在阐述语法现象语法规律的时候，同时也能注意到近年来的新的发展趋势。例如，指出近年来状语有一种新的结构形式，就是普通名词加上“地”就可作状语。又如指出近来“和”和“同”有分工的趋势。

也应该指出，书中有些说法是值得怀疑的。这里只举出几个最明显的例子。例如，第十章介词，作者谈到用“把”字句的条件，其中有一条是：“双宾语的句子，直接宾语，可用介词‘把’提前。”这说法未免武断，“洒我一身水”不能说成“把一身水洒我”。“落我一身土”不能说成“把一身土落我”。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又如，第十一章连词，作者认为有些偏正关系的句子两个连词都省去了。其实，我们应该认识到汉语语法中原本是很少用连词的（一般语法书称意合法），这在现在老百姓的口语中还可以证明这一点。由于后来受了西洋语法的影响，连词才逐渐在书面语中多起来。假若把原来没有连词的句子看作省略了连词，岂非本末倒置。在十七章，谈到定语和中心语的关系时，作者为了要说明定语对中心语的修饰作用，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个拄着拐杖、颤颤着腰、戴一付老花镜、长长的胡子用颤抖的声音慢慢地说话的人。”作者说：“这样这个人的年纪、形相、声音动作等都就具体了，我们就能感觉到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其实这种长的定语在汉语的口语里根本是没有地位的。只有在书面语中，由于受了拙劣的翻译文章的影响，才有这种冗长的修饰语，这是违反汉语的简洁的习惯，不是什么好的句子。（方菱）

《客家人怎样学习普通话》，饒秉才著。广东人民出版社 1957年10月第一版。32开，120页，定价0.34元。

王力先生的《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一书对广东省的几个主要方言区——广州话、客家话、潮州话、海南话——的人学习普通话是一把很好的钥匙。饒秉才先生这本书吸取了王力先生的写法：将普通话的全部声母、韵母、声调一一分析、讲解，以此为纲，逐项举出客家人学习普通话语音时应注意的一些例字，再加以词彙和语法两章。全书尽量少用语言学方面的术语，不讲普通话语音和客家话语音在历史上的关系。这样，只要学过注音字母和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人，大约都能看懂。

作者在本书“前言”上说：“本书所指的客家话是以广东东

部的梅县话为代表，此外也兼论到兴宁话和大埔话。”但是统观全书，似乎反而照顾到兴宁话多一些。例如19页（本书用的是汉语拼音方案原草案的修正第一式，现改为新公布的草案拼写法）：

dian: 滇<sup>1</sup>（丁）、电<sup>4</sup>、佃<sup>4</sup>、殿<sup>4</sup>、淀<sup>4</sup>、酞<sup>4</sup>、奠<sup>4</sup>（以上七字应读为“堯”）。

作者在前文说：“括弧内是用客家话注音”（汉字右角数码是普通话声调的代号，不论）。若按梅县话来说，“丁”（阴平）、“堯”（去声）应读为den，与dian音不相等。“丁”“堯”音dian，大约是兴宁的读音。书内许多指明是兴宁语音的地方分析描写也比较详细。虽然这样，梅县与兴宁究竟是邻县，两地的话相差不大，这书所指的客家话还是有代表性的。

拼音方案原草案修正第一式是用g、k、h加i的变读办法来表示普通话的ㄐ、ㄑ、ㄒ的，假若拿这套字母来为客家话、广州话等等有真正的[kɿ][kʰɿ][hi]的方言注音，就会感到不便，解说为难。本书在讲普通话ㄐ、ㄑ、ㄒ三个声母的时候，就不得不处处借助于注音字母的帮助来表示客家话的gi、ki、hi和普通话的gi、ki、hi的分别，一离开注音字母就会混成一团。即使费了这么大的麻烦，许多地方叫人看起来还是很吃力，难以一目了然。因此感到新草案用j、q、x的办法来表示ㄐ、ㄑ、ㄒ，就对付许多方言来说，是便当多了合理多了。本书如有机会按照新草案改写的話，叙述起来也就会感到顺手多了。

本书论到普通话声调的时候说：“阴平的调子是高而平的。它相当于客家话‘中’‘苏’‘光’‘輝’等字音的调子。”“去声的调子是由最高降到最低的。它相当于客家话‘胜’‘利’‘万’‘岁’等字的调子。”这说法未免粗一点。实际上，客家话（梅县为例）的阴平调是没有北京的那么高的，而去声调也没有北京的降得那么低。这若不交代清楚，是与作者自己所要求于客家人“不但要学习普通话，而且还应该特别认真的学”的话相违背的。

这书还有些粗疏的地方，例如14页列普通话的“导”为去声，而19页又列为上声；15页列“拔”字为阴平，86页又列为阳平，显然是互相矛盾了。这只是偶然发现的例子，若逐字核对一下，恐怕还有不少地方需要校正的。（许令芳）

## 来函补正

編輯同志：

貴刊1957年9月号發表的我的文章中（第4頁）倒數第二段，關於越南文字改革的情況與事實有出入，經武昌華中師範學院外文系羅啓華同志來函指出，除了向羅同志致以深切的謝意外，茲更正如下。

原文：“越南、朝鮮都是人民掌握了政权的北部实行了文字改革，反动政权下的南部則繼續使用着旧文字。”按关于朝鲜的情况是正确的，而越南并不是这样。北越和南越現在使用的都是拼音文字，只是北越大力进行了扫除文盲工作。

杜松寿



## 对黎語新詞術語处理的几点意見

陈 瑾

在我們所調查的黎語材料中,可以看到,黎語新詞的主要来源是借入漢語(海南方言),因此对于借詞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1957年年初,黎族的文字草案公布了,民族共同語將逐漸形成。書面語言的新詞、新術語的統一問題已被提出,特別是在編譯工作上更为显著。在編譯工作的过程中将会遇到許多过去黎語中所沒有的新詞,怎样处理这些新詞就成了編譯工作中必須解决的一个困难問題。有人認為新詞多就等于是这一民族語言的發展,因此在編譯过程中就創造了許多不妥当的新詞,使本民族人民無法理解和接受,甚至有的把新詞的含义也歪曲了。也有的生搬硬套地借用漢詞,不考虑是否适合于本民族語言的内部發展規律,所以不能使本族人民欣然接受。

到底應該如何处理这些問題呢?这是值得民族語文工作者来討論的。在这里我想就个人的一些意見提給大家参考。首先我們必須对这一語言的特点有一定的研究和認識,如語音系統、構詞方法,找出它們的規律,然后根据这些規律决定如何創造新詞,或借用外來語。

下面我根据黎語的一些新詞材料作一膚淺的分析。黎語新詞来源最主要的是漢語,在語音上絕大部分借自海南各地漢語(主要是以文昌方言为代表),也有借自儋州方言的(为西南官話系統),如白沙黎語就是这种情况。

由于各地的土音有差別,各地所借入的語音也有出入。加上各地黎語本身方言的不同,因而在借入时为了納入自己的語音系統和習慣,产生了各地借詞語音上的不同。也有的把漢語的声、韵、調的音值直接說成近于黎語声、韵、調的音值,破坏了它应有的語音对应規律。有的地区为借入漢語的音值,往往在原有的語音系統上增加声母、韵母和声調。在語音的借入上是很复杂的,在这里我不想多談,总之,各地所借入的漢語語音是不一致的。我想就黎語借入漢語的方式来看新詞構成的特点。下面所举的例子是从各地吸收进来的,因而在語音的拼写上有所不同。

第一类:又借音又借义的全借詞,这在黎語中最普遍。最常見的是名詞,也有動詞、形容詞和副詞。

民主 min <sup>5</sup> tu <sup>5</sup>	社長 te <sup>1</sup> tsan <sup>3</sup>
任务 zi:m <sup>1</sup> mu <sup>1</sup>	副業 p'u <sup>3</sup> gi:p <sup>1</sup>
學習 ʔo <sup>1</sup> tsi:p <sup>1</sup>	增产 tseŋ <sup>1</sup> ta:n <sup>5</sup>

評工 p'en <sup>3</sup> ka:ŋ <sup>5</sup>	節約 tat <sup>7</sup> ʔi:k <sup>7</sup>
共产党 kon <sup>3</sup> ta:n <sup>3</sup> da:ŋ <sup>3</sup>	尺 ts'i:u <sup>3</sup>
重要 dan <sup>3</sup> ʔiau <sup>3</sup> (以上保定)	都 dou <sup>1</sup> (通什)

第二类:半借,多半是复合詞,其中一部分是漢語借詞,一部分是本民族語詞。構詞的方式完全按照黎語的規則,修飾成分在被修飾成分之后。根据成分不同又可分以下几种:

1) 主要成分是漢語借詞,加上黎語的詞头:

菜 bəm <sup>1</sup> ts'ai <sup>1</sup> (保定)	鍾 ku <sup>3</sup> dui <sup>1</sup> (中沙)
門 pei <sup>3</sup> mu:n <sup>1</sup> (中沙)	蒜 mu <sup>1</sup> son <sup>3</sup> (西方)

2) 主要成分是本族語詞,修飾成分是漢語借詞:

菜湯 nam <sup>3</sup> ts'ai <sup>1</sup> (通什)	篋子 te:ŋ <sup>1</sup> p'i <sup>5</sup> (通什)
水 菜	梳 篋
瓦屋 lun <sup>3</sup> qua <sup>1</sup> (中沙)	教室 plon <sup>3</sup> ʔo <sup>1</sup> (保定)
屋 瓦	屋 學

3) 主要成分是漢語借詞,修飾成分是本族語詞:

鹿膠 ka:u <sup>1</sup> dro:i <sup>5</sup> (通什)	帮助 ban <sup>1</sup> k'au <sup>3</sup> (保定)
膠 鹿	幫 力
腰帶 da:i <sup>1</sup> za <sup>5</sup> (通什)	窗 ts'un <sup>3</sup> ple:ʔ <sup>5</sup> (白沙)
帶 腰	窗 土

4) 借漢語詞素和原意有出入:

火藥 za <sup>1</sup> p'a:u <sup>3</sup> (保定)	嘆气 t'a:u <sup>1</sup> tsəu <sup>1</sup> (中沙)
藥 炮	透 气

5) 黎語中本有此詞,加了一个漢詞,構成一个新詞:

鹿茸 hau <sup>1</sup> zon <sup>1</sup> (通什)	迎接 p'a:m <sup>3</sup> tsip <sup>5</sup> (白沙)
角 茸	迎 接

第三类:和原来漢語詞意有些不同的全借:

招待 tsia:p <sup>7</sup> da:i <sup>3</sup> (保定)	領導 ku:n <sup>1</sup> (保定)
接 待	管
祝賀 kon <sup>3</sup> hi <sup>1</sup> (保定)	鐘 tian <sup>1</sup> tson <sup>3</sup> (保定)
恭 喜	点 鐘
添 bu:i <sup>1</sup> (保定)	強迫 ʔe:p <sup>7</sup> (保定)
倍	压
鬼 tin <sup>3</sup> (保定)	聰明 tseŋ <sup>1</sup> (白沙)
神	精
玻璃 k'an <sup>1</sup> (白沙)	游戏 hi <sup>3</sup> lok <sup>5</sup> (白沙)
鏡	喜 乐
日曆 ho <sup>3</sup> tiau <sup>3</sup> (中沙)	韭菜 son <sup>3</sup> (西方)
号 数	葱
煩悶 k'i <sup>3</sup> mun <sup>3</sup> (中沙)	知識 li <sup>1</sup> (西方)
气 悶	理

第四类:翻譯借詞,大多是反映新事物的詞。这



些詞對具體事物加以形象化，很容易為群眾了解和掌握。例如：

飛機 va <sup>1</sup> ben <sup>1</sup> (保定)	電筒 fei <sup>1</sup> dou <sup>1</sup> (保定)
船 飛	火 生
將軍 p'a <sup>3</sup> guou <sup>3</sup> bi:ŋ <sup>3</sup>	郵箱 dru:k <sup>7</sup> ts'ia <sup>3</sup> (保定)
(表示男性) 頭 兵 (保定)	箱 紙
領袖 vo <sup>3</sup> ŋa:u <sup>4</sup> (白沙)	單幹 lei <sup>3</sup> tsau <sup>3</sup> (白沙)
頭 人	做 自己
動員 zo <sup>3</sup> t'uaŋ <sup>3</sup> (白沙)	批評 ts'ouŋ <sup>1</sup> t'uaŋ <sup>3</sup> (白沙)
邀 伴	教 伴
電影 hi <sup>3</sup> dap <sup>3</sup> (白沙)	醫院 ploŋ <sup>3</sup> za <sup>1</sup> ts'ok <sup>7</sup>
戲 布	屋 藥 病 (白沙)
汽車 ts'i <sup>1</sup> fei <sup>1</sup> (白沙)	臉盆 ŋa:u <sup>3</sup> k'op <sup>7</sup> daŋ <sup>1</sup>
車 火	碗 洗 臉 (西方)
肥皂 za <sup>1</sup> sa:k <sup>7</sup> ve:ŋ <sup>3</sup>	頑固 loŋ <sup>1</sup> si <sup>3</sup> (西方)
藥 洗 衣 (西方)	火 氣

從以上四大類借詞形式來看，全借占的數目很大，但是半借和翻譯借用的生命力也很強。因此在編輯中遇到新詞和新術語時，就有很大的斟酌余地。在這裡我想提幾點意見：

(一)我們應該深入地挖掘黎語詞彙中是否有相等或相近含義的詞來代表新概念（指舊詞給以新的意義）。這是很重要的，它是黎語新詞的主要的源泉。在深入挖掘以前，必須作好詞彙收集工作，並給予正確的注釋。這樣才能恰當地找出適合於新概念的舊詞。

(二)對於富有形象而具體的事物名稱、行為，可以

考慮用翻譯借用的方式，創造出生動活潑、帶有民族特點而為群眾所喜愛，容易理解的新詞。在創造新詞的過程中，必須深入掌握黎語的構詞規律。要照顧民族語言的風格和習慣，不能強以漢語的習慣去代替。這些新詞的創造最好能在群眾中征詢意見，並給以一定的考驗時期，逐漸推廣，才能得到群眾的承認。

(三)半借的形式可以充分利用。儘管漢語借詞在本民族語言中是陌生的，但是由於其中有部分詞素是本族的語詞，因而在了解詞義上有很大的便利。同時這類詞服從黎語構詞的特點和習慣，群眾容易接受。

(四)對於經濟、文化、政治等方面有嚴肅意義的語詞，本民族語言中如果找不到恰當的詞來表達，同時創造新詞又會影響到意義的正確性，最好還是完全借入漢語。先進的民族語言對其他民族語言的影響是很大的。特別是擁有豐富語詞的漢語對國內其他民族的語言將會有很大作用。漢族和黎族的往來關係既是如此的密切，因此借入漢語作為豐富語言的方式之一是，完全正確的。

黎文編譯工作還是剛剛開始，今後一定會遇到許多政治、經濟、文化、科學上的語詞。為了使這些新詞術語更好地為黎族人民服務，我認為必須對黎語新詞來源作深入的調查和研究，對漢語借詞在語音上、語義上、結構上作深入的比較研究，以便得出系統的全面的規律。在這個基礎上進行黎語新詞的創造或借入，那麼新詞術語一定能夠為黎族人民喜愛和接受。

## Дополнение 的譯名問題

定 國

Дополнение 的譯名，現在大家一般都採用“補語”，只有個別的是採用“賓語”。在我國一些較有價值，影響較大的俄語語法論著中，дополнение 的譯名都是“補語”，例如：《俄語語法》（哈爾濱外國語學院編）、《初級俄語語法》（韋光華等編）、《俄語語法課本》（北京俄文專修學院編）和流行的一些俄語教科書，以及俄語雜誌中的許多論文。

Дополнение 所以會譯成“補語”，大概是因為這個詞本身有“補足、補充、補遺、追加、附加”的意思。《露和詞典》的解釋是“補語”，陳昌浩的《俄華詞典》以及其他詞典也是“補語”。可見“補語”的譯名占着壓倒的優勢。

可是，俄語中所謂 дополнение，其實就是不折不扣的“賓語”，所以我認為應該統一為“賓語”。我認為把 дополнение 譯成“補語”不妥當，這還有兩大缺點：第一，與英語語法中的 complement 的譯名混同了起來。complement 與 дополнение 是兩個不同的語法概念（術語），在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上都是不相等的，不能一概而論。既然如此，採用同一譯名，就否定了術語的科學性，會造成混亂，使學習這兩種外國語的人感到不

便。而 complement 的譯名採用“補語”，是早在前幾十年的事。第二，把 дополнение 譯成“補語”，也跟漢語語法中的“補足語”混淆，因為漢語語法的“補足語”也可以簡稱為“補語”。但漢語語法中的補足語（即補語）與 дополнение 的含義也是不同的，應該科學地加以區別。

鄭奠先生曾經把這一問題作為現代漢語詞匯規範化問題提出來過。他在《現代漢語詞匯規範問題》的報告中說：“基礎方言之內因吸取外來語詞而產生的同義詞：…取消和其他譯名發生混淆的，…Дополнение 有‘補語’、‘賓語’兩個譯名，應該採用賓語，因為‘補語’和 complement 的譯名混同起來。”但是，遺憾的是，這一問題並沒有引起廣大的俄語工作者注意，從 1955 年 10 月鄭奠先生把問題提出來以後，дополнение 的譯名仍舊沿用“補語”，再版的和新出的著作中都是如此，不知是什麼原因。也許是不同意鄭奠先生的意見，但也沒有見到討論過。我想譯名不統一，尤其是科學術語的不統一，往往會造成思想上的混亂，影響外語的學習和漢語詞匯的規範化。希望大家重視這一問題，因為這是有關現代漢語詞匯規範化的問題。

## 河北省方言調查指導組第二次會議概況

河北省方言調查指導組于1957年11月23、24兩日在北京召開了第二次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有河北省方言調查指導組組長、副組長、委員、顧問和河北省教育廳、北京市教育局、天津市教育局、京津七個有關高等院校具體負責方言調查工作的同志共三十人。教育部、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也都派人參加。

會議開始的第一個半天，各高等院校互相介紹了方言調查工作的情況、經驗、問題和今後計劃。

以後的一天半時間，集中地研究了編寫學習普通話手冊的問題，大家熱烈討論，徵求了懷安、成安兩縣教師代表對事前發到本地徵求意見的兩本手冊（懷安人怎樣學習普通話，成安人怎樣學習普通話）的意見，最後明確了學習普通話手冊的對象、內容和要求，並對有關編寫學習普通話手冊的問題做出下列幾項決議：

（一）根據“大力提倡、重點推行、逐步普及”的推廣普通話工作方針，學話手冊的主要對象應該是中小學、師範學校的教師和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知識分子。他們依靠學話手冊的幫助，可以更好地進行普通話教學或自學，便於普通話的推廣。

（二）學話手冊的主要內容和具體要求：

1) 着重弄清方音與普通話語音（即北京語音）的對應規律，在說明對應規律時，要求多舉一些例子，同時亦應列舉一部分詞彙和語法的特点。

2) 重點描寫地方話與普通話差異大、學習困難的部分，聲、韻、調的次序安排不作統一規定。

3) 普通話的變調規律應該列入手冊。本地方言的變調規律如果已經了解清楚，也可以簡單說明，以免本地人學習普通話時，把和普通話不同的變調規律帶到普通話里來。

4) 每種手冊都應該有一篇簡明的序言，說明什麼是普通話，為什麼要學普通話等。

5) 尽可能地在每個章、節之後，有可以幫助理解和記憶所學知識的歌訣，有生動、活潑、聯繫實際的練習（如簡短對話、文學作品片段等）。

6) 同音字表可以不列入手冊。每個調查點的同音字表應該寄交河北省教育廳兩份，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一份，各院校間可以重點交換，以便進行研究。

7) 以1957年11月1日國務院全體會議第60次會議通過的漢語拼音方案草案上的拼音字母，對照注音字母為主要記音工具；凡是拼音字母不能表示的音，就用國際音標來補充，並且用文字說明讀法。

8) 必須力求通俗、易懂、實用，不宜深奧、繁瑣，不要偏重學術研究（深入研究可以另寫論文）。

（三）方言相近的幾個調查點應該合編一本學話手冊。合編學話手冊的原則如下：

1) 調類相同的並且聲、韻也基本上相同的幾個調查點，可以合編一本學話手冊。

2) 合編與否應該根據語音的具體情況確定，但是合編的調查點不宜過多，一般地以三、五個調查點合編一本為宜。

3) 合編學話手冊首先由各院校根據已掌握的調查材料，初步規劃一下，看看哪些調查點可以合編一本學話手冊。然後，在可以合編的幾個調查點中選擇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調查點，編寫某某縣（市）人怎樣學習普通話手冊，由河北省教育廳發至本地，廣泛徵求當地中小學語文教師的意見，同時也發到擬定合編手冊的各縣徵求意見，最後根據各地反映的意見確定是否合編，如何修改。

4) 院（校）與院（校）所分擔的調查點，如果相鄰的幾個點可以合編學話手冊的，就應盡量合編；合編有困難的，也可以先不合編。合編與否，有關院校應當直接聯繫，研究確定。

5) 接近北京地區的調查點（和北京音差別很小）如通縣、承德等地，也需要編寫學話手冊，但合併的點可以多一些。

（四）學習普通話手冊編寫出初稿後，應先油印，寄交河北省教育廳20份。由教育廳分發各地並組織當地教師學習、討論、提出意見。各院校根據當地教師提出的意見進行修改。學話手冊經過修改和本院（校）方言調查指導組委員或顧問的審核、批閱以後，再寄交河北省教育廳，由教育廳和有關方面聯繫出版。

（五）關於編寫學話手冊所需要的經費，應根據教育部、高等教育部“關於漢語方言普查的補充通知”的規定，由各院校分別負擔。1958年所需費用，各院校應事先列入預算。

（六）關於完成方言調查工作編寫出學話手冊的時間：

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學院、天津師範學院在1958年1—3月間，基本上完成所分擔的方言調查工作，編寫出學話手冊；河北天津師範學院、南開大學、北京師範大學須至1958年暑假完成，但最遲不得超過1958年8月。要求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南開大學、天津師範學院在1957年年底前將已編寫出來的四本學話手冊（懷安、曲陽、天津、成安），根據此次會議決議的精神和群眾提出的意見，完成修訂工作，以便1958年初和讀者見面。（吳郁文）

### 啓事

本刊退稿處理辦法，以前曾在編者話中交代過。現在再聲明一下：

1) 來稿在五千字以下的，請自留底稿；作者如果沒有特別注明要退的，在決定不用時一律不退。

2) 本刊因限于人力，退稿一般不提意見，特殊情況者另行處理。

以上敬希來稿同志注意。

本刊編輯部



# 关于写作体例的话

本刊编辑部

在談到这个問題之前，不能不指出的是，現在写文章的人大多在文章的内容和語言的修辭上用的功夫多，材料的整理和安排有时就欠注意，写作的款式尤其不大注意。这样的文章放到任何一个报刊編輯部里，都必不可免地要經過所謂“加工”。当然，一篇文章的好坏，或者說它的写作水平，不是从形式的安排来衡量的，主要地决定于内容；但是，如果写作的款式都是“我自为之”，从不照顧到体例的整齐划一，那末就要給編輯部的加工帶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在一切都要辯証地爭取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工作原則下，写作体例也應該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問題。

这里所謂写作体例，包括文章行款、标点用例、脚注处理，等等方面，一句話，也就是文章的“格式”問題。現在分別來談一談。

## (一)一般注意事項

1) 只要是写作，哪怕是几百字的杂感，写成后必須通讀一兩遍，那末，除了内容之外，自己往往还会發現文字的疎漏、标点的誤用，或者使用非正規的簡体字，等等毛病；看出毛病才好加以修正。有經驗的人懂得这个程序的重要，可是在写“急就章”时也少不了出这类毛病。要知道，并不是編輯部有加工的“癮”，对每篇文章都非加工不可；相反地，編輯部希望的倒是但能少在文字加工上費功夫才好。

2) 書法是可以有个人的爱好的，可是写文章的字迹要求清楚，总該是合理的。不管是什么字体，写得怎样，总要叫別人看了能認得。老实說，青年写作者中許多人却不注意这一点。

3) 即使在怎样不便的条件下，写作用紙多少要考虑一下。随便把筆記本扯下来就写，并且兩面都写上字，这样的做法屢見不鮮，这样的文章要想發表，試想要給編輯部增加多少工作？前面說的是文章自己修改好，要抄清楚；这里說的是要坚持單面書写，最好是用單面有格并固定字数的稿紙。

4) 写文章如果是投給报刊，不要忘了把真实姓名和詳細通訊处書写清楚。

## (二)技术处理事項

1) 内容决定形式，所謂文章行款当然也因文章性質而不同，可是也有个大致不离的一般原則。有的人写文章喜欢“綱举目張”，事实上有些文章也需要分層叙述，这样，就要使用序碼。在大項的(一)下要有小項

的(1)，再下还要細分多少条，于是把汉字数碼(大写和小写)、阿拉伯数碼、拉丁字母、俄文字母、干支序字乃至羅馬数字層層列出，弄得五花八門，紛然杂陈。問題不在于使用多种序碼，而是在于要用就須用得一致，并且如果考虑能少用，还是少用的好。这里建議序碼最好只用到三層，第一層用汉字数碼，第二層用阿拉伯数碼，第三層用拼音方案字母，如：(一)——1——a)。还有一种簡便的办法，是用1.11, 1.12, 1.21…，即使層次稍多，也不至于乱。

2) 写文章有时需要提到別人的話，或是摘引現成例句。引文和例句要用得恰到好处，同时要忠实于所引的原文字句(特別是数字和年代)。引文和例句虽然足以表現作者占有材料的情况，并作为自己的論据，可是必須安排和整理得好，才能發揮作用。这一点有些作者是掌握不好的。所謂恰到好处，就是可以引用一句話就够了的，不必引用一大段；可以用几句自己的話概括大段原文的，不必全抄原文(当然应当加脚注)；可以有一兩個例句就能够說明的，不必堆砌若干条。作者要对引用原文負責，还必须認真查对原書出处。

3) 为了表示对引文認真負責，帮助讀者得到研究綫索，或是为了給正文作附帶的解釋，就要加注解，一般地都是用脚注。很有些作者不大注意这一点，在引用出处的細節記錄上，如版本、出版年代、頁碼等，懶得去認真查对，結果就使得編者要費很多工夫去代作者校对。出处的脚注安排的順序和标点，一般是“著者名：書名或篇名。出版者或出版地，出版年分。頁碼”，如“高名凱：《普通語言学》，新知識出版社，1957，105頁。”或者“著者：書名，頁碼(出版者或出版地，出版年分)”。如“王力：《漢語史稿》，35頁(科学出版社，1957。)”

4) 細心的作者都会注意到，現在的典范著作和报刊沒有不認真使用标点符号的。标点符号在書面語中已經成为文字的組成部分，是必不可少但也不可濫用的。标点符号是写作体例中極应注意的一項，說來好像是老生常談，可是許多作者却常常忽略或重視得不够。这当然一部分由于有些用法还没有明确，例如，書名号取何形式，近年来常有人討論，出版物里也呈現着紛歧的情况。不过，要求同一个書刊里使用一致，同一篇文章里保持一律，总該是可行的。这里，我們仅建議在原稿上应注意的几項，作大家参考：

a) 逗号和頓号要严格区别。(下轉40頁)

## 中国語文叢書出版簡報

本刊編輯的《中国語文叢書》除已出版的十四种已在本刊1957年1月号封底上介紹以外，最近出版的有：  
**北京話輕声詞彙** 張洵如編，陈剛校訂，定价0.70元。

這本書的性質和內容，本刊1957年12月号已有評介，讀者可以參考。

**語法論集(第一集)** 史存直等著，定价0.85元。

本書收集有关討論語法問題的論文十三篇，分三个單元：第一部分以討論詞的定義、詞類的性質和划分問題为中心；第二部分是一篇對於苏联語言學家加爾基娜-非多盧克新著《判斷与句子》一書的商討意見；第三部分是一篇對漢語語法學提出的新意見。

**語法論集(第二集)** 高名凱等著，定价0.65元。

本書收有九篇論文，其中篇幅最多的是高名凱著的《語法範疇》一文，其次有关于詞類問題的兩篇，此外都是有关語法的個別問題的探討。這一集還收有翻譯文章。

**中国文法革新論叢** 陈望道等著

為應語法研究者的需要，根据1943年重慶文叢出版社的版本重印。這次重印，補收一篇，共有三十五篇論文，內容大部都經過作者從新校訂，體例編排也有改進。

除了上述新書外，現在已排印即將出版的有：

**方言和普通話叢刊(第一本)**，陈慧英、白婉如等著

本書收有廣州音和北京音的比較，濟南音和北京音的比較，官話區方言尖團音分合的情況，漢語方音中的幾個問題，方音和北京音對應規律的教學等五篇文章。

**少數民族語文論集(第一集)**，袁家驊等著

**方言和普通話叢刊(第二本)** 陈承融、王年芳著

本書收有平陽方言探索及揚州方言兩篇文章，都附有大量字表。

另外，正在輯稿即將付排的有：

**方言和普通話叢刊(第三本)**

**歇后語彙編** 宁架編著

**少數民族語文論集(第二集)**

**漢語的動詞範疇** 苏联雅洪托夫原著

**中国語言學史話** 周因夢等著

### 对投稿的同志們的請求

近來本刊不斷收到讀者來信(包括“語文短評”來稿)，指出本刊所登文章中有語句不順、文理欠通之處。今後編輯部自然應該加倍努力，提高本刊語文質量。但是編輯部所能為力是有一定的限度的，主要還是得依靠作者跟我們合作。我們請求投寄稿件的同志們，寫完之後多看几遍，琢磨琢磨，修改好了才寄出。並且請用有格稿紙謄寫，行與行之間一定得留空白。字跡務必清楚，引文必須核對。這對於我們將是莫大的幫助，先在這裡道謝。

本刊編輯部啓

每冊定价人民幣0.24元(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本刊上期12月22日出版

**中國語文**

月刊

1958年1月号

总第67期

1958年1月22日出版

編輯者 中国語文編輯委員會  
北京海甸中关村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景山东街45号

印刷者 北京京華印書局  
北京虎坊橋

總發行處 郵電部北京郵局

訂購處 全國各地郵電局、所

代訂代銷處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

預定：三個月0.72元，半年1.44元，全年2.88元；寄費1.平郵寄費不計，2.掛號郵費由訂戶負擔。

1—20,010冊  
代號2—44